

蘇聯軍隊中的 政治工作

捷 克 加 了 夫 著

伍 雙 文 譯



生 活 書 店 發 行

MG
E 512.9
6

蘇聯軍隊中的政治工作

蘇聯·捷克·加夫
譯文雙伍



上海生活書店總經理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一月

目次

緒言	1
第一章 戰時政治工作底要則	1
第二章 動員時的政治工作	10
第三章 在梯隊中移動時的政治工作	15
第四章 行軍時的政治工作	24
第五章 偵察時及警戒時的政治工作	26
第六章 戰鬥時的政治工作	101

一 戰國

二 戰國後

第七章	退却时的政治工作	一三三
第八章	在阵地战中的政治工作	一三五
第九章	骑兵抄襲时的政治工作	一六六
第十章	預備隊駐止时的政治工作	一六二
第十一章	補充部隊內的政治工作	一六八
第十二章	戰線上的政治部	一七〇

敘言

紅軍中的政治工作是黨內的工作，政治文化工作，政治行政工作和政治組織工作的總稱。這一切政治工作的基礎是黨的工作，不過其在紅軍中，較在任何處都更要溶和些。在紅軍中黨與國家機關混合而成爲政治機關；這開始是很早了，是緊隨着一九一八年左派社會革命黨騷動後立即開始的；那時，紅軍之唯一的政治領導者，即是蘇聯布爾雪維克共產黨。

研究紅軍底政治建設及紅軍中的政治工作的經驗，當然不僅是對於每個紅軍政治工作人員，並且對於國際工人革命運動將來建設國際紅軍，也有極重要的意義。此項工作，業由我們着手在列甯城軍事政治學院開始了，我們是分做兩個基本部門來研究的：（一）紅軍建設歷史，（二）紅軍中的政治工作。

關於紅軍中的政治工作問題，我們分做下列四個基本部份：（一）紅軍中政治機關底組織及政治組織工作；（二）宣傳鼓動工作；（三）黨的內部工作；（四）在各種條件下的政治工作。

前三部份所分析的，是政治工作的各個元素，主要是政治工作的方法，而後一部份則綜合政治工作的各個元素為一個整體，且求其適合於紅軍政治工作人員在各種條件內的工作。

此種重大而且複雜的工作，分別由本軍事政治學院政治工作研究系諸同人負責担任，後一部份（在各種條件下的政治工作）恰落在我底肩上。

這一部份工作，應開始從對方才徵到營房之紅軍戰士的政治工作着手，然後順次增進其政治訓練及教育的課程，和一般軍事教育密切連繫起來，最後再講戰時的政治工作。

我們是從此項工作的最後一段開始編輯，首先準備付印此戰時的政治工作，其原

因如下：

紅軍平時的經常教育計劃（按兩年期限，）才開始了不久，尚須注意考察此種教育經驗而收集之。總之，此種經驗材料，我們還很少，且在最近一二年內，我們還收集不到許多。歸納此種工作經驗，再過些時間，是很適宜的，因為可以收到更好的效果。

恰是相反，戰時政治工作的經驗，隨着國內戰爭底結束而結束了。記載過去的經驗，遲延下去，便有逐年忘掉的危險。老早就應開始收集此種經驗了。一九二三年十月間德國紅軍底產生，使我們不得不從平時日常的政治工作的忙碌中，轉想到戰時政治工作的問題；顯出我們底政治機關，對於此種工作，實無一些準備。所以我們認為必須現在即行來安放第一塊——雖然是在內戰時期我們底政治工作經驗不完善的——柱石，使其他有內戰經驗及材料的同志，得參加以補足之，並提出以資全體政治工作人員底討論。依將來此種工作的發展程度，我們會得到完善的，精粹的結果，而將不好的部份拋掉，引以為教訓。

因為關於內戰時的政治工作材料，多半尚在各個同志底手中，而今年我們因種種原因猶未能收集攏來，所以我們此種工作，主要還是依據個人過去的經驗及我們現有的一些有限材料為基礎的。最後，我們為滿足軍事政治學院學生底要求，使我們在這裏擇用了些各種出版物上已刊過的材料，但他是經我們校正和刪改過的。

現在還有幾句話要說，為什麼我們不像有些同志所提議的，像陸軍大學所慣用的名詞，將這本書叫做「政治工作的戰術」呢？當我們說「政治工作戰術」的時候，在我們軍事同志間，立刻就想起了一般的軍事戰術。這種軍事戰術，是科學的，是有很高程度的，他有幾百年存在的歷史，並且有許多世紀的豐富經驗。我們計劃編出這本在各種條件中之政治工作的方法及內容，不過是一個最初的嘗試，所依據的，是些非常薄弱的出版物底材料，因為歸結此種經驗的工作，完全是很少的。多半是只憑個人底經驗做基礎。所以，無論如何，不可將我們底初步工作拿來與這種有深切研究的學科，像軍事的共同戰術或各別兵種底戰術相比較。

另一方面，我們對於政治工作，首先就明白他是黨的工作。在黨的慣語內，關於戰術（黨的戰術）底瞭解，另有他自己底意義，不完全與軍事戰術底了解相符合。我們如說是「政治工作戰術」，那首先就應了解他是黨的戰術，是我們政治機關在其一切工作中所施行的戰術。而這種了解，却廣泛於我們政治工作學科內所要解決的任務。「政治工作戰術」底了解，首先是包含着「蘇聯共產黨歷史及其戰術」的學科，其次則包含着「紅軍及國內戰爭歷史」的學科。在政治工作學科內，我們所研究的，主要是政治工作方法，在紅軍中和經過紅軍施行黨的基本任務的方法。當然，我們也還研究在紅軍中政治工作的當前任務，因政治工作的方法和政治工作的內容，是有相當關係的，但是政治工作的基本內容，自然是由整個社會經濟問題及政治問題——我們學院所研究的，立於蘇聯當前的社會經濟政治問題——所演繹出來的。

紅軍中政治工作的一個最重要的任務，就是提高紅軍底戰鬥力。所以紅軍中政治工作與作戰工作，是密切地互相連繫着，而政治工作學說則密切連繫着軍事底一般戰

衛。像威爾遜斯基這樣軍事專家，把政治工作專門提出附入一般戰術內，這是完全正確的。如不計算軍隊底精神及政治狀態，無論是那個指揮員，也不能正確地解決其作戰任務，不能正確地指揮軍隊戰鬥。然而不可從此做出結論，像有些軍事工作人員所說的關於「政治服從戰術」的話，或是關於政治工作學說無須單獨存在的話（而有些人竟說在施行個人負責制後，一般再無須要政治工作的話。）這些意見的來源，都是由於不明白紅軍中政治工作的意義與任務。

上面我們已經說過，政治工作的任務，就是在政治上領導紅軍和訓練紅軍。這種政治領導和政治訓練的目的，首先在於鞏固紅軍——無產階級專政的柱石——和提高紅軍底戰鬥力。所以提高紅軍底戰鬥力，是我們在紅軍中政治工作的一個最重要的任務，但不是唯一的任務。每個軍事工作人員必須記着這點。所以很明顯地，在軍事戰術與政治工作間，是存在着極密切的關係；設使我們說，「政治」可規定戰略底任務，並可判定戰略決心底範圍，在此種關係上，戰略是無條件地服從着政治，那麼戰術與政治工作

間的相互關係，並不是矛盾的。政治工作，只有在提高戰鬥力之任務的關係上——在其幫助解決戰術任務的關係上——是服從着戰術。但是軍事戰術同時又服從着蘇維埃政權底一般政策，而此種政策底執行者，在紅軍中，首先就是政治機關和黨的機關。例如，依軍事戰術底觀點說來，解決作戰任務的最好方法，是以火力消滅部隊前面的村莊，但從政治觀點看來（例如，與土匪戰鬥時），此種決心，却是不容許的。指揮員，當然不得不服從這種政治底決心。

最後，政治工作還有其獨立的政治任務或文化任務，有時與軍隊戰鬥力是很少有直接關係的。（例如滿足紅軍戰士與國民底文化要求，農業宣傳，蘇維埃選舉等。）

這樣看來，軍事戰術和政治工作，是彼此相互服從着，但是兩者間，還各存有一部份獨立的工作。

第一章 戰時政治工作的要則

戰時政治工作的基本任務是實現戰爭勝利。其他一切多半是服從着這個任務。但是在這裏即應指出，其他任務並不是不存在的，紅軍在戰時還保存着他底政治權利，並且還參加一般的政治生活。雖然是在戰爭時期，紅軍依然參加地方蘇維埃政權底建設及全國經濟政治底建設，（例如參加聯邦蘇維埃選舉大會。）這裏不可顯然地劃分各種工作間的界限。紅軍戰士底政治積極性可幫助發展其政治覺悟。政治覺悟的發展，乃是其戰鬥力的根本保證。所以對於政治工作之實現戰爭勝利的任務的意義，不可過於狹隘的了解，舉凡一切可幫助提高紅軍戰士政治覺悟的，均可幫助達到勝利。所以戰時政治工作的任務，大致是與平時相同，所不同的，不過是實現此種任務的手段是要適應戰時的情況。

首先必須規定戰時政治工作不間斷的原則。無論在任何情況中，都要向整個的政治機關要求其有工作能力和積極性。「因情況關係政治工作不會進行」的這種解釋，完全是要不得的。戰時的政治工作，爲的就是戰鬥——爲達戰鬥成功及戰爭勝利。因戰鬥情況及戰鬥任務關係而停滯政治工作，不是不明白政治工作的本質，就是不會適應戰鬥情況。要說說這個問題及託故而不進行工作的口實，是因爲國內戰爭時，常可遇到此種事實，常見政治委員送去通知說「因戰鬥情況關係，政治工作彙報並未編製」或說「因軍隊移動，政治工作沒有進行」。當然，情況本身往往非常困難，而這種借口情況的解釋，更往往恰足證明其沒有充分的積極性和不會工作。所以，對於每個政治工作人員，必須要求其完全清晰地明白基本的條件：政治工作，無論在何種情況下，都不應間斷，正與作戰指揮和部隊供給的不應間斷一樣。

其次的要求條件，應是工作的準確性。往時許多政治工作人員所犯的毛病，就是精神疎忽，常用他來做「反官僚主義」的理想。而戰爭却要求須有非常的準確性，每個政

治工作員應當記着：「在戰爭中的延遲等於死亡。」假如執行作戰命令不準確及疎忽，常可引起戰敗的慘劇，執行政治命令不準確及怠慢，即可使部隊政治的瓦解，而為軍事上失敗的先兆。

所以關於政治工作，常不得不特別提出準確性底意義。

有幾個軍底政治部，也曾為此問題而屢次進行過大規模的工作。例如第十二軍政治部於一九二〇年六月所發出的命令內寫着：

每個共產主義者不是都切實注意到和工作的鬆懈，怠慢，疎忽及不準確等現象鬪爭。像一般規則似的，沒有一個任務，一個使命及計劃（禮拜六，黨會及其他等）能夠按照規定時間開始工作：許多共產主義者同志，甚至連工作準確，迅速，及精密的重要意義，都還不明白。

該命令內，又指出與此種現象鬪爭的左列方法：「一，各師政治部及特年普洛河艦隊政治部須於黨的一切支部內，開始最激烈的鬪爭，為完成每個工作的精密，迅速，及時，

準確，及慎重而奮鬥，無論該項工作是怎樣地微小。

二、各種社會團體底計劃和黨的計劃，支部會議，羣衆大會，禮拜六及其他等事體，均應按照規定時間，確實開始進行，不然則完全取消所已規定執行的事體。

三、開始於整個紅軍中施行刊物的及言語的鼓勵工作。

四、凡是違犯消極及怠工罪狀的，須繩之以軍紀或加以法律的制裁。

從一般戰鬪情況及軍事情況中，所產生的一個問題：就是關於政治工作之紀律底意義，並不僅是關於黨的紀律，恰是關於一般的紀律。

戰爭要求每個人須有最大的努力，戰爭要求耗費最多的精力。這不是人人都具有的。所以雖然政治工作人員是有如此或如彼的政治覺悟程度，有時尙須對他加以紀律底懲罰。無論這個問題是怎樣明顯，然而還常常惹起了初到紅軍中之黨員底不滿意。其反對的要點，通常不外是說，『我既是個共產主義者，那末，我就應當自動的做事。若是我做事不正當，那末，我就不是個好的共產主義者，對我並無須軍事紀律底懲罰，而只須黨的

懲罰。」

因此，共產主義者常視紀律底裁判，好像是減低了自己底身分。這種見解，從頭至尾，不是充滿了不明白紅軍紀律底意義，就是活現出自己官僚主義底特徵。二者間必有其一：或是紅軍須要有紀律，到那時紅軍中共產主義者底責任，不應該少於其他紅軍戰士，而應多於其他戰士，且不僅是關於黨的紀律爲然，關於軍事紀律亦然。「共產主義者兵士底權利與其他一般兵士底權利一樣，不能多過一根毛髮；不過他底義務，是比較他人多些就是了。」（見蘇俄革命軍事委員會命令第二九號，一九一八，十二月，十一日。）

或是，紀律底裁判，果然可減低身分，那紀律在紅軍中，即不應有存在的餘地了。在議論這個問題的時候，常是混淆了舊式軍隊底紀律與紅軍紀律底區別。舊式軍隊底紀律內，含有兩個完全不同的元素。一方面，舊式軍隊底紀律，是一種驅使和奴役勞動羣衆的補充工具，是一種剝奪人類尊嚴知覺的工具。官長與士兵間的相互關係，就是這樣的。另一方面，舊式軍隊底紀律，是統治階級爲鞏固其統治起見，而對於本身底自行限制。佔有

社會上最高地位的人，也是受過紀律訓練的，即是皇帝底兒子，當其在軍隊服務期中，也常受過紀律底懲罰。地主統治階級，在這中間，並未看見對自己有什麼羞恥。

戰時的政治工作是俱有高度的集中性質。集中制是達到一致了解當前任務，創立一致意志——在戰爭中取得勝利的根本條件——之一最重要的工具。所以即在政治工作中，集中制也是根本原則之一。

因此可見執行關於政治工作的政治命令，與執行戰鬪，作戰及行政命令，其重要程度無二。

協同政治工作於作戰任務的需要，特別顯示出在政治上的集中意義，因為作戰準備應無條件地與政治準備同時進行，如彼此各自為政則對於實現戰鬪任務，完全是不夠用的。

一切對於政治工作集中制的反對，通常是由於不明瞭集中制在軍事上的一般意義，且往往以殘餘的游擊隊觀點來對待軍事，這種觀點，在政治工作方面，還有些難以拋

除，這因為紅軍中政治工作的經驗，是方從國內戰爭中開始的，而同時軍事底經驗，却有其許多世紀底歷史了。雖然如此，即在政治工作方面，我們已經有充分豐富的經驗，可規定工作一般的基礎及原則，且可依據我們現有的相當政治、軍事準備及國內戰爭底經驗，充份正確地從集中的機關來領導各地方底工作。

然而正確的集中制，不但無限制下級執行者底自動，而且他本身還憑着這『自動』做基礎，並要求時時須有這種自動。如下級沒有必須的適當的自動，則根本即不能發生戰鬥工作。沒有一個作戰命令能夠預先指出情況底各種細微，因這種戰鬥情況底變遷，是不間斷的。指揮員底自動——為實現高級首長底意旨所表現的自動，實是各種戰鬥工作的基礎。關於政治工作，也是一樣。即在平時，無論任何中央機關，亦不能預先指出關於政治工作的各種細微及臨時發生一切問題的處置方法。如果企圖在給下級每月工作計劃內，從頭至尾每一點鐘都由上級規定，給直接執行者（政治指導員、政治委員）沒有留出任何自動的餘地。這是一種官僚主義底趨向，我們必需與這種傾向鬭爭。

我們時常主張：例如擬定政治課鐘點計劃及內容時，必須給政治指導員及政治委員以自動的機會。我們常指出政治課，乃是國家在部隊內宣傳和鼓勵的根本方法（國家的意思，是指這種課程是必要的。所以，即在平時，對於像政治課這種最集中的政治工作形式，甚至於其內容（計劃）內，也應留出若干預備的時間，使政治指導員及政治委員，得補充以在當地紅軍戰士間所發生的，常為上級所不能預見的問題（例如醉酒，偷盜及該部隊臨時所發生的其他問題。）

戰時一切政治工作人員底自動，尤屬須要。但這種自動，應向實現上級政治機關所指出之一般政治任務底方向走去；為實現一般任務而應有的局部任務，則須由下級隸屬政治機關自行規定。實現的方法，即是過去國內戰爭經驗所鍛鍊出的方法，然其運用，則在每個具體的環境中，多由執行者本身底自動性來決定的。

對於戰時政治工作的基本要求，是政治工作方法須有彈性，須適應各種情況，須指出局部任務及其因情況關係而應有的變更。特別在這種關係上，應表現執行者的廣大

自動。只有這種要求才可實現政治工作不間斷的原則；問題本身很明顯地：許多的工作形式，或不能施行於各種情況中，而強行之，必可大大損害部隊底戰鬥力。例如在戰鬥中，不可舉行羣衆大會；在軍事作戰地帶內，施行掃除文盲工作，非常困難。但是這並不是說，在戰鬥中，不可進行任何政治工作。須知在紅軍中，進行政治工作的根本機關，乃是黨，黨的小組；每個黨員否認在戰鬥中政治工作的可能及必要，即是否認每個黨員在任何情況中所擔負的特別任務和特別責任，這即是在一個最負責的情況中——戰鬥中，拒絕自己底無產階級先鋒隊底領導作用，事實上，恰是在戰鬥中，黨員更負着對於紅軍戰士，應特別注意其行爲的任務，提高他們底勇氣，遏止慌亂，正確待遇俘虜等。自然，每次遇到新的情況，須有完全特別的工作方式及手段，這一切方式，是不可事前料到的，例如，某師政治部主任曾說，當與波蘭戰爭時有一次當他出去巡視伏臥於基輔要塞對面之戰壕內的該師先頭部隊之際，他遇見了兩個紅軍戰士手中像在工作着洋火匣子。他於是覺得有趣，看了方知是一個政治指導員，利用戰線上的平靜時機，給一個紅軍戰士在敘認

字。而洋火匣子裏邊却裝的從各種報紙及雜誌上所翦下而摺疊起的大的字母。這政治指導員從未離開他這種自造的字母匣，且利用每個便利時機，以之進行其掃除文盲的工作。還有在另一師內（駐於考羅氏金地方）沒有宜於演戲的，可容多人的房屋。師政治工作人員於是決定排演於露天。設舞台於武任小河沿岸之岩石上，而其周圍則宛如圓形劇場樣。

此種例子，是可回憶很多數量的，同時又難預定說在某種場合，必須利用什麼，及怎樣利用他來進行該項工作。只可說出一點：每個政治工作人員底思想工作愈多，他企圖實現政治工作之不間斷原則的努力愈大，則他愈有找到適當之工作方法的可能。

然須指出此種工作方法自應無條件地適合情況。在實際上，常有恰與此相反的錯誤；有些人企圖做那出乎尋常的教員，例如：要在戰鬪中進行掃除文盲工作。有一師，簡直說要「在戰鬪中組織圖書館工作。」

次一問題，即是關於工作突擊性的問題。常可聽到一種意見，說在戰時，政治工作應

是突擊性質的，而不是系統（經常）性質的。這種把突擊性與系統性對立的觀點，是不對的。設問的本身——突擊性或是系統性？——根本不正確，工作的系統和工作的計劃即在戰時，也是需要的，並且差不多比任何時還更需要些。實地說來，難道作戰命令——指示每個部隊完全固定的戰關任務及其遂行的時間——不是最準確而固定的計劃嗎？試問進行戰關動作，沒有這種計劃能行嗎？政治工作計劃，也同樣是需要的，最下級機關需要計劃，上級也是一樣。問題是在說，戰時須要的是何種工作計畫。此種計劃，恰應有充分彈性，應給與下級機關以充分的自動可能。

反對戰時政治工作的系統性和計劃性，其本身立足點底錯誤有二。第一個錯誤，是了解工作中之計劃原則之本身的不正確，我們常有一種官僚主義式的曲解計劃原則，企圖由上級預定一切，常致涉入細微瑣事。這種對於計劃原則的曲解，例如在經濟建設方面，有些黨員同志，常表現於辯論中。這裏，須回憶列甯同志指示我們，在政治及經濟建設上應怎樣了解系統與計劃。

「每分鐘內，都要會尋找鎖鏈底特別一環，要以全力抓住這一環，以便握緊鎖鏈底全部，並須準備結實轉到次一環。」（列甯論黃金底意義。）

這樣看來，各種計劃底主要點，不外是特別提出工作中之主要的任務，並對這種任務，加以最主要的注意。在這點關係上，作戰命令即可奉為計劃底標準。

第二個錯誤，是將我們過去政治工作的缺點移到將來的不正確，而且是把這些缺點，看成了原則的問題。政治工作，是在國內戰爭時，方才產生的，正與整個紅軍底產生一樣，多是由下級無秩序地自發起來而沒有上級底相當領導。政治工作的經驗，以前並未曾有過，祇是隨着鬪爭底過程而產生的，且祇是憑着各個政治工作人員底個人私自經驗做基礎的。

歸納這種經驗的開始，恐較為遲緩了些，所以差不多在整個的軍事時期中，工作始終頗帶有一種手工業的性質。一般地說，對於必須特別分出重要之任務的這種了解，是曾經說過的，所以提出了工作中的突擊性，然而預先考慮周密的工作系統，則不會有過。

不錯，工作的考慮也曾有過，但不是好的計劃，而是基於各個政治工作人員或其不大集團之有限的狹隘經驗，所編成的計劃。然在軍事時期內，對於政治工作，也曾有過企圖規定其系統的傾向，並且在這一方面——在由手工業形式的工作轉變到集中的工作方面，在許多軍團內，尚作有許多成績。特別光榮的事實，就是當一九二〇年與屋蘭格爾將軍戰鬥時，所進行之政治工作的成績。在這裏無論是軍事準備工作和政治準備工作，都是按照預先所詳細考慮過的計劃進行的。當國內戰爭末期，這種傾向於有計劃之工作的趨勢，已成普遍現象了。然而祇有轉到和平建設後才使我們有了綜合政治工作之零碎經驗的可能；並將這有計劃之政治工作的轉變，實現於全國底範圍內，此後接着又做出了相反的——關於「計劃」的——過度傾向。祇有現時，當全國政治工作人員第三次會議後，及在紅軍中經過黨的辯論後，才給此種計劃內，添入了關於活的領導及下級自動等必要的更正，而這些却是有經驗的政治工作人員早就主張過的。

這樣看來，有計劃有系統的工作，實是我們政治機關所取得的勝利品，他是絲毫不

應隨着戰鬪動作底開始而消失的，而恰是相反，他却應是戰時一切政治工作的母體。

現在祇來說關於戰時計劃底領導之最重要的三點：

一、政治工作計劃應協同於作戰計劃。

二、計劃應有充分的彈性，給蘇聯政治機關以廣大的自動。

三、應對政治工作的各個部份，提出各種不同的要求條件。

前兩項要求，不要加以解釋，也是可明白的。且來解釋一下第三項，戰時底宣傳工作計劃牠是一個長久的，不需指定的時期的工作計劃。其具體的完成，主要是依該部隊所受的情況來決定的。鼓動工作計劃，恰是相反，不可定出許多時間，而只可包含短期的，且此鼓動工作本身底舉行，尤應迅速而活潑。鼓動工作的任務，一面是由國際和國內底一般政治情況，而另一面，則由每個部隊內底政治和戰鬪情況來決定的。關於第一類任務，是由紅軍總政治部及聯共中央委員會決定的。第二類任務，則由一切政治機關（直到各個連底政治機關）來決定的。至於動員底計劃，供給紅軍之政治人員的計劃，及黨員

調動計劃等，則一面是由一般的戰略任務，而另一面，則由局部的戰術任務來決定的。所以企圖對於政治工作的各部份，當編製計劃時，要定出一般的原則，是不適宜的，因此，其結果常不外是重複一般最普遍的句子，如「師政治部給各部隊底任務，除依集團軍政治部底訓令為基礎外，還應具有多量的獨立性質。」（政治工作人員第三次會議關於組織底領導工作的報告大綱。）

在紅軍之軍事上和政治工作上佔有重大意義的，就是革命底勇氣。戰鬪情況要求須有偉大的勇敢犧牲精神，進備身受各種的痛苦。紅軍戰士，以及與紅軍戰士相伴隨的每個政治工作人員，常不得不遭受寒冷，炎熱，飢餓，疲倦的行軍及艱難的戰鬪。每分鐘都要準備經受莫大的犧牲及苦痛，要撐持得住這些，要征服各種困難而成爲戰勝者，須有偉大的精神力量。這裏的幫助者，即是健全的革命勇氣，他可幫助來克服所遭遇的一切不幸和困難，并激勵他人。

造成這種革命勇氣底環境，即是勝利底保障。在紅軍政治組織內一切政治人員和

共產黨員中間，對於訓練此革命勇氣，應加以特別重要的注意。要造成這種勇氣，全體政治人員首先須有和睦的，共同的，有組織的工作，須親密地彼此互相關結起來。對於政治和軍事工作，必須訓練出這種程度，使所託付之一切黨的任務，（無論覺得是怎樣小的任務）得以活潑及奮發的精神完成之。當然只一個革命底奮發精神，是不夠的。還要有了解，紀律，操守，準確，組織，及其他。「持久的戰爭，憑着激烈的奮發個人的熱心，是不能達到勝利的。這種戰爭，要求須有組織，準確，覺悟和嚴格的制御。」現時，日常的工作，只「注意細微」生活的時代，這是無疑地含有一種估量不到革命奮發精神之意義的危險在內。而我們却知道，工人階級底這種質量在革命過程和紅軍中，其作用是如何偉大。現在恰應重新指出這種重要的訓練任務——訓練革命奮發精神的任務，不然則無從征服戰鬥危難一切重心而取得勝利。

常有人說，戰時政治工作的重心變成了鼓動工作。這種斷定，並不完全正確。固然，因為戰時底宣傳工作，不能順利施行，而鼓動底任務，戰時却無論如何，都須實現，且鼓動工

作本身底形式，多適合戰時底條件。所以將工作的重心，由宣傳轉為鼓動，是很正確的。然照我們底意見看來，有些同志主張戰時完全停止宣傳工作，或只限在補充部隊內施行宣傳工作，當然是不正確的。軍事情況底本身，並不是繼續不斷的戰鬥。現代底戰爭，是逐步和鐵道移動的戰鬥與平靜的機動動作和伏臥於戰壕內的，或配置為預備隊等的配合。所以即是作戰軍團底部隊，也常有充分的時間，以進行宣傳工作。此外，現代底戰爭，常至延長數年之久。在這樣長久的時期內，完全停止宣傳工作，這可大大地減低整個紅軍，尤其是減低他底領導中心——黨的組織——底政治文化的水平線，而我們底任務，却應是適合軍事情況，並於此情況內，經常的提高整個紅軍底政治水平線，首先是對於紅軍底指揮人員和政治人員。例如對於新加入的黨員，不可不加以訓練和教育。必須經常的認識國際政治情況，認識各國政治黨派底活動；必須經常地研究共產國際及蘇維埃政府底政治訓令。不然，則不能有任何的政治領導。祇憑一個鼓動方法，未免笑話。這未免使政治工作方法，要發生莫大的退步。祇限於一種自修工作，也同樣是不夠的。試問才收

入黨之不識字的紅軍戰士，將怎樣進行其自修工作呢？所以即是掃除文盲的工作，在戰時並不得停止，雖然很明顯地這種工作主要是祇可施行於補充部隊內，然往往不得不向作戰部隊內，派遣尙未受充分教育的戰士，所以即軍事訓練，政治及一般常識的教育，且須補充之於戰線上的平靜時期，駐止於預備隊內時，或其他時機。紅軍政治工作人員在已往國內戰爭時的偉大成績，就是他們底掃除文盲工作，這種工作都是進行於不拘任何情況內。這種工作的範圍，固不可判定，然其意義，則不可忽視。但很明顯地這種任務的須要與否，每次將依具體的條件來判定的。在原則上根本拒絕這種工作，或在原則上要求無論如何必須進行這種工作，都是不適宜的。

至於區分戰時底條件，則像有些同志在政治工作人員第三次會議上所提出之區分野戰軍隊底政治工作和後方補充軍隊底政治工作，應認爲不是適當的，而特別是關於區別野戰軍隊與後方軍隊。誰伏烈斯同志在他底文章：「戰時底政治工作」內（政治工作人員，一九二三年十一月）自己承認這種區別，完全是一種假定的。所以應將戰

鬪動作底軍團，分爲一類，而將補充軍隊，另分爲一類。同時，無論是在某一種部隊內，均應依一般情況底根本條件——進行政治工作的情況條件——而分別之，這首先應適合一般戰術底條件。因此我們特分出下列的基本時機。

- 一、動員時的政治工作。
- 二、在梯隊中移動時的政治工作。
- 三、行軍期間的政治工作。
- 四、偵察期間與警戒期間的政治工作。
- 五、戰鬥期間的政治工作。
- 六、退却時的政治工作。
- 七、在陣地戰中的政治工作。
- 八、騎兵抄襲中的政治工作。
- 九、預備隊駐止時的政治工作。
- 十、補充部隊內的政治工作。

第二章 動員時的政治工作

動員，是戰爭底最重要證據之一，要求全國一切社會組織須有最大的努力。將人民從其日常和平的勞動中，家庭中，安適的生活中割開，使之受剝奪參加戰鬥，甚或死亡，這常要求統治階級以及全國須有最大的普遍的緊張意志。進行動員底順利，也只有有造成宏大而有力之社會情緒底高漲時，才有可能。每個統治階級，解決這種任務——在政治上準備戰爭之第一步驟的全國動員——的手段，都是各不相同的。

資產階段爲此常動員其整個的階級統治底機關，常施行其欺瞞及強迫手段，自上上帝，下至社會民主黨。但每個國家，並不是只限於一種鼓動，他不僅是以外交手段讓成國防情況底緊張，而且會造成提高社會情緒的因素。資產階級國家，在這時機，常不惜造謠裁禍，而且常不惜直接挑釁，例如，畢士麥會僞造愛木公文以達其顯然挑釁的卑劣手

段。

舊日沙皇政府，並常採用這種手段。例如鼓吹：「解放被壓迫之斯拉夫民族弟兄們」這種口號，（一八七七至一八七八年的戰爭）即其明證。

蘇維埃國家並沒有製造此種虛偽的必要。

然即在蘇維埃共和國內，將農民從犁耙離開，也常不是很容易的任務。這首先是被農民底不覺悟性及不開化性所阻礙了；農民從沙皇政府所給與之黑暗及政治的愚昧下，解放出來，是很困難的。

然就是農民明白自己底利益，仍然不足推動農民去參加戰爭。

農民常常甚至知道自己底敵人，但還要說或可不至輪到他身上去。

農民底這種心理，戴赫別特乃同志在他所編的「遠行」歌內，是描寫得很漂亮的：

「娃尼，你不要去當兵呀！

紅軍裏的刺刀，自有人使用他。

離了你，布爾雪維克難道就不成嗎？

媽媽要是沒有你，會想得白了髮。

你，在田裏和家裏好多的事呀！

事情現在是怎樣的安適可愛啊。

一下子就給了我們這麼多的土地耕種着。

所以即在蘇維埃共和國內，動員一事，也要求我們黨，蘇維埃，及職工會的一切機關，須對之加以集中的注意。

一切中央的力量，均應集中到動員方面，因為戰爭的過程，多以動員的順利為依賴的。

動員時的政治工作，同時一面進行於紅軍中，而另一面則進行於一切人民中。

當國際狀況開始緊張到對於蘇聯發生戰爭危險時，紅軍應從平日的工作中振作起來，開始極力準備應付可能的戰爭。這時，無論如何尙未可縮小經常所進行的軍事教

育及政治訓練的一切工作，然而主要的注意力，却應集中到戰鬪訓練方面，以儘可能的軍事動作。政治工作的中心任務，這時一面是鞏固紅軍中的黨和政治的一切機關，而另一面，則是對於紅軍戰士，完全正確地施行鼓動宣傳工作。這時期的鼓動工作，須與宣傳工作佔同樣的地位；宣傳工作絕對不應停止，他不過轉向注重研究國際政策方面去了。

關於政治組織工作，首先應加強紅軍中的政治人員。所以在這時期，常應先行動員共產黨員。這種共產黨員的動員，是經過相當的軍事委員會和地方師參謀處進行的。

政治機關，應在動員共產黨員之問題的周圍，開發廣大的組織工作和鼓動工作。第一，必須正確地定出徵募的技術，檢查軍委及地方師參謀處的工作能力，檢查發出一切號令的準確性，固定性及淺明性，在物質上準備徵募事宜（收拾集合場，準備食糧等。）動員共產黨員的計劃，應精密計算，務使被動員的黨員，得於最短期限內可達到指定的地點。這要求須在各師間正確地分配所動員來的黨員，須計算其民族和社會成份，及其政治和軍事程度。關於黨員的民族問題，是有特別意義的。一方面，蘇聯有許多民族（如

且輕側、營古師、沙爾德、達德、日克等，)直到現在從未參加過軍事義務。當編製動員計劃時，這種情形，是必須估計到的。另一方面，因國際情況複雜的關係，或須要增加某一民族之共產黨員的數量。

例如，當與波蘭戰爭時，必須供給與波蘭戰團之各部隊以波蘭共產黨員。同樣的，當與愛邦多尼亞戰爭時，必須多量動員愛斯多尼亞的共產黨員。

在動員共產黨員的問題周圍，必須進行大的政治工作。各級黨部，對於進行動員工作，不是都能夠同樣積極的。在偏僻的農民區域，動員或可引起某種遲疑。必須使每個黨員，預先得有準備自己動員的可能，在政治機關與地方黨部間工作的協商正確，實是動員共產黨員之順利及迅速的先決條件。動員共產黨員的命令，必須與地方黨部協商之，而地方黨部，則應盡力協助此項工作。在這個準備期間，最重要的，是一切黨的組織，須及時在自己中間，進行討論國際情況，因此必須利用黨的小組黨員大會，支部會議，代表大會等。

在集合場的周圍，亦應開展多量的政治工作。必須對動員黨員加以相當的注意力，並給黨員以精神的及物質的援助。一方面，必須顧慮到被動員之共產黨員的家庭，而另一方面，則顧慮到被動員的本人。應保障黨員之家庭以相當的津貼，工作及其他。被動員之黨員的家庭，應知其與一切被動員之人的家庭所同享受的權利。至關於被動員的同志，地方黨部及政治機關的任務，在於給其以相當的物質和精神扶助。方法是平常所用的：送別，供給以必要的爲在紅軍中工作的書籍及小冊等及其他。我們黨的組織之一致與日趨鞏固，告訴我們說，關於這方面的問題，將來未必可引起若何的繁難。一九二三年德國事件在我們中間所引起的那種高潮，被動員的同志開赴紅軍時之那種熱烈，以其請求書塞滿黨部之自願投入紅軍的同志那麼多，於此可見一斑了。

被動員的同志，到集合場時，應經過醫生檢驗。政治機關在這裏的任務，是醫生檢查委員會和徵募委員會的人員成份及其工作的正確（壞蛋的東西，常可遇到的，設法不讓他們鑽入，却是各級黨部的任務）。當動員後，黨員便分別開赴自己的部隊。當移動時，

補充去的共產黨員並不需要很大的顧慮。然無論何時，其所經過之鐵路線上及城市之地方黨部，均應對之加以相當的注意。至於其所應到達的部隊，則應及時準備其收容事項。

被動員的黨員，應直接從集合地點派往所指定的師內，無須逐次經過各省軍事委員會軍事區域政治部。因為這可免去無謂而多餘的跋涉及阻滯動員的進行。

在紅軍部隊內，對於徵來的共產黨員，應加以相當的迎接，政治部應將他們置入自己的工作範圍內，使其熟悉本師之政治的及物質的狀態，本師過去的歷史及最近的任務。所以最適宜是將此共產黨員的補充在政治部內稍為停留幾天，給其臨時準備住所及此數日的飯食。政治部諸負責的政治工作人員與新到的諸共產黨員直接的接洽，注意其各種請求及需要，這些對於將來補充共產黨員的工作，可發生最大的好影響。所以我們主張在師的政治部內，對於新來的共產黨員補充，組織一短期的訓練班。當一九二四年提前徵募黨員時，有些區域會拒絕進行此種工作，而委諸所屬各團進行之，其理由

是說缺乏工作材料，且說只有在各部隊之實際工作中，方可收得最好的訓練效果。後一理由，只有一半是對的。當然，最好是直接在實際上，使其認識政治工作的方法，形式，及任務。然預先如有準備時，則此種認識，就要容易多了。只有師政治部才能分派出有充分學識的同志，以訓示補充共產黨員關於政治工作的一切重要問題。此外，政治部，無論何時，都不應拒絕與一切黨員羣衆發生更密切，更接近，更親熱的聯繫。

在師政治部內經過相當訓示和按各部隊分配後徵到的同志，即赴各該部隊之政治委員處而開始其直接工作。團政治機關的任務是相當的歡迎新到的補充黨員。這時，最好是在團內一切支部舉行全體黨員公開的歡迎大會，將新到的同志納入自己共產主義的家庭，並可利用新到之共產黨員的機會，來提高一切紅軍戰士的情緒，使其看見工人階級及其先鋒隊共產黨對於紅軍的扶助。其次團政治部應訓示新到的同志以目下的任務後，使其認識本團的歷史，本團最好的風紀；且對於此新到的補充黨員，設立專門談話會，以研究紅軍的黨的建設問題，使其熟悉目下政治工作的任務，政治工作的新

方法和形式，及其組織，並使其熟悉現時紅軍之建設的特點及其他等。因為事實是這樣的：紅軍常時日新月異地變更其組織及技術，離開紅軍數年的黨員，當然就有點生疏而不能完全明瞭，至於從未在紅軍內服務的黨員，更不用說了。

即在補充黨員中間，軍事教育和軍事宣傳，亦應加以大的注意。

軍事技術問題，化學戰爭及空中戰爭等問題，都應佔有相當的地位。

這一切準備工作，應即刻與實際工作連繫起來；各支部依新到之同志的政治程度，而給與其以相當的黨的任務，這樣，新到的同志，便與黨的組織相接合了。

黨的工作，在這個過渡時期，應特別振刷起來，應俱有另一種速度——戰鬥速度。在這時必須加強訓練每個黨員的質量，以適應戰鬥情況：堅強而親密的紀律，迅速的工作速度，勇敢，犧牲精神，及其他等。對於研究軍事，應加以堅強的注意力。各支部須將其工作重心轉移到討論一般政治情況的問題上。假如在部隊內，因某種原因，不曾設立連的支部時（例如因黨員的數量不充足），則在這過渡期間必須利用新到的補充黨員設立

之。

關於政治組織方面的工作，其主要任務，乃是政治機關和黨機關對於可能發生之事件的準備工作。此種準備工作，一面應是書信的指示，而另一面，則是諸負責政治工作人員的會議；例如，軍區內之各師政治部主任會議，各師內之政治委員會議各團內之指揮人員和政治人員會議。這些會議上所應討論的基本問題如下（一）關於國際和國內狀況的領導報告，（二）黨和政治工作目前的任務，（三）動員時的政治工作。

在此時期，應從上至下，檢查一切政治人員是否適宜於戰鬪情況。

組織方面的工作應是檢察和準備一切政治人員，使其熟悉戰時的編制定額，並準備戰時的通報。須知戰時的政治機關，其組織自然是較平時要擴大許多。當發出動員命令時，方開始選擇相當的政治工人以填充戰時的定額，已經晚了。須預先使這種備選人員得準備其所將擔負的新工作。例如在有些師內，常指定有力的同志，以充參謀處警備隊之政治指導員以備於軍事動作時期，即可使他擔任參謀處政治委員的職責，而這種

職位，平時却是沒有的。平時，在團內沒有通報書記，而其作用在戰時却甚偉大，所以相當數量的通報書記的幹部應預先準備之。

關於鼓動宣傳工作，像我們上面說過，鼓動工作的意義是增大了。鼓動工作的基本任務，應包括國際政治問題，政治工作人員第三次會議的決議案，關於德國革命和我們鼓動工作路線問題，決定鼓動工作的基本條件如下：「（一）已開始之德國的國內戰爭應成爲我們在紅軍內之一切鼓動宣傳工作的焦點。對於每個紅軍兵士所感觸並且不能不感觸之關於我們聯邦內的一切生活景况問題，須嚴防忽視與不理錯誤；必須使紅軍的一切羣衆學會以局部問題服從基本的時勢；於新的戰爭危險前，加強我們的國防。」根本的步驟，在於要「與最落後的勞動羣衆一齊」務須「使每個——甚至是最不覺悟的——紅軍兵士，明瞭他的小村落小經濟的利益，與德國國內戰爭的發展有怎樣的連繫？」因此，根本的口號應是「把革命與工農日常需要的口號」連繫起來。關於德國革命的問題，這種根本的口號，就是關於在我們與德國的鬭爭聯繫的問題。

在該決議案內第六項又說：「具體分析由德國革命而釀成之國際關係的結論，指示說紅軍兵士羣衆，應明瞭徹底武裝着的帝國主義者所給與我們之實際的鬭爭危險，企圖破壞我們與德國工人之經濟的聯合，所以準備與戰爭反對我們和德國。『準備着』的口號，應與我們的一切運動相伴隨。」

「我們在德國事件周圍的一切鼓動工作，應切實進行。必須使紅軍兵士每日注意德國國內戰爭的發展，使他了解鬥爭的基本集團，使他同我們一塊兒在地圖上尋出鬥爭的勝利和失敗，使他積極地感受事件的過程，使他看見爲求自己解放而鬭爭的德國工人階級是自己的同盟者。德國和歐洲的地圖，應該是我們在鼓動德國事件的問題上，所須要的基本參考材料。」

這個決議案不僅是給我們關於過去事件底指示，且給我們關於將來事件底處置方法。

必須求特別詳細解說關於鼓動方法底內容問題，這是因爲在過去經驗中，我們尋

出了政治工作人員所作的許多錯誤。在過渡時期，鼓動常居重要地位，鼓動中的每個錯誤實可召致嚴重的結果。由此可知在全國政治工作人員第三次會議上，軍事委員會主席為何那樣精密解釋了對紅軍兵士之正確鼓動的必要。他說：「要使每個紅軍兵士對於我們與德國勞動羣衆間之根本利益的關係，能澈底明白了解。」我們並不要求波蘭政府來實行我們底政策，正如我們不想實行波蘭資產階級底政策一樣。我們只要求自由的運輸，每運輸一里，我們出一里運費。如其不然，我們即無出路。如農民能夠明白因此德國革命也就沒出路，則這便很好；無論怎樣，我們底鼓動工作的出發點，應是給農民說，假使我們底麥子不能運往德國銷售，不能拿銷售的錢來購買德國底工業出產品，則我們積壘的多餘麥子腐朽起來，即可致我們底死命這就是說，「整個問題在於波蘭願做橋梁或是願做牆壁。」提到運輸，並不是說使我們或波蘭想企圖戰爭，他不過現出我們與波蘭都約定不干涉德國底武裝關爭。不然則濱印省底麥子無從運到德國底市場去，德國底工業出產品，也就不得到濱印省底農民手裏去。這是彼此互爲因果的。這是人人

都明白的實在情形。「我們是想使德國革命周圍得到和平而鬪爭的，這就是我們在軍中最近期間之政治訓練工作訓練。」「農民和工人願意和平，而他們底這種和平心意蘇維埃政府即拿來放到自己政策底基礎上。然而，同志們！這絕不是說，我們即不應當準備戰爭。」至關於工作方法，他說有如下的話：「我們要在我們頭腦內，形成一種基點，使他緣着這點好像升梯似的進一階又一階，要使他今天記得昨天給他講的話。」「要喊醒他，使他日日注意事件（因情況時時變化），而不使他僅聽些一般關於德國革命的抽象言論，關於共產國際及其他等普遍的話，就算了事。」「要這樣接近他使他用頭腦思索一切，使他逐日前進，使他能夠得到每個新事件底具體消息並知道我們隣國之政策底主要本質以及事件發展的情形。不可使軍隊在一兩月內，毫不預聞一切，而忽然立刻給他堆積如山那樣高的事實，應這樣進行鼓動，使農民底腦中得注入相當有關係的事實，那時他照正確方向進行其工作。」

發展每個農民和紅軍兵士對於明瞭己身利益與國際政治問題之連絡的程度，應

參入於部隊內鼓動宣傳工作一切形式中。俱樂部，紅角，政治課，均應充滿這種工作。描寫足可引起戰爭之國際事件的掛幅，讀報，表演，相當的戲曲，紅軍歌，政治裁判，口報，牆報，個人談話等，均加_以成爲此種任務的施行者，且每個工作形式，都不應是抽象的，深遠的，即應是具體的，拿出事實來，首先給紅軍兵士以國際關係的確切事實。鼓動應隨時漸進地增強起來，並逐次緊張，無條件地遍及一切紅軍羣衆。然在這裏不應有過度的，多餘的驚惶，絕不應有的過量估計當前的危險。自我們聯邦變入和平狀態以來，在我們前面的軍事危險，已經不是一次了。政治工作人員，有時所寫的口號，居然超過了事實。例如當我們在改奴耶（一九二二年春）與德國舉行和平會議時，某軍區政治部提出了「持槍」的口號（紅軍報紅色戰士內的第一篇論文底命題。）我們知道接着這個「持槍」的口令，第二個口令應是「排底齊放！」而這種情況，當然，那時是不會有過的。有這個口號，形成了過度的感覺；而其產生，則絕不是根據政治人員所知悉之實在事實而來的。所以這個口號會引起了很大的疑團。及至戰時情況轉佳後，這個口號就活現出了他底不正確，

這種過度的跳躍，應避免他，正如敵人喊狼的故事一樣，假喊狼來，農民被欺騙了不止一次，當狼確實出現的時候，農民却不出來救你了。對於紅軍兵士，也可弄到這步田地。一次兩次地造成緊張的心理狀態，這是須要耗費鉅大精力的，經過數次這種騷擾後，紅軍兵士底心理，必至非常地疲憊，遇有真正危險發生時，已是不能相當地來應付他了。

在過渡期間，宣傳的基本內容必須適應情況。政治課仍照常繼續上課，但應分出一部份時間，以研究時事問題，國際政策，及可能的戰爭危險。政治課底教育計劃，須加以更改，添入研究將來的敵人，國際政策，及其他等各種小組工作，仍須照常進行，但須應適新的任務。掃除文盲的工作，無論如何，不應間斷，即使有不可按期完結的危險時，亦然，因為警報是可渡過的，而工作停頓的結果，都是政治及教育工作的大損失。一句話，經常的工作，應以經常的速度進行之，祇增加以新的任務罷了。

在準備時期，關於紀律，軍隊應該開始在軍事管理下加緊起來。首先應施行政治精神的訓練，跟着即加強紀律及法庭底裁判。但不可只限於此種方法。

紅軍底政治精神訓練，應與人民底一切政治訓練密接地互相連繫起來，紅軍與人民間的關係，如斷絕時，會很不好地反映到紅軍底政治狀態上去。紅軍戰士常與自己村莊及其村莊底利益，保有若干連繫。鄉村人民對於國際政策的興趣，紅軍戰士鄉親對於此種問題的訊問，即可引起紅軍戰士來注意研究國際問題。在另一方面，如動員人民時，對於人民事前不曾施行過相當的適時的較久的政治訓練，則動員本身底進行，即不能順暢，而被動員到部隊來的人，對於事件毫無相當的政治瞭解，即可大大地減低該部隊底一般政治水平線，這立刻反映到該部隊之紀律及戰鬥力上去。由此可知對於人民的政治訓練以備可能的鬥爭，為何要加以特別底注意。各地方黨部，均應竭力動員人民對於國際政策的注意。某處地方黨部，對此問題如表現得不充分積極和銳敏時，其附近政治機關底任務，是要消滅對於這樣重要的政治問題——關係於蘇維埃聯邦底命運和工農民眾底利益的問題——的消極態度。

為對於人民施行政治訓練，應動員與地方人民相接觸的一切組織：黨和青年團底

支部、職業工會、蘇維埃機關、互助會、協作社，及其他一切社會組織（運動會、文化組織、教員組織等。）應利用一切可能：每個區、縣、省底蘇維埃代表大會，城市蘇維埃常會，各種組織底會議及代表會（協作社底，互助會底及其他等。）均應在其工作的日程上，把關於國際政策及由此而發生之我們底任務放在第一項，並應在各該會議上，討論其能如何協助進行一般的政治任务。

鼓動與宣傳底基本內容，與在紅軍內相同：應從勞動民衆之具體的需要做出發點，將他們底利益與國際政策問題連繫起來。特別應不間斷地進行這種宣傳，並不只限於戰爭危險的可能時。第十三次黨的代表大會，完全固定地指出必須經常的吸引人民對於國際政策的注意。「人民外交委員會應成爲鄉村中最通俗的委員會之一」因爲須有農民參加，我們才可解決問題。我們給外國資本家還不還賬，還多少，以若干利息還外債，運出多少麥子，這對我們底國際政策能起若何影響，及其他等。

這種工作，隨着軍事危險的接近而愈應增加起來，使於宣佈動員時，可達其最大的

緊張程度。

在民衆中鼓動和宣傳底任務內，不僅應包含使民衆認識國際政策，且應包含平時設置完善的軍事宣傳，介紹民衆以軍事底基本知識，現代軍事技術底狀態，及由此產生之防禦我們共和國的任務。在動員底準備時期內，此種工作應增加的原因，是要想在心理上使紅軍戰士來準備軍事工作。

準備動員底工作，無論如何不應祇限於鼓動與宣傳。爲鼓動與宣傳底順利起見，必須注意研究人民底情緒，其中不同的集團，必須研究人民是怎樣地反應國際底各種事件，必須預先劃出在政治上不可靠的區域來，以便在這些區域內集中黨的力量，實行把他。他在政治上，改造一新。黨的領導機關底注意力，不可平均分散於其所屬之一切地方內。在政治上較爲堅強的區域，即可依其自己力量完成其任務。黨的力量薄弱且在政治上不可靠的區域，應以相當數量之黨的工作人員加強之。

當研究人民底政治情緒時，應特別注意調查及審計敵對蘇維埃政權之政黨底的

工作。在這裏重大的任務，須由特務科及政治國防機關担任。這些機關內的人員，應相當地增加，並須加以訓練。敵黨的組織，不但應揭破，並應深切地研究他對居民的影響，他底口號，他所活動的戰術，舉凡這些，在我們底鼓動宣傳中，都應找到相當的扶助。

動員底秩序，我們有兩種辦法：經過各省軍委會與經過各地方師。依辦法的不同，政治工作跟着也有些差別。

在準備時期，軍區政治部應檢查進行動員之機關（省軍委和地方師）底工作能力及其準備的程度。應增加其機關內的人員，對這種工作，無須顯借力量，動員底熱烈時期經過後，一部份工作人員，將來或可裁減去，然在動員時期內，這些機關均應在組織上和政治上極爲完固，因爲在他們肩上，放着非常負責的任務。設使在組織上，最重要的任務是：檢查徵募人數底名單，準備和檢查收容徵募人底集合點，供給其食物用品，設置醫生委員會等，則在政治上，這種最重要的任務應是：於集合點內組織鼓動處，準備政治指導員的幹部，及準備紅軍兵士到集合點的一切政治工作。

在紅軍內選擇勞動份子及在後方預備軍內分出不勞動份子，實是動員之政治及組織的中心任務。在紅軍中，不容許商人，富農，及一切非勞動份子立足，他們祇會破壞紅軍。平時富農常企圖鑽混到紅軍裏面，想經紅軍以恢復其公民權利。戰時，這種企圖，並非不會有的。恐相反的現象更要多些：膽怯的勞動份子，或可企圖經後方預備隊逃出紅軍去。所以對此問題，須加以精密的注意。這種工作的困難處，現時更為增加了，因為現在要區別富農與勞動農民，並不是很簡單的事。設如從前判別這個問題最好的標準，是農民所有的土地和農具，那末現在第一個事實——土地——已經失去作用了，因基本的土地法，定出了使用土地的平均。

農具，牲畜的數量，也不是常可用來識別富農的。季諾維也夫一九二四年六月在列城黨的積極份子會議上關於我們對鄉村的政策問題說過：「不是對一切富裕的農民，都可宣佈他是富農。我們有時對一切吃得飽的人，都宣佈是富農，這是不對的。試問在我們的工農國家內，如農民——端正的主人——的事務，多少還算安置適當，如他能及時

完納賦稅，能穿得暖，能使閨女出嫁並能配些粧奩，那麼這個我們就可宣佈他是富農麼？這種觀點是錯誤的。列賓曾教我們識別農民方法，說我們應分析是何處農人：西伯利亞的農民，是一回事，而烏克蘭和伏爾加的農民，又是一回事。西伯利亞的農民，即有五匹馬，也常不見得就是富農。我們要拿空間、時間、境遇來看。』為正確判別鄉村富農，須注意分析其與勞動農民及貧農間的關係，他是否用租田、高利貸、商業、及造酒等方法剝削別人。鄉村中的剝削形式，常極祕密，要發現這種剝削，從事外表的形式，是不行的，必須確實知道鄉村農民的相互關係，及其生活。所以當選派到後方預備隊時，不可只限於一種形式的條件，而應探討其真正的相互關係。因此在選擇委員會內，必須加入每村底代表，當分析該村居民時，須用各種問題及與其他農民談話的方法，特別是經過該地黨部、青年團部、互助會等以調查各個居民是否屬於剝削份子。此外，可拿該地被剝奪選舉權的人民單及完納賦稅的人民單，作着手研究的出發點；但只憑藉這些名單，還是不夠的一面。應檢查這種名單是否正確，另一面，應以補充的談話及其他方法來堅定自己的工作。

爲預先準備及檢查此種工作起見，必須事前指定各鄉區底負責代表，使其就地準備一切必要的工作。自宣佈動員時，即以之担任一切鼓動工作。

在政治上不可靠的區域內（或可阻滯動員底進行，或甚至可發生直接企圖發言反對蘇維埃政權的動員事實），特務科必須加強其間諜工作，並須供給以充分的軍事力量。

動員的進行，應迅速，準確，而不混亂。黨和蘇維埃的一切機關均應參加進行動員的工作。鼓動宣傳工作，跟着宣佈動員的開始，應達到最緊張的程度。黨，蘇維埃，及各種社會組織的一切注意力，在這時期內，應完全集中到順利進行動員方面。這時，沒有且不能有比較動員更重要的任務。不願參加這種工作的組織，即是反對革命及工人階級利益的莫大罪人。創造社會一切勞動階級情緒的高漲，實是動員成功之基本的先決條件。每件事情，只要他稍可補助這種任務，均應設法利用之。

政治工作，在動員的每個階段都應有。由此觀點出發，我們分做下列數項研究：（一）

在村中及縣中的工作，（二）在赴集合點或赴地方部隊時之路途中的工作，（三）在集合點內的工作，（四）在開往本部隊之路途中的工作，（五）部隊對被動員者的歡迎。

在村中及區中的工作，首應開始吸引縣內一切黨部參加動員工作，因他是全縣的樞杄，可引起縣內一切其他組織的運動：青年團，互助會，各種協作社，教員組織等。如在區內有某工廠作坊的企業時，必須使職工會及一切非黨員的覺悟工人參加工作。土地樹木職工會，在這種工作上，或可成爲特別重要的支柱。區黨部應不倦地探索各種工作形式，以擴大其在動員時的影響，並不祇限於上面所說的諸組織。如在縣內可能召集農婦代表及上屆被撤去之紅軍兵士之妻室的會議時，須盡量舉行之。工作不只限於鼓動與宣傳。對一般政治的及經濟的辦法，應加以切實的注意，應及早着手組織被徵者家眷協助，使其於動員開始時，得有活動的具體結果，以便被動員的農民相信其家眷可獲得援助。其次，尚須有警告由處置以反對脫逃的。可能應給人民通知關於懲辦脫逃的處置。同

脫逃鬥爭的方法，只憑鼓動宣傳工作，是不夠的，要把企圖隱藏在樹林內或鄉村內的脫逃者拉出來。為達此目的，可利用軍隊力量，或組織自願捉拿隊。脫逃須根本剷除之，切勿使其發展及組成其獨立的「綠色黨夥」。在將來革命戰爭時，我們國內絕不許有「綠色黨夥」。革命軍事裁判機關直接下鄉審判，不惜收沒脫逃者及其隱藏人之財產等嚴厲辦法，都應適宜施行之。

一切地方機關及蘇維埃，對於動員時在所不免之醉酒應加以大的注意，並行切實的鬥爭。蘇條件地加強與酒徒鬥爭，關閉各種售酒營業，實是動員順利的必要條件。這裏有特別顯明指出與酒徒最刻毒鬥的必要。一九二四春，在古板省所屬諸縣內，對於與醉酒鬥爭，却有另一種見解：禁止富農喝酒，反來對於「貧農」一點也不干涉。這種「反酒鬥爭的階級政策」（像當地執行委員們所說的），與共產主義，實無絲毫共同點；在動員時期，這種政策，將是最重的罪過。

動員時期，在縣內鼓動的基本內容，應是：（一）解釋國際的一般情況及動員的原

因，(二)鼓動被動員者及被徵募屆時出席並解釋脫逃的罪過及懲罰的處置，(三)解釋民政及軍政機關關於徵招所發佈的法令及號令。此外，須解釋徵募的秩序，何人應被徵募，何人有權享受優待及其原因，應穿什麼衣服鞋子前往等。鼓動並不應注重各種形式，而其要點在使農民能夠確切明白並通俗。要利用每個具體的事實來造成全體人民精神的高漲，以便組織成全縣的社會公論，藉以督促被動員者之前往應徵並使其覺到為公衆的利益而鬥爭。鄉村農民大會，縣蘇維埃代表大會的莊嚴會議，可用做此種工作的形式。最好是在這種農民大會或蘇維埃代表大會上，有紅軍部隊的代表和工廠的工人代表參加，由他們發言指出工人紅軍與農民的聯合。鼓動的方法，不應只限於語言。如有往鄉村中運用電影機器的可能時，必須利用之。無論何時，均應往鄉村中派出裝製完備的鼓動車，載以必要的標語宣傳品，尤其是通俗而淺顯的掛圖。特別重要的，是要加緊現有之政治文化組織的工作，如閱書室，學校，俱樂部等。必須對被動員者，組織莊嚴的送別。對被徵募者，應加以各種的注意，使他感覺到自己所負之完成公民義務及保護工

農公衆利益的責任。這種工作，最怕的是以官樣態度對待他，須這樣進行工作，就是說，要使這種普遍的高潮，如直接由下面造成的，要使他如從農民羣衆本身中發生的，要使他不會有任何勉強，逼迫，或官樣的成份。全村所尊崇之某老者的幾句簡單送別話，有覺悟之婦女或被動員之農民妻室的熱烈語言，農民的兒子幼年兒童團的祝辭，紅軍兵工的勇壯唱歌，未被徵募而自願從軍者的奮勵演講，被動員同志的堅決盟誓，舉凡這些以及其他適合當地情況的等等方法，均須用來以達真正的內部的，而非外表的效果，須要少講空洞而冗長的言論，一般的話，及無用的好聽名辭，這種話有時只可侮辱農民；須多說些簡單而自然的話，說得要銳敏，誠懇，要有同志的感覺，要喚起對徵募的勇氣，要從農民羣衆本身的心坎中吐露出來。

在開赴集合點之路途中的工作，是由政治指導員施行的，如沿途有政治文化組織並且沒有政治所時，並由後方施行之政治指導員，是在每五十人內，派出一人。所須要的黨員或青年團員數量，亦可直接從被動員者中擇出；在另一方面，地方縣黨部亦可派遣

專門人員充任之。政治指導員應事前經受一番訓示，並應領受必要的鼓動材料。

在往集合點的路途中，祇希望鼓動處的工作，常是不行的，因為我們鼓動處的網，沒有這樣多，不能在各縣及各州之集合點都設立有的。通常只有在大火車站地方，才可組織鼓動處。即有此鼓動處，亦須在往集合點的路途中，利用一切閱書報室，於其周圍組織被動員者中的工作。如某處有農民房時，其工作自應供給過道之被動員者的需要。亦可介紹在各縣主要地點組織站房，在其周圍發展政治工作。

在路途中工作的根本任務，在於同醉酒，混亂，狂蕩等鬥爭，以保持強壯的革命情緒及對於動員的覺悟態度。特別有指出提高被動員者之勇氣的必要。所以在路途中鼓動，應含有生氣，雄壯及熱烈的精神，然絕不應涉入輕浮，卑鄙。

在路途中的工作形式，不能十分豐富，且主要是須集中於讀報紙，蘇維埃雜誌，滑稽刊物及戰鬥回憶，革命軍歌等；在提琴周圍之簡單而原始的娛樂，唱歌，跳舞，講故事及滑稽笑話等，這就是在這種情況中最淺易的工作形式。

至關於閱書報室，則其鼓動在這時期，應大大地擴展起來。他應變做小鼓動所模樣。在他中間須設置輪流值班員；此值班員由地方黨部的黨員及團部的團員充任之，且須吸入其他組織，如教員會，互助會等加入之。這種鼓動所應從州黨部，政治文化機關及州軍委處得到必要的幫助。這種鼓動所應供給以相當數量的掛圖，宣言，標語，及報紙等。鼓動所值班員應設各種方法將過道之被動員者吸引到自己的鼓動所來。所以這些值班員不應祇坐於自己的鼓動所內就算完事，而應與過道農民所必宿止之附近的站房發生連繫，在路傍，橋上，渡河點及其他著目之地點張貼起掛圖來。鼓動所應設於往集合點去之重要地點，尋常的站房附近，喂牲口的地方，尋常的渡河點及其他等處。很重要的，是鼓動所本身不應只限於鼓動工作而已，且須加以經濟的幫助（如尋找宿所，飲食處等）。鼓動所對過往者得舉行短促的歡迎和歡送，因此可利用該小縣地點所有的一切可能。（如唱歌組，音樂會等）

在集合點的政治工作是動員期內一切政治工作的最重要的部份，這種工作的根

本任務仍是與騷亂、醉酒等現象鬥爭，提高被動員者之雄壯的革命勇氣，解釋國際政策與動員的原因及任務。政治工作在這裏絕不應只限於一種鼓動與宣傳。必須對各種生活問題及經濟問題，亦應加以大的注意。通常在集合點設有給養所。在這種給養所的周圍即應組織政治工作的主要部份。祇組織一個給養所是不夠的。將來革命戰爭時，所裏新經濟政策，大概還不至取消。不許被動員的紅軍兵士與私人市場發生關係，實是政治工作的重要任務之一。完成這種任務的方法，是於集合點旁，須組織一協作社的小舖。最後，問答工作應佔政治工作的一個重要部份。一方面，問答工作將給紅軍兵士解釋一切關於動員的問題（關於動員的秩序，動員的優待權利，關於對脫逃的懲辦法，對被動員者家屬之援助等。）另一方面，須知隨着被動員的人必然會來到其許多親戚，他們對於協作社問題，賦稅政策及土地政策等都是急於知道的。必須記着，像動員時州縣的這樣代表大會，在鄉村生活中，是不常見的。所以應利用這種居民代表大會來貫輸農民以蘇維埃的經濟的及商業的一切問題。例如，應該在集合點的周圍，組織起售賣鄉村需要的

機器及農具的信託社。這種工作，在平時每屆徵募時，更須擴張起來，因這種徵募，是不甚破壞鄉村經濟生活的。

爲施行一切問答工作起見，須在集中點內組織一問答部。問答部應俱有必要的材料，並須設起經常的值班員來答覆紅軍兵士的各種問題。在集合點內，又應保障幫助紅軍兵士寫家信，寫紅軍兵士臨時發生的各種請求書等。

鼓動工作，進行於各種不同的形式下，這種形式，須是集合點周圍所應成立之政治組織的能力可作到的。不可涉入複雜的工作方法。工作應帶鋒銳及吸引的性質。描寫蘇維埃生活或紅軍生活之一幕或二幕的短劇，關於國際政治的表演，適當編成並有被動員者參加之活報與口報，高聲讀報和諷刺的詩，革命的歌辭，對於臨時事件（對逃營者及國際政治）之輕易的鼓動審判，電影，留聲機等，——這就是在集合點最淺易的工作形式。利用提琴，三絃，及其他民衆的樂具，可引起許多到來之被動員者的積極參加。最後，組織各種各式的遊戲（利用每個俱樂部所有之遊戲器具）不僅是吸引被動員者到

俱樂部去的好方法，亦是俱樂部內所應有的重要工作。

俱樂部底工作人員，在集合點上，亦不應候紅軍兵士到他那裏去。被動員者，通常是集聚於徵募委員會底周圍，房門外等處。鼓動與宣傳工作的各種形式，應自己越出俱樂部來接近被動員的羣衆。張貼完善的掛圖，招待的口號，語言的號召及通知，其他的視號（搖鈴通告，吹喇叭等），均應用之以「吸引」紅軍兵士到俱樂部去。此外，諸政治工作人員，應散布於被徵募的羣衆間，以進行談話並探查其情緒。

集合點底政治機關，應負責訓練政治指導員，將被徵募者從集合點送往派定的各該部隊去。所以政治機關內計劃分出相當數量的政治指導員，將他們事前加以訓示，指出其在前程移動時之政治工作任务及方法，如有可能，發給他們以道路圖書館準備給被徵募者的贈品且務須組織莊嚴的送別。

在梯隊中移動時的政治工作，由梯隊政治委員及政治指導員進行之，基本的任務同前：解釋時事及戰爭任務，提高革命底戰鬥情緒，與搗亂及醉酒鬥爭。當出發前，政治委

員應考查其梯隊底成份，政治情緒，民族成份，社會成份，黨員若干，團員若干，互助會員若干，職工會員若干，以便在路程中借助他們以進行自己底工作。或無組織黨的臨時支部的必要，特別是路程不遠時，然集合黨員，使互相認識，對他們加以訓示，給其在非黨員羣衆中進行鼓動的任務，這都是必要的。須特別注意領導政治指導員們底工作，應供給他們以必要的材料，並在移動時，對他們加以訓示。當移動時梯隊政治委員應與各地方鼓動處發生連繫，利用鼓動處以進行政治工作及組織各種娛樂。特別重要的，是經過鼓動處在路途中共給報紙。

在路上以供給小的道路圖書館爲有利；可供給每組出發的被動員者；並向每組派遣政治指導員，或梯隊政治委員。

問答工作，給紅軍兵士寄家信，在路途上，亦可組織之。

鼓動的形式，自然是很簡單的：各個的談話，讀報，故事，戰鬥回憶，及其他等。俱樂部工作亦應非常簡單而淺易，並應集中於各種輕易之民衆樂器（提琴，三弦）的周圍；常可

組織唱歌組，教被動員者學唱革命歌，所以集合點務須設法供給出發梯隊以革命歌集。

組織各種遊戲，主要房間內的遊戲，（棋，象棋，偵探，海軍遊戲，飛機戰鬥，）實行補充紅軍兵士從集合點開赴其派定地點時在梯隊移動內之各種工作形式及娛樂。

第三章 在梯隊中移動時的政治工作

本章所講的移動，不是新兵從集合點上開赴於梯隊中的移動，而是整個部隊與行軍連的移動，這種移動的區別，在於他是與自己的一切組織同時併進的；這一切組織應適應移動的條件以繼續其經常的工作。依據這種已組織完備而俱有工作能力的機關，可充分增加進行政治工作的速度，使其無論如何在移動期間，不至有所間斷的。

在鐵路上，移動的方法，普通是按營分配的。既如此，可見全營與其指揮人員及政治人員常是處在一塊兒的。

梯隊移動時的準備工作，首先應是結束過去的工作，檢查政治機關，並訓示在其移動時的工作。

關於結束工作問題，當然，首先要看部隊過去所服的是何種勤務。假如這個行軍連

從補充部隊內將派到戰綫去，則在該連內最後數日的工作，須與當前的調動工作連繫起來，訓示政治工作人員以該面戰綫的任務，政治的狀態，並曉示該戰綫地域內的政治經濟諸方面。然最主要的，是須急速完結將來所不可進行的工作，首先是不適合於以後情況的各種宣傳工作，例如：掃除文盲工作，馬克斯研究組工作等。

必須檢查政治機關的緣故，是因為部隊當轉入戰鬥動作的軍隊後，在政治工作人員的身上，便完全擺起了另外的任務，與在補充部隊內或後方工作中不相同的任務。要求政治工作人員須有另一種質量，這首先是要會判別戰鬥情況，適應戰鬥情況，勇敢，無畏，堅決。所以向開赴戰綫的部隊內，務需選擇對於一切都有把握的政治人員。至關於訓示，則各有不同的性質。如部隊係初次移動於梯隊內時，則須特別注意訓練政治人員的工作方法，教他們在梯隊中進行工作。此外，在移動時，必須定出相當的工作計劃，固定的口號，鼓動與宣傳的內容及其他等。後者在遠程移動時，是有特別意義。

須知在部隊內傳出其行將調動到戰綫去的消息後往往可引起逃營者的增加。所

以，反對逃營的鬥爭，實是政治工作在開始準備移動於梯隊時的基本任務。

從此一戰線調往他一戰綫的部隊，其工作稍有不同。這時等待上車的時間，首應用來供紅軍兵士的休息及消遣，供整頓一切政治及文化組織之用。梯隊移動的準備，是最簡短的。此種準備並無須耗費許多時間。這種準備的基礎，首先在於認識新戰綫的鬪爭條件及研究新地域的地形，特別是這個地域與前大不相同時。國內戰爭時，由此一戰綫調往他一戰綫，有時在紅軍兵士方面，遇到許多困難，因為他們不願遠離自己的鄉土。在這種場合，有時會發生逃營甚至譁變為土匪，而減低了軍隊的戰鬥力。這種現象，常見之於農民編成部隊內，游擊隊內，及諸民族部隊內。例如一九二〇年正月間，第五八師在基甫與節尼金白軍作戰後，方向該師故鄉方面施行追擊之際，却接到了開往波蘭戰綫的命令，於是在紅軍兵士間，便引起了偌大的不滿意，而該師騎兵連的大部份，向佔良好待遇的，這時竟自由從基甫城內逃出，以開往節尼金戰綫為名而變為匪。

這種現象，將來戰爭時，亦或許有發生的可能而尤其是地方軍及有些民族部隊。自

然新戰線的通俗性，也是頗有關係的。當一九二〇年與波蘭戰爭時，遠東戰線的許多部隊（成立於歐俄的）則願參加波蘭戰綫。

有時却以這種「戰鬪」潮流爲名，而暗中企圖接近自己本省以更容易逃脫，這種情形，政治及指揮人員，亦應注意及之。

團政治機關，在移動時，不能全體一處工作，因爲團是用數個梯隊移動的。所以團政治機關可與本部隊保持連絡到最後的出發日；此後當到達指定地點時，經過幾點鐘，又可重新恢復連絡。這樣看來，團政治機關全部的直接領導，不過只暫停於移動期間。所以在移動時，無須設立任何人工連絡形式的必要。祇須依照諸基本梯隊而將團整個政治機關分配之。例如團政治委員與最後的梯隊同行時，則副政治委員最好使同第一隊梯隊同行，而組織員則同第二梯隊同行，依此類推。政治機關的其他部分（俱樂部，黨務，）通常與參謀處同行，雖然亦可分配這些人員，使隨各營行進。

移動時，通常除梯隊主任外，尚須指派梯隊政治委員。指派諸梯隊政治委員事，應於

編製運送計劃及政治工作計劃時，預先規定出來。

共產黨員，須盡可能的平均分配於各車廂內。須指定其中一人為車廂護送員或車廂政治指導員。

梯隊政治委員，在移動時，負有領導梯隊內之一切政治工作的責任。梯隊政治委員的直接協理者，即是各連的政治指導員及政治護送員，由他們直接或經過黨員團員於紅軍兵士中進行工作。

鐵路移動時之政治工作的基本任務是與搗亂、逃營、醉酒鬪爭，保持紀律，解釋戰爭目的，政治局勢，目下蘇維埃的應付方法，及研究敵人前一任務，在初次開赴戰線的部隊內，更俱有重要的意義。在初赴戰綫的部隊內，常充有一種消沈不振的狀態，紅軍兵士則企圖以酒解愁，故常致大醉。這種心理，常為各種奸商及酒販所利用。在鐵路的一切站口上與酒販鬥爭，剷除酒販於鐵道地域外，實是保障部隊在梯隊內安靜移動，而不致發生醉酒及騷亂的確切任務之一。

醉後常可發生狂蕩行爲及其他騷亂。舊式軍隊當開往戰綫時，其所經過的地方往往發生，如破毀商店，殺害，強姦婦女等等騷亂。誰都知道，舊式軍隊的兵丁，常在火車上以繩索捉捕不謹慎而走到經過梯隊旁的女人。在無紀律的部隊內，特別是不曾受有充分訓練的行軍部隊內，這種騷亂，有時亦可發生。這種事實，首先應由全體政治人員負責。

與頹喪情緒鬥爭的方法，首先就是莊嚴的送別及歡迎。必須於準備出發往戰綫的開始，即在這一工作的周圍，造成注意紅軍需要的空氣及健強的革命情緒。要紅軍兵士一開始就覺到一切勞動者對於自己精神的援助，贊成與對自己的關心。莊嚴的歡送，特別是人民送給紅軍的贈品及其他對紅軍兵士表示注意的形式，音樂隊及歡歌等，這就是紅軍兵士應赴戰綫的開始。在移動的整個過程中，這種勇壯的情緒，及一切勞動人民於紅軍兵士的關心及注意，必須不斷保持之。

移動時的政治工作，依照上述原因（打消紅軍兵士的煩惱意思及懼怕戰綫危險的心腸），亟應加強進行之。

在梯隊中，宣傳工作的範圍，頗為狹小，然不應完全拒絕進行他，假使當前的移動是很遠的。如與梯隊同行有客車廂時，則儘可利用該車廂內寬闊處，集合六至八人，以進行諸小組工作。學校工作固屬困難，然並非絕對不可施行。如部隊內剩有幾個紅軍兵士尚未完結其所學的國語文法時，在遠距離的移動期間儘可完結這種功課。所以當部隊由補充轉而為戰鬥動作時，絕不應將學校的一切用品，完全置放於補充部隊內。每連除其他文化器具外，尚應附帶必要的字母書籍及其他掃除文盲的應用品，祇有習字，在移動時，差不多完全是不可能的，火車的停站，須用以完成其他的任務。

圖書館工作，在移動時，應竭力擴張之，因為紅軍兵士在移動時，許多閒暇時間，是無處使用的。淺易的小說及關於目下有興味之政治問題的小冊子，均可廣為傳播之。在車廂內，無論晝夜都可閱書，不過要有燈光就是，這是梯隊政治委員所應料理的事。

鼓動工作，在移動時，實佔第一位。鼓動之最主要的形式是：（一）讀報，（二）談話，（三）在大站上的羣衆大會及歌舞會。

高聲讀報及在報紙周圍的談話，是在梯隊內工作最適宜的形式。每個黨員，尤其是政治指導員，應充分地會拿報紙做工作。以報紙做出發點，即可轉到其他一切與移動時之政治工作任务有關係的問題。

有時亦可出牆報。以設立各車廂間的牆報競賽為有利。

俱樂部工作，可在各車廂間，以初步的工作形式進行之。唱革命歌，玩耍各種音樂器具（提琴，彈的弦子，吹的管簫等。）他如各種軍棋，象棋，偵探海軍遊戲等都是移動時最適宜的東西。所以當啓程時，須準備充分的數量，以備途中使用。在久停的地方，可舉行梯隊大會，並可實行有組織的唱歌，音樂隊，唱歌組，民衆跳舞等。

按時不斷的供給梯隊報紙（至少每車廂內一份）對於政治工作的順利，是有特別意義的。這種供給，須經鼓動處進行之。

這樣看來，鼓動宣傳工作，在梯隊中，是儘可進行的，所以每個黨員及政治工作人員，均應盡量提高政治文化工作而不應縮小他。

黨的工作在移動時就是黨員在一切紅軍兵士中的鼓動，以實現基本的政治任務，並常常幫助紅軍兵士，特別關於問答工作及幫其寫家信等。

黨內的工作，尤其是全體大會，僅於必要時舉行之。如路程短近時（少於一星期）須使最後一次的集會，舉行於出發之前一日，以使解決一切最後的緊急問題。即在這裏經常的黨日，已破壞於尚未出發前之補充部隊內了。在戰鬥情況中，誰也知道，固定的黨日，是不能存在的。總之，應設法使黨會在不拘任何情況中，每星期平均舉行一次。如繼續不斷的戰鬥使我們於兩三星期內未得舉行黨會時，則支部應於第一順利情況中補足之。移動時應遵守一般規則：黨會每星期一次。所以，如移動較久於一星期，則須定出時間來開黨會。

當發生某種重要事件時，亦須舉行黨會，解釋明白，使政治工作得有正確的依據。例如，像克龍拾搭軍港海軍暴動的事件，和平會議的開始，及足以轉此國際情況之某一國家底革命，均直接要求對黨員加以訓示。關於本部隊生活中之大的事件亦然，例如部隊

內某種大不滿意的現象而可發生危險結果，或由此一戰綫開赴他一戰綫而紅軍兵士不願前去時均應召集黨會解決之。

除此黨會外，黨員彼此常應保持連絡或個人會面，或互相談話。

黨之組織底基本單位，在移動時，屬於營的臨時組織，各連底支部，則仍保持其完整與獨立。黨的工作，由梯隊政治委員領導之。政治組織工作，在移動時，應是檢查梯隊政治機關底一切工作，而首先是檢查政治指導員底工作。梯隊政治委員與政治指導員保持個人的連絡，接受其語言的通報，並於談話時訓示之，有時並可集合不大的集團。此外，梯隊政治委員須與紅軍兵士保持直接的連繫，到各團車廂內，與紅軍兵士進行若干時間的談話，並參加其一般的車廂生活。

關於軍務經濟工作方面，梯隊政治委員須注意衛生的設施（上車時，於車廂內撒佈消毒物，醫藥救助途中病人等），視察梯隊之一切紅軍兵士底飲食，按時供給開水及其他等。

在移動時，並應注意與私買軍裝鬥爭。初次開往戰綫的不良的紅軍兵士，尤其是在冬天，有時心想如自己沒有軍裝時，則容易逃出戰綫而鑽入後方。此外，他常須用錢買酒吃，而最容易的辦法，即是買去自己底軍裝。

即在小站停車時，亦應監視紅軍兵士底落後與逃營。

在火車久停的地方，可以發展羣衆工作。羣衆大會，不斷的表演，電影，活報，都是這種工作通常形式。如於此處更加之以地方組織莊嚴歡迎，歡送，奏樂，慶祝，贈品等，——這即停止時所應作且必須作的政治工作。鼓勵處和鼓勵所，在這種關係上，擔負着主要的工作。梯隊政治委員底任務爲盡量利用這種幫助。有時梯隊政治機關自己須完全自動的組織一切。例如在戰區附近，有時甚至在大的鐵路交會點內，鼓勵處底組織，常未能迅速成立。最後，當移動時，常可發生偶然的故障，致火車久停於無鼓勵處鼓勵所之大站上，這時全憑團政治機關來與附近住民地發生關係，或得其必要的幫助，不然則須以自己底力量組織一切。

當梯隊到達目的地下車後，第一任務即可檢查紅軍兵士底人數，在政治人員方面的任務，則是審計黨員，團員，審計落後者，患病者，甚至逃營者，依照這種檢查的結果，有時須即刻施行重新部署，指定其他人員以填補缺空。如發現逃營者時，須設法通知該逃營之紅軍兵士原籍底與逃營鬥爭委員會，並立刻檢查軍裝，拿辦耗費人民財產的罪人。

在梯隊中移動較久後，通常便會發生一種放蕩瞎談的現象，即政治人員亦然。恢復紀律和秩序，鞏固路中所鬆懈的組織，同樣是到達後馬上應作的重要任務。

第四章 行軍時的政治工作

行軍準備的進行，一面沿着軍事路線，一面沿着政治路線。

在行政經濟的監察方面，部隊政治委員底任務，第一，鞏固行軍運動底命令在這命令中，政治委員應特別注意到一切政治組織及政治機關的移動方法與地位。要提出說明這點的原因，是因為有些指揮員不是忘記他們，便是不知怎樣辦，因為他們底位置不會在過去的野戰條令中規定起來，在去年野外演習中，這種含糊問題，即是關於鼓勵東的位置及政治指導員底位置等問題。其次，部隊政治委員須監察在行軍中供給部隊的各種處置，檢查軍裝，關心道路中的衛生設備，監察設立通信連絡及警戒的處置。他又可給一般軍事偵察以各種政治任務，或組織獨立的政治偵察。

在供給方面，政治機關底協助，常常是須要的。我們知道，例如，在休憩地方按時準備

飯食，對於移動底速度，是有若何的意義。當蘇勿洛夫從吐林納開赴特來畢時，於三晝夜半間，共行了四百里路程。在組織行軍底一切方法中，蘇勿洛夫對於軍隊底給養，曾加以極大的注意。「在哥薩克掩護之下，預先於車上向前往休息地送出食料，及至團到來時，飯已作好了，人們飽餐後，得安然休息到重新行軍時。」當國內戰爭時，供給不完善，而且沒有充分數量的行軍廚，這種預先準備飯食，祇有地方人民直接參加時，才能組織成功。當一九二〇年第五八師由任道米爾退却時，其中一旅（與該師其他部隊隔離了的）向前往宿營地派出一組農民工作人員，命其用政治工作方法，向人民收集必要的糧秣，並準備紅軍戰士的宿營房舍。這些農民工作人員在家中組織蒸麵包，發給每家戶若干麥麵，而令其蒸出相當數量麵包。這種事實，過去國內戰爭時，實屬不少；在將來戰爭時，雖然我們紅軍，照規則說來，將供給有各種的經濟底輜重，然在軍事情況中什麼場合都會遇到的。

採取必要的衛生處置首先是與衛生宣傳有關係的。衛生宣傳由部隊醫務人員進

行之。政治機關在技術上協助醫務人員底宣傳，設立宣傳組並推動其工作。

在黨的工作方面，行軍底準備，在於訓示一切共產黨員關於行軍中的工作。如部隊係初次大行軍時，這種訓示更屬須要。

關於政治組織工作方面，必須於部隊內之黨員中，分出鄉村工作部。如此種鄉村工作部已設立時，則必須通知其關於部隊將經過之地域底特點。其次，政治委員應注意黨員參加偵察，警戒，通信勤務的必要程度，如有必要，預先撥出相當數量的黨員。其次，可召集團內一切政治指導員的會議，及團內政治領導人員的會議，以指定行軍時的工作任務。

關於鼓動宣傳工作方面，準備的工作應包含：（一）軍事宣傳，（二）準備與人民設立正確的相互關係，並於人民中施行宣傳，（三）造成紅軍兵士底勇壯情緒，（四）解釋主要的政治事件，（五）衛生宣傳，（六）與脫逃搗亂，及破壞紀律鬥爭，（七）訓練保重武器及軍裝的習慣。

軍事宣傳應包含（一）盡量解釋行軍軍紀，（二）解釋紅軍戰士與各兵種的協同動作，各兵器的運用的方法及與之鬥爭的方法，（三）解釋野戰條令底重要地方，尤其是關於警戒，偵察及通信連絡，（四）解釋敵人奸細底意義及與之鬥爭的方法，（五）解釋目前機動底目的。

這種工作，一方面負有溫習軍事教育的基本要點的任務，而主要是提高紅軍戰士的精神並造成勇壯的情緒——行軍的根本條件。「每個戰士應明白他底機動」——這個口號現時實佔有重大的意義。所以協同戰術，對此問題加以大的注意。「軍隊底行軍是羣衆意志底加強，——威爾浩斯基同志在他的協同戰術內寫着，——首長可相信行軍的順利，假使他曾在心理上準備了行軍，假使軍隊底情緒承受了他所提出的要求，假使軍隊底情緒貫徹了這種要求的重要，假使戰士肯不遺餘力地完成所給與的行軍任務。」

關於軍事宣傳底基本工作，首先應由指揮人員擔負之。政治人員須幫助指揮人員

的工作，動員各支部的一切力量及一切政治機關，利用政治工作的一切豐富方法以達軍事宣傳底目的。

造成紅軍兵士底勇壯情緒，一部分是由軍事宣傳來達到的，而主要的工作則在於全體政治人員自己應作出勇壯的模範，並以其情緒傳染一切紅軍部隊。通常的方法——莊嚴的歡送，短促的羣衆大會，唱歌組，各連的成團的大會，——照規則說來，在隔離前方戰線若干遠的地帶內，都是可以組織的。在距敵較近的地帶內或是情況要求移動隱蔽時，當然這種形式是要不得的，有時祇可於離開住民地後，舉行連底會議，譬如於第一次小休息時施行之，或是祇限於黨員與紅軍兵士的個人談話。此外，無論任何情況，均可播散傳單，報紙，及其他對於政治工作有很大作用的鼓動印刷品。

準備紅軍部隊在居民中進行政治工作，實有特別重要的意義。每個非黨員的紅軍戰士每次與居民接觸時，均應給居民做模範，注意居民底需要，並進行不斷的工作，給居民解釋一切政治問題並提高其政治覺悟，簡言之，作一個蘇維埃政權底流動鼓動者。紅

軍底一切羣衆，應成爲共產主義宣傳底武器。

所以在行軍運動底前一日，應與紅軍戰士進行各種談話，解釋紅軍戰士應有的行爲與居民應有的相互關係，並使其認識國內政策底要點（土地政策，賦稅協作社，鄉村經濟信用條例，蘇維埃建設電氣化。）此外，並應注意使紅軍戰士認識部隊行軍所應經過或到達之地域的人民生活與風俗。

解釋基本的政治事件，不僅要在居民中進行工作，並要提高紅軍戰士本身底政治覺悟性，造成紅軍戰士底戰鬥情緒。國際事件或戰線上的各個可喜的事實，都是這種工作最好的材料。

關於衛生宣傳方面，主要的注意力，應集中到解釋各種疾病時莫斯科軍區北方政治部所印行的衛生必須。

紅軍戰士運動時的衛生須知：

一 怎樣避免疾病？

- 一、勿飲生水，勿食生菜，——吃了會腹痛，生霍亂，紅痢。
 - 二、勿與不相識的人在一個盤子內吃飯，——可傳染微毒。
 - 三、飯前洗手，——不得痢疾。
 - 四、勿在別人底牀舖上睡覺，——蝨子與臭虫可傳染疹疾。
- 怎樣保護腳腿？
- 五、步兵底腳腿，猶如騎兵底馬匹——注意來保護自己的腳腿。
 - 六、早晚須洗腳，洗淨擦乾後，撒上發給你的藥粉。
 - 七、脚布烘乾，置足於地上，勿纏摺疊，——不至發生磨擦之痛。
- 怎樣避免行軍底疲倦？
- 八、在行軍前不要吃過飽，並不要空着肚皮出發，——行軍不至疲倦。
 - 九、行軍不要在身邊多帶東西——一分重的多餘東西，在行軍中會變成一布袋重。

十、記着，與你同行的有醫生，——你覺得有病時，立刻就去請他醫治。」

斯茂林第四師底衛生須知更詳細些。

紅軍戰士行軍須知：

「紅軍戰士記着，祇有你自己可保護你底健康，而非別人。

所以在行軍時，你要遵守下列條件：

一、把自己弄乾淨些，記着，昆蟲是傳染病底傳達者。

二、不洗手，莫吃飯。

三、未熟的果子，完全不要吃。生菜蔬和生果實，拿開水灌一下。

四、勿飲生水。

五、勿污穢并勿保藏污穢來源的水。

六、保持廁所底清潔，遇有小壕時，以土塞填之。

七、不要從別人人口上奪吸紙煙或呂宋煙。要有自己底盤子，杓子，茶碗，收拾乾淨，——

——可避免傳染病。

八、勿用手摸眼睛，要有手巾。

九、無論何時勿用手摸傷口，搔癢，或其他皮膚損傷，而立刻以潔淨的布片或棉帶纏裹之。

十、呼吸經過鼻子，而勿經過口。

十一、不要隨便與各種女人性交，因為她或生有楊梅瘡。

十二、病了，務必去見醫生。

記住這個，並轉告其他同志！

與脫逃鬥爭，在政治機關方面，首先是用鼓動方法進行的；與紅軍戰士談話，對逃脫者開政治審判，小的表演，發播傳單等，——便是這些方法。

此外，團政治機關須吸引革命軍事裁判所及特務科參加此種工作，經過他們或經過自己司令者來設立監察攔阻隊或拘捕隊。

其次，部隊政治機關應關心編製在行軍時供給宣傳品的計劃，從各連分出給紅軍戰士，並指示其應領取宣傳品之地點與方法。

部隊開始行軍了。在移動當中，政治人員並沒有特別的任務，仍是一般的職務——時常做工人階級一切勞動羣衆底領導者——共產黨員在不拘任何情況中的職務。

在行軍時，黨員應爲紅軍戰士底模範，並協助行軍底順暢。政治機關底基本任務，在於幫助指揮員保持行軍序列，保持行軍軍紀，防毒及防空軍紀，與敵人底奸細鬥爭等。此外，政治機關應與部隊指揮員共同設法以減輕紅軍戰士底疲倦。最後，當經過鄉村時，須與可能發生侮辱地方居民的現象鬥爭。

先來說一下關於與疲倦鬥爭的方法。這裏一般的方法，首先是由部隊指揮員組織正確的移動來達到的。我們在這裏無須重復協同戰術內關於此點的詳細指示。各黨員整個政治機關底任務，是在這種工作上幫助指揮員，實行衛生宣傳及軍事宣傳，並檢查行軍時所發給之各項指示底執行。具體說來，爲消散疲倦，可採用各種各式的方法，每次

要看指揮員底才能如何而決定的。在我們底條件下，革命的歌曲，熱鬧的笑話，甚至常說的趣話，某個通俗的戰鬥口號，以及對某個紅軍戰士之不滿意情緒或口出煩言的短評，——均可用來藉以消散疲倦。當然，這一切方法底運用，務須適應情況，如移動時，要求須絕對肅靜，則關於唱歌及其他等方法，當然是談不到的。然黨員在無論何時，應做模範紅軍戰士，第二，應於無論任何情況中，能指責他人底私語，以身作則來鼓勵他人。

在其他方面，也應如此幫助指揮員。移動底速度，與行軍軍紀及完整的行軍序列，有密切的關係。在這種關係上，特別重要的，是監察紅軍戰士不至落到行軍縱隊底後邊，特別是當經過鄉村時。此外反對敵人奸細的鬥爭，遵守防毒及防空軍紀都要加以非常注意，並應注意行軍底各種細微。祇憑指揮員來管理這種細微，不是時常都能辦到的。在這裏關於遵守各種最重要的豫防辦法，政治機關底幫助，常是有利的。

行軍每經一點鐘，通常應有十分鐘的小休息，以便整頓衣鞋等。這裏，政治工作的可能，是較為寬大些。與各個紅軍戰士集團談話和講容易的故事，是儘可進行的。情況有時

可給進行此種工作因素。在路上運動中所發現的某種現象或小的事件常可用爲此種因素。

如附近有住民地時，則政治工作的任務應是設立紅軍戰士與人民的正確關係，一面與可能發生之騷擾鬥爭，一面與人民進行談話。與人民的這種簡短談話，其任務爲察知人民對紅軍的狀態，察知其政治狀態，檢查紅軍戰士與人民之相互關係是否正確，並順便解釋人民所發問的各種問題。

行軍每經數點鐘後應有幾點鐘的大休憩。大休憩時，常舉行午餐。大休息可給政治工作以更大的可能。政治指導員可利用大休息時，給政治委員編送定期報告，並可在自己日記本上，記載行軍中的某些情形。政治委員可利用這種休息發佈各種號令。如有特別重要的情形須告知政治人員時，可舉行團內政治指導員或一隊政治領導人員的短促會議，傳告以必要的指示。例如當停止休息時，忽接到通報，謂附近地域內發現了匪夥，對我們部隊可引起如此或如彼的影響；則這時不僅應採取關於作戰處置的指示，並應

採取必要的鼓勵方法與口號。如接到關於應經過之地域的人民情緒的特別消息時，亦應有同樣的處置。自然，如無特別須要，召集這種會議，是沒有意義的。

同時，大休息並可用之以供給報紙，如按照發行計劃的條件能夠送到報紙時。

鼓勵工作，在大休息時，可在高聲讀報的周圍及鼓勵車的周圍進行之。鼓勵車在大休息時，可盡力發展其工作，供給報紙，發給各種小冊子，並進行問答工作及給紅軍戰士寫家信。

在這種休息時，並非不可進行有計劃的談話（甚至政治課）。談話的內容，或按預定的計劃進行之（如無其他特別的事件），或取從一般情況內所發生之地方上的問題進行之（如反抗匪徒及仇視我們之農民的鼓勵，及鼓勵反抗敵黨。）

其他的工作形式，特別是羣衆工作形式像羣衆大會及遊戲會等，當然是無須組織的，因為這樣可妨害紅軍戰士的休息。

當配置宿營，尤其是當休息日時，則另是一回事。

配置宿營時，應充分利用之以組織政治工作。關於行政經濟及作戰監督方面的工作，政治委員須採取一般情況所需要的處置，特別注意警戒，通信連絡，偵察，供給，衛生，設備，並關心病者及傷者。在各種特別設施中所應提出的，就是跟着部隊的衛戍值班員，須派出政治值班員。政治值班員的職務如下：（一）幫助衛戍值班員在配置休息的地方內維持一切秩序，（二）接收居民的訴狀並設法調查其真象，（三）進行反抗劫掠的堅決鬥爭，（四）對各種問題，須基於一般政治任務處理之。

關於政治組織工作，宿營配置首應用來整頓自己力量，以便收集關於部隊政治狀態的消息及關於可能的缺點等。政治指導員在行軍時，務必記載自己的日記，基於這種筆記，作出政治彙報，呈報政治委員。團政治委員須編製第二日的工作計劃，通知諸政治指導員及政治機關關於須有正確之政治鼓動的重要事件，如有須要，則分出黨員以執行特別任務，巡視紅軍戰士的配置，檢查政治指導員及支部的政治工作，並與紅軍戰士談話以觀察其對於目前事件是否具有正確的覺悟的態度。

在黨的工作方面，各連的支部書記及團黨部，須寫出自己關於各黨員之本日工作的結論，編製來日的任務，審計減去的黨員，與地方黨部（如有時）設立連絡，幫助團政治委員編製給黨員之政治工作的任務，基於收得的通報以呈報本日內黨部組織的狀態。

在這種配置休息時，如有需要，可舉行黨會。黨會須要與否，應由一般情況決定。照規則說來，全連或全團的黨會，在行軍情況中，我們每星期至少應舉行一次。黨會的議事日程，須與一般政治任務相適合，並須由本部隊的政治狀態產生出來。例如當行軍時，發現了擾亂，不守紀律，對待居民不正確等事實，而且黨員在這種問題上并未採取充分的方法以消除這種現象，自然，必須與其他問題或甚至取消其他問題而提出關於整頓紀律及與搗亂鬪爭等問題。黨的機關的一般任務——注意觀察紅軍戰士的政治情緒，并特別注意敵黨的宣傳與鼓動，他是在部隊的情緒中，紅軍戰士的問題中，談話中常可表現出來的。

在關於鼓動宣傳工作方面，這種宿營配置應當并必須廣大地利用之。必須高聲讀報，組織活報；鼓動車工作，開始於發給書籍，終於問答工作。常可組織軍人大會，用本地的力量組織遊戲會（合唱組，演劇，跳舞，用民衆樂器奏樂等。）一般說來，假若情況並不要求特別底僞裝與肅靜，必須設法利用充分數量底消遣工具，因為這種消遣實是安靜紅軍戰士心理的最好方法，並可消散其恐懼可能的或真正的危險意念，使他們忘掉疲倦及行軍的痛苦。然不可只限於一種消遣而已。儘可以并必須組織其他各種政治工作，直到政治課及各種小組與集團工作爲止。

關於政治課，配置休息的時間，當然是不完全便利進行此種工作的。日間大休息時，并順利進行政治課，然如情況不會許可在日間休息時進行，則亦宜於配置宿營時進行之。

很明顯的，這一切工作底進行，是依情況決定的，絕不應妨害作戰任務，而正爲實現作戰任務。如作戰情況要求停止此種或被種工作形式，則必須停止之；例如，須顧慮僞裝，

遵守移動的肅靜，使紅軍戰士半夜爬起出發——這都要求政治工作須有相當的適應。使作戰工作底利益不至破壞，根本條件，是在政治委員與指揮員間須有最密切的連繫，政治工作與作戰工作須有完滿的協同。

這裏有說一下鼓動車的一般工作的必要。在過去機動時，鼓動車的工作與行動，常引起指揮人員的反對，不知安置鼓動車於何處，謂他妨害自己工作，暴露部隊，常給他一個極討厭的綽號，喚他做「賤棚」等。我們知道，指揮人員對政治工作的態度正確，多可決定政治工作本身的順利。鼓動車，與其他政治工作形式一樣，首先不應妨害而應幫助實現作戰任務。因此鼓動車的本身，通常應有相當的偽裝，首先須使其不遭空中敵眼。所以亟應解決關於鼓動車的形式問題，給鼓動車規定最方便的一致的形式。按照我們的意見，鼓動車應有如下的質量：（一）首先便於偽裝以避空中敵眼，如須要時，並避居民眼睛；（二）便於裝載團俱樂部的一切裝飾，並須有櫃棹，以供紅軍戰士寫信之用；（三）於必要時展開成一小的鼓動臺。這樣，鼓動車即不應有爭論的口吻。按照我們的

意見，一九二三年機動演習時，鼓動車工作底主要錯誤，常是不正確的偏重在居民中的工作，而不重在紅軍戰士中的工作。我們想鼓動車底主要任務，在於為紅軍服務，在紅軍戰士中工作，所以鼓動車並不着重光耀的外形，招引居民對自己注意；恰恰相反，所注重的，是他的靈動與偽裝。

因此，即可解決鼓動車在行軍縱隊中之位置的問題。鼓動車應配置得使他便於在部隊配置日間休息，或晚間宿營時，能夠馬上推動到紅軍戰士駐止的地方，以便在他們中間進行工作。

當然，鼓動車順便亦可在居民中進行工作，但這種工作絕不應損及在紅軍戰士中的工作。

宿營配置時，在居民中的工作，應充分擴張之，自政治人員起，至每個非黨員，紅軍戰士止。如情況許可時，可組織歡迎，歡送會，使人民探看傷，病之紅軍戰士，以期收得其幫助；在居民中進行羣衆的及個人的鼓動；接收居民對紅軍戰士行為不滿底訴狀，並立刻採

取適當的解決方法。與地方居民如能設立正確的相互關係，則地方居民對於警戒、偵察及糧食等方面，實可給我們很大底幫助。

休息日的政治工作比較宿營時的政治工作，其範圍更要大些。行軍中的休息日，每星期通常應有兩次。行軍時的大部分政治工作，可集中於休息日的周圍。關於政治行政工作，在配置休息日與在配置宿營時相同，指派衛戍政治值班員，檢查警戒、偵察、通信連絡，採取供給方法等。

休息日的工作計劃，應於前晚編製出來。休息日的前夕或早間，可召集部隊內之政治領導人員的會議。祇有休息日應舉行黨會，連支部書記訓示會等。關於鼓動宣傳工作，各種形式，都可進行，自讀報起以至政治課，羣衆大會及紅軍軍人會等爲止。當休息日可召集紅軍戰士代表會議，黨和團的代表會，紅軍戰士大會，——總之，凡是一切政治工作之最複雜而且要求相當準備的形式，都可進行。師政治部，在自己方面，應採取一切方法，盡量利用部隊在各種地方的停止。惟有這時是檢閱部隊，尤其是檢閱其鼓動宣傳工作。

最便利的時間。(當然，不可祇限於在停止一處時的檢查，領導的政治人員應於一切情況中，時時檢查政治狀態。)師政治部，在自己方面得給鼓動宣傳工作及組織各種消遣以很大底幫助，如組織遊戲會，排演戲劇，遣送演員，電影等。爲此，在師政治部內，最好設備一專門底鼓動汽車，便於便利時機，得往來於師屬各部隊間進行工作。

休息日須發展各種小組工作，不特是在俱樂部內，黨內亦然(複習班，馬克斯組，黨組，及其他。)須發展在指揮人員間的工作。當然，這種工作不可過於繁多，致妨害指揮人員執行其直接的職務，然每次必須提出這種問題並適宜解決之。

在居民間底工作，休息日須特別廣大地發展起來。當國內戰爭，許多部隊在休息日，常給地方人民組織了各種勞動幫助，如組織禮拜六，組織兒童紀念日，組織各種文化教育機關，軍民聯歡會，遊藝會等。絕不應祇限於鼓動工作，政治機關務須加入地方上組織的黨的及蘇維埃的工作。如居民底情緒不佳時，則必須利用此休息日來清理鄉村，剷除壞份子，消除匪類，解除其武裝等。

第五章 偵察時及警戒時的政治工作

我們首先來說關於派遣所謂政治偵察問題。我們認為在戰鬪情況中，沒有單獨派遣政治偵察的必要，而應利用一般軍隊偵察，以完成一切政治任務。與一般軍隊偵察分離而另派單獨的政治偵察，其不正確之點有三：（一）必須密切聯繫純粹底作戰任務與政治任務，必須使每個指揮員學習估計政治情況，不然則不能成爲部隊之完滿的戰鬪領導者；（二）在戰線的危險條件下，政治偵察，既無充分之戰鬪力量底保衛，又無有經驗之軍事人員的指導，容易陷於被俘擄的危險，或至被敵人或土匪消滅（派遣特別的政治偵察，常致分散政治力量，況政治力量即不分散，尙且常常不夠用。）

當一九二三年會操大演習時，派遣政治偵察，是一般的普遍現象。究其實際，其所負的任務，則完全各不相同；一方面，在政治上考察地形，研究地域；另一方面，對居民進行政

治工作。據屋洛夫在他所寫操大演習時的政治工作的一篇文章內（見一九二三年八月政治工作人員）說了如下的話：「政治偵察的工作應給政治機關於參加部隊將經過之地域以完滿的想像。在戰鬪情況中，政治偵察底工作，應是準備瓦解敵人後方，而鞏固自己後方的工作。」同時他底結論認為政治偵察可以：「（一）研究地形，（二）在居民間進行準備工作，使居民認識會操並準備其歡迎紅軍戰士，（三）判定在居民間政治工作的內容與形式，（四）在實際工作中，使軍事機關與縣省機關，密切連繫起來。

無疑地，後三項任務，恰是已往農民工作部底任務。至關於研究地域一項，則已往的農民工作人員也曾手工業式地進行過。現時政治偵察，對於研究地域的工作，從經濟及政治狀態方面着手，較為精細。所得的結果，適介於統計學的研究與手工業式的研究之間。據屋洛夫同志自己認為研究地形的這種任務「假使我們能夠現在即着手製造充分準確的人種的經濟的地圖，詳細製出其地方人民宗教信仰及社會成分等。可得容

易完成。那時，可依據這種地圖材料，而只限於研究其地域內之政治狀態。」

在戰線情況下，這種複雜的任務，毫無疑意地，無論是團政治機關，師政治機關，甚至軍政治部底肩膀上，都是不能勝任的。實際來說，當一九二〇年俄波戰爭時，西方戰線底軍隊，在兩月內，曾佔據過廣至二十萬平方啓羅米達，內有一千五百萬居民的地方。如再加上後方地帶，則在這兩三月內所應研究的地域，將廣至擁有三十萬居民之四千萬平方啓羅米達的地方，其內包括有百餘城市，萬餘住民地。可見除地形學的地圖外，我們須有政治經濟地圖。同樣其他國家，此種工作，應由一般軍事偵察機關進行之。關於我們蘇聯，則這種任務，應委諸中央統計部，紅軍在這種關係上，應給中央統計部以專門的任務。這個當然不是說，在會操演習和戰爭中，無須研究地域內底政治經濟狀態。不過要一般經常動作的軍隊組織的政治組織間加以正確地區分這種工作，如軍隊祕密偵察，特務科，各種軍隊偵察，農民工作部及部隊之政治機關底其他部分間的區別。我們先來假定政治偵察底工作，就是每個機關研究地域內之政治經濟狀態的工作。至關於在這地域

內，對居民工作，組織其對紅軍戰士的歡迎，整理蘇維埃及黨的工作，所有這些，我們把他直接歸到在居民中的政治工作以內。

所以，我們認為必須利用各種秘密的和公開的軍隊偵察，代替單獨的政治偵察以執行一切政治任務。

軍隊的一般偵察有近距離的有遠距離的二種。派遣近距離的偵察，完全不一定在每一偵察組內必須派出黨員；恰恰相反，必須使一切紅軍戰士和非黨員的指揮人員學會不要特別的監察而能工作適當。必須使他們學會執行政治偵察的要求。派遣共產黨員，祇有：（一）當部隊無紀律時，（二）當在政治上或軍事上遇有特別政治任務時。

國內戰爭時，常有這種事實，就是派遣去作偵察紅軍戰士，不去執行其直接的職務，而跑到農民家裏去搜索食物，有時甚至掠奪，這當然是忽略了敵人，有時甚至走到離開部隊四五里處，即行配置休息，而經過指定的時間，則轉來報告，說無論何處均未發現敵人。很明顯地，在這種場合，要求須特別注意監察，這時撥出一兩個黨員在內，實可保障其

認真執行職務。

在第二種場合內執行一定的政治任務，可使有政治知識的人擔任，當然，最好是用黨員指揮員，但這不是時常都能辦到，所以不得不分派專門代表或集團黨員。一九一九年夏秋之際，第五八師從南俄調回與整個紅軍會合的事實，即是一個例子。該師在數星期內，四面均被敵人包圍。別特六洛夫底部隊包圍於其左方，節尼金於其右方，直至應付不暇。但是該師最可怕的敵人，則是馬可腦底部隊。馬可腦步步尾隨在第五八師底後面，並在政治上使該師紅軍兵士受到莫大的影響，有時甚至誘惑該師整個的部隊譁變到自己方面去。在這種情況下，對該師軍隊最主要的是脫離馬可腦底軍部；最危險是怕與馬可腦底人發生些微的關係。自然，在這種情況，必須每個偵察組內供給以共產黨員，以便於每次偶然與馬可腦底部下接觸時，得反抗其破壞的影響。

有時可發生特別複雜的政治情況，要求須當地解決獨立的政治任務。第一當與各種游擊隊相遇時，因為他們底政治招牌，是各不相同的。第二當有可能與敵人發生關係

或談話，並於其中進行政治工作時；第三，要取得人民底相當幫助，但必須對人民進行正確的政治關係時。

一九一九年十一月第五八師第三旅（駐紮於發士道埠，且祇有三百步槍與三百大刀）形成了如下的一種情況。經過第三旅強硬的奇襲後，佔領了發士道埠。節尼金向第三旅進攻，並截斷該旅與後方的連繫。這時，從側翼之鄰近的郭仁哈站接得消息，謂土匪葉四米弄夫即將前來。此支匪隊，是經第十二軍革命軍事委員會宣佈為非法組織，並嚴重禁止我軍與之發生任何關係的。當每次與土匪遭遇時，都應該以敵人對待他，而這支匪隊對於第五八師部的危險處，在於他本身就是由第五八師內一團轉變到馬可腦部隊裏去的。現時因為受不過別特六洛夫底壓迫，而退却下來。依照軍事委員底命令，第五八師底旅長即應同時並來抵抗葉四米弄夫。而葉匪則有五百步槍，五百大刀，砲兵，及兩輛鐵甲汽車，如其與節尼金部隊聯合，便可包圍第三旅於核心。自然，旅長拾四根同志底環境，是非常困難的，因為如開始抵抗葉匪，則全旅必被殲滅。進行談判，是被禁止的。這

時師政治部主任——在政治上負完全責任的同志，——偶然到拾四根同志旅內來，給了旅長以極大的幫助。情況是當時要求須以談判的方法，來緩延葉匪的進攻。結果，便這樣決定了。提出條件，使葉匪於我旅的一傍佔領戰鬥地段以抵抗節尼金，此外並未提出其他的特別條件（如解除武裝交出其部隊內之別特洛夫的軍官等等），葉匪親自與旅長及師政治部主任談判後即應允實行。這種手段，取得了相當的裕餘時間，使全旅得完整地保存下來。

在烏克蘭與節尼金將軍作戰時，這樣的情況，在在都可遇到。例如一九一九年八月間，烏克蘭軍一旅由切哈士退往哈你埠時，在哈你埠的對岸（中間隔着一條特年卜羅河）為高老哥所佔領，遇到渡往彼岸之我軍偵察，即對之施行政治工作，謂紅軍一點也不想保衛烏克蘭；牠們所宣稱他們的任務，是留在烏克蘭故鄉內，保衛烏克蘭不受軍閥與地主的壓迫，并謂歡迎一切烏克蘭人加入自己隊內，指責我們既不願保衛烏克蘭而同時自己還要攜帶游擊部隊所需要的武器，所以提出須解除我們的武裝。恰在此事之

前數日，在米老區域內，有一團受了這種煽動後，殺害了許多共產黨員及指揮員團，遂四散瓦解，有投入匪隊者，有竄至鄉村者。當然，這種煽動，並可很壞的影響到革命的，可是還不很覺悟的烏克區農民份子。參加在渡至特年河彼岸之偵察組織內的兩三個黨員，不僅是抵抗了匪隊在偵察中的宣傳，而且在與匪首約定舉行之羣衆大會上的辯論中，甚至影響了匪隊。順利的回轉後，偵察員給了所遭遇的匪隊以完全正確的政治結論。

戰鬥動作之際，偵察常不僅有與敵人遭遇的可能，並可與之說話，對之進行相當的工作。當我們與波蘭人作戰時，波蘭人佔領基甫後，即在堡落之西向堡立構築鞏固地帶，在諸村緣（紅軍陣地）與林緣（波軍陣地）之間有一株闊葉樹，恰立在十字路口上，宛似雙方的偵察界限；無論我們或波蘭偵察，從未越過該樹，有一次我們偵察走到這樹旁時，看見樹上貼着一張紙條，上面寫着「紅軍兵士，各回家去，因為波蘭人並不是敵人，而是俄國人民的朋友。」偵察長看畢，即在反面寫了相當的答覆。於是發生了有趣的通信。當然，在這種場合有時甚可彼此約定和平會面，在這一切場合中，當然必須有政治訓

練的人參加，如無相當的指揮員時，亦可命精幹的黨員兵士前去。這種場合并須利用之向敵人散佈宣傳品。

至關於取得人民幫助，這很明顯地是要採取一切方法，在實際上獲得這種幫助。這裏一切紅軍兵士的行爲，實有很大的作用。在偵察方面，這種幫助，有時非常重要。我們知道，一九一九年十二月第四師佔領基甫城，實由於其中一團因賴本地漁夫的指示，得順利地踏着適才所凝結的冰渡過特年卜羅河的緣故。此種事實，國內戰爭時，多至不勝枚舉。這種幫助多賴偵察的行爲及其在居民中的政治工作來達到的。

偵察的政治任務是什麼呢？除普通的軍事任務外，偵察的政治任務應如下：（一）調查敵軍的情緒，政治的狀態，紀律如何，社會成份及民族成份若何，編成於何處，有何革命黨在敵軍中進行何種政治工作，敵軍司令者對此種鼓動採取何種抵抗手段，以及敵軍兵士與官長對此手段的過度如何？（二）我們的宣傳與鼓動達到敵軍部隊到若何程度，對敵軍起何種影響？（三）本地域內居民的情緒，其政治和經濟狀態，社會和民族

成份，對敵人和蘇維埃政權的態度在居民中工作的各種政黨及其對居民的影響；（四）敵軍在其所佔領之地方內對各種級層居民的政策。

上述各種情報的收得，可用下列方法：（一）經過敵人的報紙、郵政、電報通信；（二）經過與居民談話（與各種民族及社會集團）；（三）經過與地方共產黨組織的聯繫；（四）經過俘虜的口供，其所寫的筆記、信件等。

且說一下與居民談話。當然，同情於我們的居民集團，可給我們道出關於敵人的詳細情況，以達其協助我們的目的。這種居民集團，首先是鄉村無產者及貧農。但不止是他們。民族問題常可起極大的作用；例如在羅馬尼亞及波蘭國內，因為少數民族壓迫的關係，被壓迫的民族對紅軍自然會有很大的贊助（如烏克蘭人、猶太人、德人等）。當紅軍進攻瓦薩時，許多城市內，甚至猶太的紳商都熱烈慶祝紅軍，盡量幫助紅軍，而有些地方，甚至俄國的民族主義者地主，認紅軍為自己俄國民族的軍隊，準備為之效力。固然不可過信此種情緒，但必須利用之。

再來說一下關於經過偵察發播音傳品的問題。發播書冊最常用而且最方便的方法是，利用飛機。國內戰爭時，每個偵察飛機，均須隨帶相當數量的宣傳品，以便於敵人中散播之。此種方法，有其優點，亦有缺點；最好是當與大部隊敵人作戰時使用之，因為從飛機上散播音傳品，其能達到應接收人之手中的，實屬很少。此外，每個步騎偵察組，亦可供給以鼓動宣傳品使散佈之於敵人應經過之地域內，或其偵察應到的地方內，釘到圍牆上，樹上，特別是十字路口上。有時為發播音傳單，亦可利用地方人民。

當組織秘密偵察時，亦須給以專門的政治任務。在這種關係上，地方黨部的幫助，實俱有特別的價值。所以組織各種秘密偵察時，務須參加政治委員。

情況有時要求政治委員須親自參加，如要求部隊指揮員參加偵察一樣。政治委員應記着這點，並作出相當的結論。

當指定黨員參加偵察以執行政治任務時，政治委員應注意下列條件：（一）能進行偵察工作者；（二）能認識政治情況及各種政黨，（或可與之發生關係的政黨）

(三) 須知道本地語言及居民的風俗，(四) 儘可能知道地形。

政治機關在警戒方面的任務很簡單，其主要的仍是：(一) 幫助實現軍事任務，(二) 完成獨立的政治任務。在第一種關係上，政治委員應幫助指揮員檢查警戒勤務的正確，如有需要，則派出黨員加強之，並與居民設立連繫，以取得其對警戒的幫助。在第二種關係上，政治委員應給關於收容軍及投降者加以必要訓示，關於在政治上識別各種敵人集團（例如各種匪隊），以及因此所發生之對待敵人的種種態度。在這一場合中，或須嚴厲的鬥爭，而在另一場合中，則須先行談判，以達解除敵人武裝的目的。有時警戒須與敵人開始鬪爭，不用步槍機關槍的火力，而用宣傳與鼓動之力。例如，當第十二軍由哈你埠退却時，在其後面堡立地方，有許多別特六洛夫的股匪組織了農民暴動，遇到單獨退却的紅軍小部隊，即解除其武裝。第五八師底先鋒旅行至堡立，其地人民見之即開火相迎。該旅副政治委員當即出馬向前，招匪停火講和。土匪讓他進至村內，他即向農民想出組織羣衆大會來進行談判。雖然組織者別特六洛夫匪輩反對此舉，但農民則終於

同意開大會，這樣，給這位同志以長篇演說的可能。他將別匪在農民間煽動反對紅軍的影響，消散了大半。他底演說的影響之巨，直使農民放他平安回部隊，並使別匪大部都各自回家了。別匪五六百之衆所剩者不過一二百人，當即被迅速掃除了。

必須記着，在國內戰爭及革命戰爭底條件中，常有許多突然襲擊底可能，不但我們對於敵人，敵人對於我們亦然。看了馬可腦部下高道夫襲擊葉哈城之節尼金部就可知一斑了。高道夫支隊進城時，裝起鄉下賣菜的農夫，載了滿車的菜蔬及其他鄉村產物，而在菜蔬下邊，却放着整個機關槍。當支隊人數在菜市上聚齊後，機關槍便開放了，遂佔據該城並扼守至數星期之久。這種突然襲擊底可能，要求警戒須有相當的彈性與精細，在這中間，政治機關及地方人民底幫助，常佔主要地位，且擊我從前在戰鬥的政治工作一篇文章內（見政治工作者雜誌一九二三年第三至九號）所寫的例子來看。

當第五八師諸部隊因受波蘭大軍壓迫，退却至特年卜羅河左岸而配置於堡立地方時，波蘭人和別匪勾結，企圖從臥龍村（該處我們不曾派出警戒）馳擊堡立。但當該

部隊進往臥龍村時，農民自己組織游擊隊與之抵抗，並一面迅速報知堡立，我軍參謀處。波軍見有突然的抵抗，頗為詫異；僅在頑強的鬪爭後，方得衝進臥龍村，然在這時第五八師已接得警訊，敵軍立刻被逐出臥龍村外，這樣便解救了堡立與我軍參謀處。

第六章 戰鬪時的政治工作

戰鬪是戰爭之主要的與決勝負的關鍵（野戰條令第四四六條。）軍事教育底一切工作：動員，機動，行軍，觀察等，都為的是一種根本目的——戰鬪。這對政治工作也有關係，所以政治工作的主要任務是「提高紅軍底戰鬪力。」在戰鬪中一切軍隊底強弱，都應傾向一個總目標，這個總目標，人人（包含每個兵士）都應知道，至對與已有關的局部任務，亦然——野戰條令又說，——「並以全力來幫助實現這個總目標。」

這種任務，政治工作人員亦應擔負，因為政治工作人員手內握有啓發紅軍戰士精神的鑰匙，握有「幫助」勝利的廣大可能。所以可見有時遇到一種意見，謂「政治工作祇進行於戰鬪前，接着便讓其位於步槍，火砲」的說法，是不正確而且妄誕的。誰要是這樣想，那他就弄不明白政治工作與戰鬪為何物，在戰鬪中，不僅可表現出過去工作的結果，

不僅可檢查共產主義的堅毅性而且給共產主義者開展了宏大的工作場，所以表現並發展了共產主義的質量。

「在戰鬪中，誰底目的明顯，誰詳細知曉敵我底狀況，誰底動作堅決，勇敢，奇妙，誰為達其目的而表示得頑強，誰即可得到勝利。」（第四四七條。）

如我們主要對指揮員要求其動作奇妙，則我們首先要求共產黨員動作堅決，勇敢，頑強。如不是共產黨，則是誰經常在為工人利益鬪爭底各種場所內，訓練其黨員底上述質量？共產黨是工人階級底先鋒隊。在戰鬪中，他仍不失其為先鋒隊；對黨員要求其犧牲，英勇，堅決，無畏，頑強。這就是共產黨員在戰鬪中的主要作用，但並不祇限於這些而已。

共產黨不僅是工人階級最革命的而且是最覺悟的一部份。這種覺悟，在戰鬪中，尤其需要。在戰鬪煙塵中，常有野蠻紅軍兵士不僅不饒恕自己直接的敵人，而且不饒恕無辜居民。解決戰鬪，但解決的價值如何，却不可含糊。大家知道，例如：待遇俘虜問題，在抵抗敵人上（特別在革命戰爭及國內戰爭時），俱有何等意義，居民底態度，對於戰鬪順利，

更有何等意義。由此可知共產黨員底基本質量——其高的覺悟與革命性——在戰關中，如何能有這樣大的作用。

我們底野戰命令，只規定了在軍事上準備戰關的方法。這可見是受了舊式條令底影響，亦是國內戰爭經驗不充足之故。我們並應在政治上準備戰關。

在準備戰關方面，團政治委員底任務與團長初無二致。團政委一面與團長共同編製戰關命令，一面監察團長底動作，觀察其所下的命令是否「根據作戰的，而非根據其他任何的（反革命的）意圖。」（一九一九年關於政治委員的條例。）

團政治委員底主要任務為觀察「軍隊不至與蘇維埃底一切建設隔離，個別的軍隊機關不至為反動底支柱或為反對工農的工具」的時代，政治委員這種監察作戰工作，實是其在戰關中的主要任務，這種工作要求政治委員須有偉大的機警，注意，銳敏，堅決，無畏。

現時，指揮人員總算選擇好了。監察作戰工作，常至失其作用，即或不然，也不是政治

委員底主要任務了。在國內戰爭的後幾年內，政治委員在作戰方面，多半已成爲指揮員的一種協理者，而集其注意於作戰勤務底一切主要條件方面——偵察，警戒，通信連絡方面等。

在這裏往往須分派可靠的人前去，尤其往主要的方向上。那末就得分派黨員，當然，要擇出有訓練而且俱有必要之戰鬥質量的黨員。在這裏政治委員對於執行命令如能親自檢查，實屬特別有利。

必須記着，在這種工作上濫用黨員，就是說，把工作主要堆積在黨員身上，是不可以的。不然，則黨員將不夠用，且非黨的紅軍兵士將至不習慣負責的工作。

次一工作，即是供給彈藥，在這種工作上，政治委員底幫助及其眼睛，是特別需要的。最後，衛生救助及在長期戰鬥中的食糧供給，通常多有賴於政委及其協理員之督促施行。在這種關係上，戰鬥命令，實是一種指導的線索。

在戰爭中，偵察的作用，非常重要。在這種工作上，政委一面幫助指揮員，一面使偵察

并須給以政治性質的情報，這種情報，當然也是指揮員所需要的；但非黨的指揮員，有時就把他忘掉了。政委底任務——就在提出這些政治問題（例如，敵軍的政治情況，其對蘇維埃政權的態度，對自己官長的態度，紀律狀態，對居民的態度等。）

在有共產黨組織的地方，政委的任務，在於吸引黨的組織來執行上述的任務，特別是偵察與通信連絡。這裏，當然祇有有經驗的黨員同志才能與黨的組織保持連絡，因為戰綫底經常變動，使這些組織往往處於非常困難與危險的狀況內。

最後，政治委員尚負有在敵軍中預先傳播宣傳品的任務。其目的在於決勝負的戰鬥前減弱敵軍戰鬥力，加強其中階級分化的集團。當敵人危急時，散播宣傳品，特為有利，因為這時敵人動搖不定，想來頑強抵抗，又怕得到慘敗，想投降戰勝者，又恐被害。例如，當與波蘭戰爭時，第十二軍會包圍基甫城及其附近一帶的波軍，一日接到通報，謂敵軍中發生恐慌，但波蘭兵士怕投降遭受槍斃殺戮（關於這點在波蘭底各種出版物上，寫得非常多。）那時，第十二軍政治部立刻於一夜間印就了三十萬傳單，黎明即用飛機，載至

基甫城上撤將下去。這種事實，多見之於小部隊內，但不長久，所以最好在團部內常保存此基本傳單，例如關於不槍斃俘虜的命令，關於紅軍任務的宣言，尤其有利的，是帶有指示當前之敵軍部隊困難情況的簡短標語；後者，對於較高的軍隊單位（例如有行軍印刷機的師，）才能辦到。

對於戰鬥勝利有特別意義的，就是部隊在精神上的準備。在這種關係上，政治機關負有基本的任務。這並且是整個支部與各個黨員底主要工作。每個紅軍兵士應瞭亮地認識自己偉大的天職，工人階級一切勞動人民對自己的託付及自己對他們的責任，並認識自己部隊目前的局部任務及自己本身目前的任務。

當然，在戰鬥前組織羣衆大會，是一種罪過。主要的工作，則用談話，個別指示，及以提高情緒之銳敏的笑話等方式進行之。最重要的是政治委員自己親身參加在重要的突擊部隊內。紅軍兵士看見他底政委在他自己身旁，他即可放心。他那時就會堅強而確信地走入戰鬥。在戰鬥前，部隊指揮員常給自己所屬各指揮員以戰鬥任務。如有充分時間

來實行準備時，政委最好是集合諸政治指導員，使切記其基本任務，並給其以必要指示，特別是關於政治方面。在這裏敵人動作中的某一事實，有時可起決戰的作用，例如敵人失信的事實，槍斃我們底俘虜，侮辱和平居民等。

在戰鬪前，政委須檢查並分配黨員。第一，視察黨員不至借各種口實多留於後方及輜重內，而僅留出必須的數量；第二，有時必須依照各連重新分配黨員，往突擊，決戰連內（例如強襲或迂迴部隊）分出多量的黨員。聯共中央給紅軍及紅色艦隊的訓示內關於黨員在戰鬪中的任務這樣寫着：「支部在戰鬪中須以自己底勇敢與毅力做模範，當號召自告奮勇者前去担任危險事件時，支部須分出自己底黨員。」有時須有黨員的預備隊。這通常是當防禦戰鬪之際（因為這時預備隊一般很多）或當部隊不可靠，無戰鬪力之際。在後一場合中，應分出黨員十人組織俱有很大的黨員百份數的攔阻支隊。

在關於保守軍事秘密及與敵人奸細鬪爭方面，黨支部與一切黨員應加以很大的幫助。

通常在政治機關身上放着在政治上保障後方的工作。爲達到這種目的，不僅是用特務料負責代表底觀察，而首先並主要須用在居民中的一切工作，紅軍戰士底一切行爲及其對待居民底態度。

居民能夠並且應當在偵察及通信連絡方面幫助紅軍。不但如此，居民並能組織游擊隊，在後方活動，保衛距離主力配置遙遠而仍須要警戒的各個地點。國內戰爭知道許多居民之最具有價值的幫助的事實。在這種關係上利用每個可能，實是政治委員及整個政治機關的任務。

舉出一個事實來看。當波蘭人佔領了勒日且埠小鎮後，位於特年河左岸與勒日且埠相隔之牙旗村底居民自動地向附近所移動的旅部送給報告：「移動中之紅軍旅長，報告，在五月某日夜間勒日且埠開到軍隊：波蘭人法國人及一部份英國人（波蘭人穿的是英法的服裝——著者）聽說準備渡到我們河岸來。牙旗村居民。」

這就是準備戰鬥的主要任務。政治委員須來領導設立這種任務。黨支部須幫助政

治委員，尤其是在分配黨員的問題上，分撥各個黨員或集團黨員，實行各個任務的問題上，及在紅軍中之政治工作的問題上，在居民工作及在敵人中散播宣傳品的問題上。政治文化機關，在自己方面，以其經常的工作協助一般的工作。這一面爲的是促進紅軍兵士底勇氣，一面爲的是偽裝戰鬥設施，使不遭敵人與居民眼睛。俱樂部、圖書館、學校，須將自己保持得好像戰鬥與已無關似的。對他們的主要要求就是沉着而瞭亮的不斷工作。根本工作，即是發送鼓動宣傳品。務要記着：報紙對於紅軍的作用，幾乎不小於砲彈。

特別重要的，就是在一切機關中間，須預先設立無條件之鞏固而不斷的連繫。

部隊政治委員，可將自己底號令作成一定的政治命令形式，其中須指出每個政治機關集團的基本任務，必須的口號，各政治機關間底通信形式，必須注意的特別任務，及其他等。不要忘記，如在作戰命令內一樣，須指出一個或幾個自己的後補人。在戰時指定後補人的這種規則，應在一切政治機關中自上至下嚴格地見諸實際，以免發生任何的

口實，說沒有繼承者及其他等等借口。

一 戰鬪

在戰鬪時團政治委員應在什麼地方。野戰條令上說，在戰鬪時首長的位置如下：

「在戰鬪中每個首長應在便於指揮其所屬之軍隊的地點。」這是由地形條件及戰鬪條件來決定的。

照規則說，政治委員須與團長在一處，以便當下一切命令時，不至有所遺漏，在游擊隊和非充分的常備軍隊內，常存有着一種見解，認為時常並不拘在任何情況內，團長及團政治委員應當走在團底頭前。這實是團之戰鬪力不充分及指揮不適當的特徵。例如在波蘭戰線上的恰八也夫第二五師就是這樣。那個指揮員如不策馬向散兵線前去，便認為不是好指揮員，就不聽從他的命令。如我們更注意到一切指揮員所穿的豔紅色服，（土再其規其所出產的）則我們就會明白；為何在一月半內第二五師底一切指揮人

員及政治委員替換了三次；及至該師進至堡哈時，其戰鬥力已喪失了四分之三。當然，往往團長應親自指揮團的散兵線，這就是當危急時機與決戰的時機。在危急的地方與決戰的地方。

至關於政治委員，則他應比指揮員在前線的時機更要多些；留下協助員代理自己。首長直接親身出席，極可激勵紅軍兵士。政治委員，來擔負作戰本身的指導。這使他有在散兵線上的可能。

總之，政治委員應在其最需要親臨的地方。在戰鬥中政委與副政委底職責的分配，全以其個人所有的質量決定的。常有許多政委長於軍事學識，果敢，勇猛，而副政委則長於純粹的政治工作或行政經濟工作。或具相反。在這一場合中，團政委須託副政委監察供給彈藥，通信連絡；有時把他派往輜重隊。在另一場合中則以派遣副政委同某一最重要的部隊加入戰鬥為有利。然則無論何時，政委應記着，凡當最危急的時機及在最危急的地方，政委都應親自到場。

如副政委不在戰鬪中時，則通常最好使他訊問到來的俘虜，在戰鬪時與居民保持連繫；即由他給與諸政治工作人員以必要指示。

最後，政委的書記（祕書）應直接處於團參謀處內（如設有野戰參謀處時，則處於野戰參謀處內）。如政治委員須臨時急速他去，書記得暫時代理之。一般說來，常時的或長久的代理，是不行的，雖然往往是這樣地做過。書記（祕書）的職務與上級政治機關保持不斷的連繫，隨時報告我軍，敵軍與四圍居民的生活及其狀態一切重要事實。一切其餘的黨員和政治工作人員，在戰鬪中，均應各按其勤務的性質而站在自己的位置上或自己本連內。在戰鬪中，不應從事書寫辦公文牘，編製將來的工作計劃等。當戰鬪之際，書記（祕書）組織員（如非書記「祕書」兼職而單獨設有組織員時）及一切政治指揮導員，均應處於戰鬪中，假如他們不會受有專門的託付——要求須有特別信任的或是重要而危險的託付。

在戰鬪中首先就是鬪爭，監察一切命令使其執行得迅速而準確，使衝鋒進行的協

同一一致，使抵抗頑強不撓。黨員在戰鬪中應為模範戰士，以身作則地表現出怎樣應與敵人搏鬪幫助指揮人員來建立射擊紀律，防毒紀律等。

黨員在戰鬪中應互相認識，互相激勵，監察自己及黨內同志，互相保持特別親密的團結，準備於每分鐘內彼此互相援助。黨員在戰鬪中須與紅軍兵士底畏怯不決及逃亡鬥爭。在戰鬪中與逃亡鬥爭不但其指揮人員底最重要的任務之一，亦是一切政治人員及一切黨員底最重要的任務之一。穆克列夫其同志在他「戰鬪情況中的政治工作」的一篇文章內指示的很正確，他寫道：「戰鬪，尤其是帶有綿延性質而且使部隊異常疲憊的戰鬪，常可招致多量的逃亡者。與這種惡劣根性鬪爭，所以應俱有深切考慮的性質。對逃亡者的第一個直接抵抗，是排底援隊，然後則是連底預備隊，營底預備隊及其他等。當戰鬥之際，凡是躲在自己部隊後方而無一定任務的，即可以逃亡者論而槍斃之。紅軍兵士，如在戰鬪中失掉了他底同志，應從速加入附近的戰鬪班，但絕勿退向後方。」

以下他又注意到逃亡的各種祕密形式。

常有施用所謂『自行槍傷的方法，殘害自己以躲避戰鬥。有時自行槍傷會形

多的現象，所以預先警告紅軍兵士，使其知道自行槍傷將受最惡之逃亡的懲辦。此種現象，務須根本剷除之，不惜就地槍決「自傷者」或助人自殘的「槍手」或綑帶所底醫生。』同時必須與合法的逃亡——企圖當戰鬥之際補入後方或輜重隊內——進行同樣的鬪爭。這裏須有最嚴密的監督。當戰鬥時，後方只應有極須要的人數。對於這個全體指揮，政治人員須嚴密監視之。應有負責的人來施行檢查，這人以部隊政治委員底協理員為適當，他應有權力採用一切必要的辦法來滅除後方底多餘人數。』

過去國內戰爭時，我們不得已而採取了在戰場上反對逃亡之無情的嚴厲辦法。例如一九一八年十一月革命軍事委員會第六五號命令會定出的下列處置。

- 『（一）凡是唆誘退却，逃亡，及不執行戰鬥命令的壞蛋，槍決。
- （二）凡是擅口拋棄戰鬥崗哨的紅軍兵士，槍決。
- （三）凡是拋棄槍械或售賣一部分服裝的兵士，槍決。

(四) 在一切戰地附近設有捉擊逃亡者的攔阻(截緝)支隊。凡是企圖抵抗這種支隊的兵士，應就地正法。」

在這一工作中，最重要的是：相當的政治準備，造成紅軍兵士之正確的社會公論——對各種逃亡嚴格抨擊的公論。逃亡者如失却其他紅軍兵士(即使後方的兵士也罷)對自己在精神上的一切贊助，如爲自己底兵士同志們所恥笑，則他自己往往就會轉回戰場。

其次，逃亡的祕密形式，有時是幫助受傷的。有些紅軍兵士以此爲借口而逍遙於後方。穆克列未其同志說得很對：「照規則說來，戰士不得離開戰鬥而去幫助受傷的同志。只有在特殊場合中，被自己首長提名指定的紅軍兵士才能幫助受傷者，事後須立刻轉回原處。」在野戰條令中，關於這個也有相當的指示。

其次，與指揮人員及紅軍兵士底叛變及叛逆鬪爭，亦是部隊內之全體政治人員底一個最要緊的任務。將來戰爭時，在紅軍底隊列中，常可遇到我們敵人底直接代理者及

不覺悟的或不堅決的份子。政治人員底機警，實是反抗叛變與逃往敵方的第一個最確切的保證。政治委員對其所在之指揮員底脫逃，負有性命之責。所以即是政治委員自己處於無出路的環境，他應犧牲自己，但必預射殺叛變者。懲辦出賣勞動羣衆之叛徒的方法，應是最嚴厲的。在軍事委員會主席底命令內指示了不止一次，說「在戰爭情況中，指揮員，政治委員，及一切前線的同志，應銳利地監察，必使叛徒不得趁機遂行其工作；凡是企圖招致恐慌，煽動拋棄武器，投降白軍的人，須就地殲滅之。該命令內又說：「叛徒的家眷應立刻拘捕之。叛徒的姓名應記載於軍中的黑簿上，以便在最近的及最後的革命勝利後，不至有一個叛逆得脫漏法網。」

這樣，報敵者底姓名，即是莫大的羞恥。當他們歸轉回來時，由法庭按叛變者的罪狀審判之。收沒其財產。家眷應被拘爲質。所以政治委員常應知道指揮員之家屬底住所。如不可靠的指揮員底家屬住在被敵軍所佔領的地域內，則在這裏特應有非常之機警的監察。

當在戰鬥中被包圍之際，黨員底任務在於奮鬥到底。黨員不應投降——這個口號，應不偏不倚地實施到生活中。並須本着這種精神來訓育全體紅軍兵士。然在各種時機中，如紅軍兵士偶被俘虜時，他應拿定自己來給紅軍做個堅決兵士底榜樣。這裏所說的首先是關於軍事秘密：他不應給敵人說出有損於紅軍的消息，不應說出自己部隊底名稱，編制，預定的作戰動作，及其他等等。這些一切都應深深地印入紅軍兵士底心中去。

因為各個部隊，或各個戰士常可遭遇非常嚴重的情況，所以在這裏應說一下關於黨員在戰鬥中失遺黨證的問題。支部常遇到這種問題。對於這種事實必須加以注意。在戰鬥底艱難時刻中，黨員往往損毀自己的黨證，怕被敵人捉去槍決他。這種事實常可暴露黨員底畏怯與投機。支部不應機械地信納此種聲明，而應注意究查失遺黨證的一切情況，如查出有足以證明黨員之畏懼與投機等事實，則須將他送往黨的審判，有時甚至軍事裁判所去。

當嚴重的恐慌之際，黨員底作用特別大。黨員底天職——用一切力量來遏止恐慌，

或用笑話或及時叱呼，或用雄壯語言，或用槍決的恐嚇手段，或自行槍決，這一切都是由情況決定的。「關於恐慌」詳見下章「退却時的政治工作」。

當敵人被迫服而降為俘虜時，黨員底天職：視察紅軍兵士勿為戰鬪煙幕消失其覺悟性，使不至發生殺害或槍決俘虜，更不至發生搶劫掠奪等事情。

當佔據大地點時，尤須注意後一點，醉酒時的搶劫更易擴大，常致陷害整個部隊。一九二〇年正月八日佔領洛氏託埠就是這樣，那時因為從事於各身供給，致使我們部隊一舉而為節尼金部襲出洛氏託埠城外（雖然係暫時的）對於和平居民，亦應加以同樣的注意。

從敵人開始被俘虜時，黨員即應着手對之進行政治工作，第一，對之取相當之平等和寬，並堅決的待遇，第二，遇有第一可能，即與之進行談話，第三，供給俘虜以各種宣傳品及出版物，此外俘虜並由隊列科會同政治部詢問之。

對於受傷而被俘虜的，亦然。

當戰鬥之際，政治文化工作人員：俱樂部主任，教員，圖書館主任，發行員等應作何事？最好是他們也來參加在戰鬥中。這可使他們底威信增高。尤其是對於教員，因為他同樣是紅軍兵士底教育者。

與紅軍兵士在一處，教員得乘着戰鬥後的沉寂時間來發展他底教育工作。發行員，雖當戰鬥時，亦應繼續其發送宣傳品的工作，並當第一沉寂時，將宣傳品送往陣地去，至於在敵人中散播的宣傳品則應於全局戰鬥中，時時發送之。

如諸文化教育主任不在戰鬥中，則他們應不願戰鬥而仍然完全照常繼續其日常的工作，彷彿他們是處於極安靜的平時情況內。最好這時利用他們在和平的居民間進行工作，並須將他們看做特別時機的預備隊。

二 戰鬥後

在戰鬥完結後，政治機關底第一任務是扶植在戰鬥過程中所必然破壞的紀律。這

裏必須清出紅軍兵士中之逃亡者，搶劫者，及其他等等壞份子，直接革命軍事裁判機關就部隊內審判之。

戰鬪底勝利，應迅速利用之以鞏固紅軍兵士底高漲情緒。反之，戰鬪底不利，則要求政治機關須特別注意來消散一切頹喪與恐慌。戰鬪後，政治機關應關心一切受傷者，看視他們，使他們和地方居民連繫起來以求得居民底援助，給他們講述達到的勝利以安慰他們，這樣來減輕他們底苦痛。對於受傷者的關懷在造成其他戰士底確信情緒上，實有偉大的意義，因為這可使其他紅軍兵士看見不但是他們為蘇維埃共和國所需要，用做戰鬪元素的時候，對他們才加以注意，並且是當他們退出隊列後，也是一樣。

次一關心即是對於陣亡者的關心。這裏不只是說把他們埋了，從戰場上把屍具抬了，就算完事，（這種死屍底形式，是極可影響部隊之精神狀態的，）而必須：第一，關心陣亡者底家屬，通知陣亡者底父母，經過政治設法保障陣亡者底家眷，將陣亡者底英勇功績發表給其他的一切紅軍兵士。第二，必須以相當的軍隊敬禮葬送之，並利用葬送的機

會，在紅軍兵士中實行鼓動工作，鞏固其對於資產階級的憎惡性。此一任務，即是考察部隊的指揮政治人員及各個紅軍兵士的行爲，考察部隊在戰鬪後的政治精神情緒，並將這些報告給相當的上級機關。政治指揮員，在戰鬪後應即刻於其日記本上記載出戰鬪情況中的一切事實（或是關於整個部隊的或是關於個人的事實），並於第一可能時機或於規定的一定時期，寫送政治報告給部隊的政治委員。政委則應與其指揮員一同特別注意與衆不同的紅軍兵士，提出請求相當的嘉獎：紅旗勳章，手錶，或其他獎品，在命令內感謝，在紅牌上標名，登報頌揚等，政委應描寫戰鬪中之最足以動人的事實，登到紅軍報紙上，或須照下勇敢者底像片，以便登印到相當的雜誌上。對每個紅軍兵士在戰鬪中及戰鬪後的不斷注意，實是最好的訓育方法之一。

對於黨員，政治機關底任務仍在於檢查其在戰鬪中的行爲與工作，審計在戰鬪中減去的一切黨員。政治指導員每分鐘都應知道，在他連內有若干黨員，在本日或本戰役內何時減去若干。如情況許可時，則最好是召集黨員的短促會議，以達其「政治檢查」

相互激勵，更進一步的團結，更正確地鑑定部隊行爲的目的，並因此而定出嗣後的任務。政治指導員，應根據這些基礎來編出在當前休息時的工作計劃決定在本部隊內鼓動宣傳底基本對象，（紀律墮落，與掠奪鬪爭，與各自供給鬪爭，舉行隨時的政治運動等）。

如戰鬪遷延至數日或數星期戰鬪中的間斷時期應利用之以舉行支部大會來進行黨的經常工作。在黨的支部大會上，逆常的議事日程爲：（一）戰線上的狀況，（二）目前時機（三）與部隊內所發現的缺點鬪爭，（四）目下的政治運動，（五）檢查黨員在戰鬪中的行爲。

在紅軍兵士中的鼓動宣傳工作，應緊隨戰鬪底停止而即刻以談話，發散傳單，讀報等形式恢復之，如情況許可時可召集連部大會。在戰鬪底間斷中能遇有更爲順利的條件，更可發展廣大的工作，直到全體大會，晚會，音樂會爲止。鼓動車應迅速在紅軍兵士中開始其工作。研究組，唱歌組，小的音樂團，革命的遊戲及其他一切簡單形式的消遣，都應

估鼓勵與宣傳底相當地位，普通必須注意使鼓勵政治工作能夠與簡單的消遣娛樂正確地連繫起來。如消遣與包含相當的政治意味，固屬甚好。然即無此種意味，簡單的消遣也是必須的，因為他可幫助紅軍兵士精神的休息而驅除其艱難的戰鬥印象。如無歌辭活潑的政治工作時，則立刻會反映到紅軍兵士底自己感覺。

為發展鼓勵宣傳工作起見，應注意到利用戰鬥中的一切事實。例如，口報或活報不但應通報關於別一戰線底狀況，而應同時通知本部隊底種種動作，如通知某紅軍兵士底行為，描寫英勇，畏縮，逃亡，敗類等事實。在後一問題上，要須與革命軍事裁判所及特科發生連絡。

在戰鬥後，部隊底整頓，政治機關應關心供給報紙，傳單，及其他宣傳品，直接傳送到最前線底部隊去。報紙最可提高情緒，鞏固政治狀態，連繫每個部隊底工作於全國一切戰線底工作。

當戰爭後佔據新地方時，常可發生關於收編自願兵士的問題。過去國內戰爭時，被

解放之區域內的自願兵士，往往即是部隊之補充的主要來源。往往有許多許多的團在戰爭勝利後擴大其成份至兩三倍。大家知道，例如當一九一九年烏克蘭的（現時改為基輔的）第四師之包恭氏及達拉善諸旅從史可洛八得及別特六洛夫手中解放烏克蘭時，因地方居民之勇躍投軍而增加了數倍，有許多團，其中的人數直達五千步槍手，並至一百以上的機關槍，這在那時實是極大的數量。經驗指示說，對於這種問題，必須十分謹慎。開始如迅速碰到一個嚴重的失敗，反可招致迅速的低落與多量的逃亡。未曾訓練就緒並在政治上未曾改造之部隊，會迅速地土崩瓦解。由此可知當紅軍於一九一九年進攻烏克蘭之節尼金時，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為何發出專門的命令（對第十四軍，一九一九年，六，二二日，第一三一號，於克列氏城）來禁止於部隊內直接收編自願兵士。在這命令內說了如下的話：「第十四軍內有些部隊常從事於「各自補充」，就是說，給自己部隊收編鄰近村落或鄉鎮底自願兵士，而有時竟至連各縣軍事人民委員會所動員的人都抓去了。特此通知第十四軍底全體指揮員及政治委員，這種各自補充的方法，

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是無條件地禁止的。自願投入團內的新兵，通常缺乏必要的教練，易起驚惶而致部隊失却戰鬥力。此外，常有藉自願投軍之名而混入部隊的敗類，願意領到步槍與皮靴後轉身回家。

『自願兵士應立刻撥入後方補充部隊，祇有從後方用行軍連方可調往相當的團內。其他的補充方法是無條件地不允許的。倘今後仍有續行各自補充的部隊，其指揮員及政治委員應送交革命軍事裁判所審判之，以違犯戰鬥命令論罪。』

一九一九，一二，一日，革命軍事委員會第一八〇號命令『關於征服游擊性的方法』內，對這個問題說得非常詳細，我們認為必須將他差不多全部引來，因為他能夠給我們明瞭的指示。這種指示，即在將來，也是須要的。

『南方戰線底各軍，日漸入於烏克蘭底游擊地域。對游擊與自願兵士的實際政策，於是佔有極大的意義。這種政策不僅可決定我們戰勝布尼金的勝利，而且可決定將來蘇維埃政權統治烏克蘭的整個命運。必須迅速採取種種方法來預防重演上次的——

傾覆了烏克蘭之蘇維埃政權的——現象。

(一) 必須首先便往烏克蘭移動的諸紅色部隊不至沾染游擊性及馬可腦派的危險。爲達此目的，必須：

A、進行口頭的及刊物的廣大鼓動，說明正式軍隊比較暴動支隊的優點，利用過去的例子來證明馬可腦部及馬可腦派底叛變作用。

B、將開往烏克蘭去之部隊內不守紀律的及傾向游擊的一切政治委員，指揮員，及共產黨支部共黨員，一律掃除干淨。

C、採取一切必要的處置，務使生於烏克蘭的紅軍兵士不得離開部隊而逃奔到他底村莊去，尤其是偷帶槍械。

D、提高部隊底一般紀律，與各種土匪主義及放蕩的表現作嚴酷的鬭爭。

(二) 嚴格禁止出征部隊底指揮員和政治委員，直接於其部隊內收編各個的或集團的自願兵士，所有一切自願兵士，應派往後方，以編入陸軍或海軍底補充部隊。政治

委員指揮員如有破壞本命令者，應負嚴重的責任。

(三) 特務科會同政治部，向前方暴動者所活動的地域內派出自己多量之可靠的忠實的，機變的工作員，充任自己底特派員。這些派出的同志，應進到一切游擊隊內，以便從內部詳細地認識每個游擊隊底性質，其中各種集團及各人間的相互關係。這些特派員須非常謹慎地在游擊支隊中進行鼓動，解釋正式部隊較之游擊支隊的優點。

(四) 當游擊支部能與我軍直接接觸而處於敵軍戰線前的時候，則該游擊支隊即已失其為戰鬪部隊，須認這點為不移的定理。從此時他即變成一種方待改造的材料，所以須撥到後方編制總部去（支隊中之壞分子驅逐之，指揮人員更新之，插入必要數量的黨員，進行必要的教練精神。）

對於較有強大之戰鬪力的個別游擊支隊，亦可許其重新衝入敵人底後方。

無論任何時機，游擊隊均不得給有在紅軍隊列中作戰的權限。

(五) 我們指揮員與政治委員對游擊支隊的態度，應帶有不撓的堅強與偉大的

機智

A、爲求游擊支隊完全服從自己起見，須憑藉先前派往支隊力的特派員（第三條）及環繞於這些特派員周圍的良好份子。

B、從我們與支隊接觸之時起，鼓動及服從正式軍隊系統的工作，應立刻採取廣大的性質。

C、游擊隊在未完全服從我們司令人員以前，不應予其任何的供給。

D、最有功勳及最守紀律的游擊隊員，不但可以並且應當獲得戰鬥贈品的褒獎或是紅旗勳章。

E、壞份子應開除支隊，送往懲罰連去，後方勤務隊去，或交給軍事裁判所之手。

（六）如與我們相接觸之游擊支隊，拒絕服從秩序，表現放肆與自專，搶劫地方居民或企圖在正式部隊內引起騷亂，則該游擊支隊應受無情的懲罰。我們負責的司令人員在這種場合，應嚴格而準確地估計自己底突擊。懲罰底原因，應使每個農民，工人，紅軍

兵士，瞭亮而明白。解釋此項處置的命令，應事前趁早印就必要的份數。為執行懲罰，應指定充分而且絕對可靠的部隊。解除武裝，檢查，懲辦，都應於最短期限內完結之，盡可能地勿超過二十四小時。最重的懲辦，應加之於該支隊的指揮人員及富農的上層份子身上。

(七) 因為烏克蘭的游擊支隊容易發生並容易消失，輒匿跡於武裝的農民羣衆內，故無條件地一齊解除鄉村居民的武裝，方是與游擊性鬭爭的根本條件。這種工作，實俱有偉大的意義，其進行步驟，務應依照確實的計劃。每軍在其動作地域內，應借助其所能辦到的一切方法（鼓勵，祕密偵察，用金錢或物品償付交出的武器，挨戶搜查，用金錢或物品懲罰，相互擔保，拘人為質，槍決罪魁，及其他種種方法），來解除該地域內之居民的武裝。

各師，旅等的分界線，同時就是其所應解除武裝之地域的界限。在各軍革命軍事委員會及各師，旅，團參謀處內，應成立特別委員會或設定個別的負責代表來指導關於解除地方居民之武裝的一切方法。在這種負責代表的掌握中，應有特別可靠的部隊（警

備隊，攔阻隊，特務隊，）增加其數量以至適合於一般的情況爲止。」

必須知道我們第三次進入烏克蘭的特點，方可明白這個命令的意義。我們推想有時會形成另一種情況，那時這個命令中的某些特點，必須變更之，例如許可整個的游擊支部併入紅軍隊伍一節是而且在西南的波蘭戰線上，經過數月後，實際便這樣做了。不錯，不會得到好的結果：當我們收入加立次旅後，當一九二〇年波蘭進攻蘇維埃烏克蘭時，他又叛變了我們。將來國內戰爭與革命戰爭時，這種問題，不免重新發生，其解決方法，恐將多依情況而決定的。

至關於自願兵士，則要求其先入後方補充部隊。在這時機，部隊政治機關的責任是：進行相當的政治運動，以提倡登記自願兵士，適宜解釋這種登記的政治意義，於登記之始即設立政治工作，察知並檢查自願兵士底社會地位，派遣自願兵士偕同充分數量的黨員與政治指導員往相當的補充部隊去，並計劃對派往補充部隊之自願兵士的政治工作。如部隊獲有獨立收編自願兵士的權限時，則政治機關更應精確地挑選自願兵士

(在階級上的挑選)並精確地組織對自願兵士的政治改造。

對於併入整個游擊部隊於紅軍隊伍中的問題，政治機關尤應加以切實注意。這裏亦有兩種政策：或先經補充部隊而編成正式軍隊或直接併入紅軍底一般部隊。部隊政治機關所應負的任務，是精確查明游擊部隊底政治面目，並於接觸游擊部隊之時起，對之進行極奮力的與極強烈的政治改造。這裏，一面必須反抗游擊隊員對紅軍隊隊的惡劣影響，另一面則須對游擊部隊加強政治底訓育；這些，不問游擊部隊底前途命運如何，都一樣是應進行的。

往往與其在後方或戰線上改造游擊部隊，不如使他即刻重新到敵人後方去工作。即在這種場合，與該游擊隊集團接觸的政治機關亦負有責任供給游擊部隊以政治書籍及宣傳品等；撥出黨員到游擊部隊內，使之逐漸準備完全併入游擊部隊到正式紅軍內的基礎，並在敵人後方負責進行政治工作。

當向前順利移動時，在部隊政治機關身上，差不多完全放着在居民中的初步工作。

這種工作，在於組織革命委員會，向地方居民疾速解釋紅軍底任務，蘇維埃政權底政策，揭破敵人底虛偽宣傳，研究居民底情緒，社會成份，建立紅軍戰士與居民間之正確的相互關係，及其他等等。依照部隊嗣後向前移動的程度，這種工作將漸轉至政治部（其農民部）之手而前此由團政治機關所撥出在居民中工作的黨員，則應重新歸回自己。

勝利的戰鬪，其結果常可拿獲敵人大小的或小的集團俘虜。政治機關應從開始就在軍事俘虜中進行工作。這種工作，首應是建立紅軍戰士對軍事俘虜的正確態度，不許對俘虜有傷害掠奪等行為。並同時並有平等的，沉着的，但是堅強的對待，當開始訊問俘虜時，須對之加以相當的注意，不但散播關於專為在敵軍中散播的宣傳品，並散撥在紅軍戰士中所散播的宣傳品，使軍事俘虜確信我們所通知其一切政治事實是正確的。最重要的，是要依據軍事俘虜底社會成份，民族成份，生身地方，該地方所發生過的某種事件，敵軍對該事件的關係等情形來具體規定這種工作。一開始就應分開官長與兵士，使官長不得影響兵士。然同時必須視察軍官俘虜使不得享受任何的特權。

此外，將來戰爭時，我們在敵人隊伍底兵士中亦可遇到各種法西斯蒂組織底份子，這種份子，應經我們審察出來，並與其他兵士隔離開。

對於這種法西斯蒂份子的監視與監視軍官應有同樣的特別機警。不採取這些方法，每可招致非常之不願有的現象。

著名的法西斯蒂兼無政府主義者蘇兒格，在他底回憶第二十年代內，述說他曾怎樣地與其他的節尼金部下在地拉地方被俘虜至我軍哈達高斯基旅，而且未得損毀自己底文件。不知是那個下級指揮員，接過俘虜後，看了蘇格爾底文件（他會有數個文件——一個真的，幾個假的，）不會明白在他手中的乃是蘇維埃共和國底一個最惡的敵人，而祇平淡地讀了一聲「蘇兒格」，遂偕同其餘的俘虜一並遣往奧德斯城，並且差不多並未派出任何的監視。蘇兒格當下便與一個紅軍兵士換掉他底貴重皮袍，而在往奧德斯途中，就溜之大吉了。

第七章 退却時的政治工作

雖然軍事戰術有時忌言關於退却時的戰術方式，其立場謂兵士不應學習退却，我們不能同意這點，因為雖然軍隊學習的是為進攻，為勝利，而不是為退却。但客觀的情況却可迫令我們戰綫的這一地段或彼一地段或全戰線上施行短期的或較久的退却，現代的戰爭，是種種地長期戰鬥，機動，進攻，退却等沒有說是在那一個戰爭中沒有某一部隊不退却的事。（即是暫時的也罷。）而當退却時，恰要求要有最好的指導，因為部隊的精神狀態，這時往往甚為頹落，同時也就大可減低其戰鬥力，紅軍的指揮員，在將來革命戰爭時，尚可起極大的作用，故亟應於必要時機，會履行正確的退却，使革命事業不至受大的損失，軍事的輕浮，在無產階級的軍隊中，沒有存在的餘地，所以，我們同樣要來研究退却時的政治工作。

退却，是部隊生活中最艱難的時機，這時部隊在精神上的牢固性輒多消沉，這時在部隊內，無論是作戰指導與政治指導，都是非常困難的，然當退却時，政治工作恰不應縮小，而應擴大。政治工作的基本工作，首先就是與惶亂、逃亡、煽動鬪爭，祇有當退却時，羣衆會發生一種特殊的心理，這種心理，即是惶亂的胎胚。

軍事歷史知道過去在戰鬪中及一般的軍事情況中，有時所產生的無謂的惶亂例子至萬千之多。茲姑舉出兩個這樣的例子來看：

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給第七軍的命令（一九一九，第一五五號）內曾舉出如下
的事實：

『步兵團的一連，因敵人散兵線對直其翼側而騷動了起來。從這一連內，不安的現象傳遍了全團，團長遂下令退却。全團整個地離開陣地，一直迅速退走了十餘里，滾到亞列城邊。探查的結果，方知在翼側的，並不是敵人，而是我們自己的部隊；步兵團之驚惶連向之射擊後，並以其驚惶情緒傳染了全團。』

可是，驚惶撤去的團，並不是這樣的壞。當他歸還了自己的信心後，他馬上就向後轉，半跑步，半跑步，滿身汗水，不願寒冷天氣，一點鐘走了十五里，驅逐了不多的，重新佔據了自己原來的陣地，受了不大的損害。」

穆克列夫其同志在他的文章戰時的政治工作內曾說：

「當一九一九年十一月我們革命第一週年紀念日的時候，在道洛站上由集中準備進攻白軍的紅軍部隊舉行了紀念的露天大會。正在開大會之際，忽然譁的一聲，一座小橋被紅軍兵士壓壞了。許多紅軍兵士被陷入壕溝內。於惶亂中，有人喊了一聲：『逃命呀，霸王來了！』這一聲便立刻引起了無謂的射擊與壓踏。機關槍聲亦響動了。結果，幾個紅軍兵士受傷，幾個被壓得很重。幸不會有死亡的。」

須知惶亂首先是由「黑暗的不覺悟的膽小的兵士」起頭的。

穆克列夫其同志指示的很對（戰時的政治工作）他說：『惶亂可遍及全軍，但最早則開始於文化低，不覺悟的兵士。在每部隊內常可找到幾個主持惶亂者。』他們不但

播種各種妄誕，並且還是偶一失利時之「退却」的鼓動者。他們是紅軍兵士大家所知道的，並常嘲弄他們，喚他們做「懦夫」、「兔膽」等，然一遇危急時機，他們却善於攪亂人的心意。」

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說得直捷了當：「誰說『退却吧，敵人繞圍我們後方了！』那他不是渾蛋，就是叛徒。」

然而就是渾蛋，有時這比叛徒為害更大些。所以這種「惶亂者」與「膽小者」實是一個很大的危險，且於危難時，對他們必須加以專門的監視，將他們託付與堅定的同志，使之根本剷除各種惶亂企圖。

與惶亂及逃亡鬪爭的方法，並不祇是一種：始於鼓動方法，終於軍事裁判以至就地槍決罪魁。在戰鬪中反抗惶亂的鼓動方法，即是尋常的簡短的心理上的影響——應時的笑話，惹人歡笑，某一通俗的口號，開始時的戰鬪歌曲，同志或指揮員底叱呼——舉凡這些，有時還可用做與惶亂鬪爭的好資料。當紅軍與波蘭軍在高鐵村一帶作戰時，紅色

部隊會被威嚇。這時從政治部（該部亦受了若干驚惶）內也走出了幾個人投入退却線去。師政治部裏一個女打字員，有勇而且具有戰鬪經驗，攜槍撲入退却線去，將紅軍兵士無情地大罵了一場。這個女子去突然的出現及其勇敢精神，使紅軍兵士受了莫大的影響，立刻停止退却而投入反衝鋒，波軍遂被擊退。一切同志都異口同聲地說，這次那位女子的破口大罵，實起了莫大的作用。

誰都知道關於學兵在戰鬪中口唱國際歌而死的故事。在另一方面，有時為與惶亂及逃亡鬪爭，不得不採取極端的手段，直至不惜就地槍決罪魁。

國內戰爭時，有些師內曾成立過戰鬪拳，在任何情況內都是可靠的，叫做飛行支隊，共產十人團及其他名稱。且舉出東方戰線第四集團軍所發佈之關於組織飛行支隊——「十人團」——的訓示來看：

「『飛行支隊』是革命的支隊，直接活動於近後方。

其任務——與單個的及集體的逃亡鬪爭，與各個紅軍兵士底部隊底及支隊底狂暴與蠻橫鬪爭。

「十人團經常伴同派定自己所在的部隊，遂行授與自己底任務，同時應在自己隊伍內保持最嚴格的革命紀律，並以身作革命秩序底榜樣。

所有一切「飛行十人團」底編成與活動，均由革命軍事委員會直接指導之，或對各該「十人團」專們委派的全權代表指導之。

編成的「十人團」得分撥至各師內，由師長按部隊分配之。

除其直接任務外，「飛行十人團」並應以武裝力量壓服白黨在本部隊配置地域內的騷動，逮捕反革命者，煽動者，奸細，協助地方蘇維埃政權機關以實施工農政府底法令決議案號令。

「十人團」底成份，「飛行十人團」祇可收入黨員及同情者。

非共產黨員的同志，其願加入「十人團」者，須有蘇維埃代表及蘇維埃機關底介

繼

支隊底首領，必須是共產黨員；應有兩個黨員做他的幫辦，其餘七人，或為黨員或為同情者。

「十人團」應有機關槍，騎兵的，步兵的。」

在其他時機中，常很簡單地用最堅固的部隊編成攔阻支隊，攔阻支隊應供給有多量之戰鬥的，堅決的黨員，以保障攔阻支隊在政治上的覺悟及在戰鬥上的鞏固。攔阻支隊須配置於可能退却的各條主要道路上，特別要在渡河點地域，交通要道之交會點等處。

與逃亡鬪爭的特別主要點，在於革命軍事裁判所底工作正確；他應將自己底裁判機關網直接分佈到戰鬥部及攔阻支隊，於當地迅速能嚴格地審判之。在每個逃亡，惶亂及其他等具體事實周圍所進行之廣大鼓動運動之下，革命軍事裁判所底迅速裁判，在與這種壞現象的鬪爭的順利上，實有莫大的作用。

良好的共產份子的補充，對於提高部隊底精神情緒及與部隊底瓦解鬪爭的問題上有很大的意義。當退却的時候，不能施以紅軍戰士的廣泛補充，因為這種補充戰上既不會受充分的訓育，又不熟悉新入的部隊，不但不能加強部隊底戰鬥力，而且自己會四散脫逃，傳染整個部隊，並在其退却的道路上，散播惶亂底種子了，共產份子補充宜併入之，但必須用曾經相當檢驗過的，在政治部內很好「指教」過的，對於退却時之工作條件有充分訓練的黨員。大批的共產份子補充的增入，祇其本身出現的事實，在情緒的轉變上，已可起很大的作用。這種補充應帶來他自己底銳氣——尙未受連日退却及嚴重失敗之刺激的銳氣，——及自己底奮勇情緒。他可傳述關於高級兵團所採取的各種方法，關於正在準備的補充，及其他等消息，他可往前綫傳到必要的口號，必需的戰鬥情緒。當退却時，並應正確地利用部隊內原有之黨員。這裏必須於掩護退却之後衛部隊——戰鬥底重心——內多增加黨員的百分數。照規則講，政委亦應在後衛部隊內。（卽是副政委亦可。）

當退却與失敗時，對一切黨員必須顯明地提出問題，使其知道自己底責任，在這時期更加重了。在這艱難的情況內，一切支部正應來檢查自己一切同志之戰鬥的堅強性，黨的堅持性，及其犧牲的精神。一切敗類與懦夫，提交法庭審判之，並開出黨籍。

通常在這時候，黨的經常工作極不容易進行。然而必須集中一切力量，使支部仍得保持其堅固的組織，並於極嚴重的情況內，不至解體。必須利用各種可能以組織支部底大會，首先接連組織，然後及於高級兵團。如支部因某種原因而至解體時（如缺領導人員，或當退却時紅軍戰士與黨員四散等），必須無論如何重新整頓起來。這裏可利用甚至部隊之極小的休憩時間來集合支部。一九二〇年四月，第五八師之獨立旅從任道米退却時，政治工作人員為整頓各支部起見，偕同整個部隊採用了下列方式。從雜色混亂之退却的紅軍兵士羣衆中，會分出了尚未消失其覺悟性之個別的小支隊，並予以配置於支隊底前衛與後衛內。在兩村之間的開闊地面內，下令停止了退却的縱隊，並使全體直至每個紅軍兵士一齊跳下車來，（其所乘座之車，）而對於黨員，則命令其集合於一

定的地點。趁着旅長按班分配指揮員，按連分配紅軍兵士之際，並趁着諸指揮員整頓自己連內秩序，計算和分配下級與中級指揮人員，以及與其紅軍戰士相互認識之際，政治人員也就分配了一切黨員，給各連指定了政治指導員，召集了政治指導員底短促會議，簡單地通知了其目前的基本任務與工作口號，然後立刻按個別的支隊，（按個別的「團」因其人數極少）舉行了各支部大會，在這大會上提出了整頓紀律及與「各自供給」鬭爭的問題，並舉出了常務委員會，後者立刻登記了一切黨員，並給各個黨員發派了任務。

這種會議，必須利用之來作各種通報，示給口號，任務，及規定短期間的工作計劃等。退却時期，務須注意各種政治行政方案。其最主要的是：（一）檢查輜重隊內的人員，（二）與各種浪費的現象鬭爭，（三）與拋棄軍裝鬭爭，（四）從部隊內清出間雜份子，（五）幫助司令人員整理供給工作，（六）衛生工作。

所以必須檢查輜重隊內之人員者，第一，因為退却時期，一切敗類，懦夫，從戰綫跑來，

首先就集中到自己輜重隊底周圍。因此輜重隊底人員使大大增加起來。這種混入輜重隊的現象，實是掩蓋逃亡之一種形式，亟可破壞部隊，所以必須經常地檢查輜重隊與後方，將輜重隊內凡是俱有戰鬥能力的人一概調到戰線去，將一切明顯的或半秘密的逃亡者繩之以軍法。革命軍事裁判所底代表應時時到輜重隊內與後方去視查，并給自己找到工作的場所。此外，并須將輜重隊內一般的戰鬥力量，盡行派到戰線去，以增加戰士底數量。

必須與種各浪費鬭爭的原因，是因為各種浪費會立刻惹起退却之紅軍戰士底注意，并削弱其意志，而為一切敗類、懦夫、煽惑份子所乘機利用。所以當失敗之際，必須特別注意一切浪費的現象，并須對指揮人員、政治人員及後方人員底需用，一般地加以限制。舉凡一切非直接供做戰鬥任務使用的東西，如多餘的汽車等，均須派往戰鬥部隊，各種醉酒、掠盜及其他等現象，應無情地懲辦之。

要注意與拋棄軍裝的問題鬭爭者，其原因在當惶亂退却時期，凡是兵卒——凡我

們紅軍戰士也不常是例外——都企圖把自己從多餘的擔負下解放出來，拋却自己襤衣；棄掉自己外套，甚至往往脫下皮靴，以便跑起來輕快些，關於土工具，更不消說，而且有時連步槍都不要了。與這些事實鬭爭的手段，一面是鼓動，一面則用紀律與法庭底制裁。

間雜份子中最足以刺激紅軍戰士之神經的，首先就是女人。國內戰爭時，指揮政治、行政、經濟人員底妻子，常常追隨其丈夫於出征部隊的，并與之一同行止，當戰線上事局處處順利時，還對她們不大注意。反之當退却時，這些人咸集中於輜重隊內，而輜重隊則常常與其出征的戰鬪部隊相接觸，特別是當惶亂之際，他們常引起了巨大的騷亂。所以凡在戰鬪情況內，必須遠屏一切間雜份子——尤其是女人——於出征軍外，而尤以退却時為最。

正確的供給工作，對於紅軍兵士底戰鬪活動，一般是有偉大的意義。而供給工作，在退却時却常常紛亂。政治機關底任務，在特別注意這種現象，設法補救其工作的中斷，并

當供給部之政治機關與出征部隊隔離或被敵人捕去時，分出必要數量的政治工作人員以幫助迅速整頓或設立供給部之政治機關。

「農民工作員」在這種工作上實可給於很大的幫助，因為農民工作員底工作，在退却時是非常有限的。而各種供給工作則都與居民密切相接觸着。當一九二〇年五月第十二集團軍之一師退却時，由「農民工作員們」於最短期間內組織了食糧徵收機關，即用是種組織底廣大鼓動宣傳手腕，於最短期間收集了許多糧食。上面說過的第五八師之一旅，於其退却之際損失了一切輜重，於是派出「農民工作員們」到該旅退却的前程去，準備農民收容紅軍戰士宿營與供給飯食。當該旅在好道造糖工廠沒收八百蒲袋糖以作自己交換的基本時，為轉運這些糖，曾用鼓動方法設定了馬匹義務，并動員了必須數量的馬車。最後，并由這些農民工作員組織了蒸烤麵包的義務。在該旅宿營的地方，把糖換來的麵粉發給每個農家而令其烤出相當的麵包。這樣的接洽農民，在與農民設立正確的相互關係上，獲得了許多協助，并使我們從農民方面得到不少的援助。

鼓動宣傳工作，在退却時期，絕不應間斷。這種工作的方針，首先在保存戰鬥力，在與逃亡及惶亂鬪爭，在提高紅軍戰士底士氣與恢復其戰鬥情緒，在失敗時期，往往因部隊在精神上的瓦解，而發生銳烈的反猶太主義與仇視共產黨。對此兩種現象均須進行廣大的鬪爭。在這裏有極大意義的，就是正確的通報。拉彼且夫同志在國內戰爭時的政治部（見哈爾可埠軍區革命軍事委員會出版的革命軍雜誌第一號）一篇文章內寫得很對：『第一的和主要的就是預防並克服惶亂。惶亂底由來，通常因為缺乏通信連絡，而富於各種關於被包圍，被破滅，叛變，參謀處逃散等謠言。在這裏有重大意義的，就是從後方送來的報紙，週刊，及報紙形式的傳單等。報紙出現的事實本身，是證明後方仍存在着，並未失陷，要利用每個最小的可能，來迅速恢復已破壞的通信連絡，以便向前發送報紙，運輸汽車，鐵甲車，師長底汽車，如不得已時，則用傳達員底座囊甚或師長底座囊。雄壯命令，組織的口號，通報，這些都可使混亂部隊底政治人員醒覺，拿定自己。』

毫無疑義地，供給退却部隊底報紙，無論如何，應為鼓動宣傳工作底重要任務。無怪

第十二集團軍在其退却時之政治工作的訓示內第九項寫道：『無論如何須整頓報紙底傳送，不惜為此而槍決畏怯的發行員與宣傳品發送員。』

然鼓動宣傳工作，不僅只限於發送宣傳員而已。還要在所領到之宣傳品底周圍，應組織對紅軍戰士談話，——個人的或集團的，——讀報，及其他等；應利用各種可能來做到這些。無論宣傳品領得與否，文化工作均須進行。在上面所說之第十二軍底訓示內又說：『文化工作絕不應斷絕。每個休息，駐止，均應利用之以發展「俱樂部」底工作，——或直接在露天或騰出大些的家屋，紅軍戰士底演劇，大會，談話，均可幫助提高部隊底情緒。』

即在上面所說之第五八師底一旅內，曾廣大地利用了每分鐘的便利時間，雖四面受敵包圍，該旅並未惶亂，主要是因為紅軍戰士不知事件底真象，看見政治人員完全在照常進行工作，於傍晚宿營時，組織了大會與短速的晚會，跳舞，原始的音樂（提琴，）笑話，講述過去的戰績的故事等，倒各自安靜如常。結果，使紅軍戰士消失了關於四圍的危

險局面的意念，煽惑的謠言，自己本身就冰消了，在紅軍兵士中不起任何的影響，及至敵人從正面或後方發現時，紅軍戰士毫不慌張地拿起槍來擊退了敵人。

各師底輜重隊及後方底各種機關，管理部等，通常在形成惶亂上，均可起很大的作用，必須對他們以相當的注意，保持其完整的紀律。凡是我們以前說過的方法，這裏亦可運用。拉彼且夫在其同上的文章內又說：『必須注意到後方各機關及交會車站底狀態。革命軍事裁判所和特務科設法反抗惶亂者，煽惑（因這裏他們可自由，可亂談）脫走者，逃亡者。這種處置，並應使戰鬥部隊知道。在配置參謀處底地方，交會車站及其他重要的地點，遊藝會，大會，音樂，通報的週刊等，可減輕惶亂，而有時更可剷除惶亂。例如，當波軍春日進攻高洛站時（三月六日），這時哈林站，茂則城，奧陸城已先後被敵一舉而下，井前來進攻魯德拉道，第四七師政治部為與惶亂爭起見，仍然繼續進行原先預定之慶祝共產國際週年的計劃。雖在砲彈轟擊之下，雖在朝車廂內裝載師屬各種機關及政治部本身，然而從早到深夜，不曾停止音樂，井舉行了羣衆大會，每人幾乎吃茶水及被款待

至十餘次之多，（在鼓動處內）壞蛋與後方服務的人等均覺疑惑不定。然而惶亂終於平息了。高洛得未失陷，而且結果一切均很順利。

爲提高紅軍底戰鬪情緒起見，必須在紅軍戰士底周圍造成一種普遍的親愛，關心，及援助紅軍戰士的情況，無論是在地方居民方面，或是在高級政治軍事，蘇維埃機關方面，都是一樣。不拘某一工廠底工人代表，尤其是攜帶慰勞紅軍戰士的物品，（自然慰勞物品應是紅軍戰士在戰線上所需要的，有價值的，適當的東西）并活潑地談述關於工人階級對戰線的注意，關於正在準備的援助及幫助，關於工人底奮發情緒等，這一切在不拘任何的戰鬪情況中，俱應充分廣泛地利用之，而尤其是當退却時期。

對居民的工作，在退却時期，應用堅強的速度繼續之。這種工作的任務，在使地方居民對紅軍部隊加以各種的幫助。爲此，必須使地方革命委員會能夠繼續其堅強的及安靜的工作，以組織地方農民於紅軍底周圍，組織地方居民對紅軍之各種幫助：馬車，糧食，在精神上的援助，在偵察，警戒，通信，及向敵人散播宣傳品等方面的幫助。然欲使地方革

命委員會能夠多少安然進行其工作，不至心存在將來部隊退却時恐被敵人抓去的念頭，那末必須與地方革命委員會保持特別密切的連繫。必須要求鄉區底或村落底革命委員會工作至最後的時機，隨着最後的退却纔結束其工作。所以對地方革命委員會底連繫，應直接由團政治機關維持之，最好是由政治委員親自維持，因為他可熟悉戰鬥情況，可屆時警告革命委員會底工作人員，使其知道當前的危險及預定的退却等。革命委員會底本身直至其存在的最後一分鐘，都應充分地靈動與輕便。在準備退却時，革命委員會應有其撤退國家財物的計劃，及撤退一切凡可有利於敵人的物件的計劃。如不能撤退某些物件而紅軍部隊亦不能利用這些物件時，必須有組織地把這些物件轉交給地方上最貧苦的居民。這可充做擁護蘇維埃政權的最好宣傳，并於嗣後經過此地重新進攻時實可獲得地方居民底切實幫助。須知在國內戰爭時，這種方法，不祇是我們採用過，連我們底敵人也還採用過。例如當一九二〇年夏間，波蘭第三軍由基輔退却之際（因被包圍於伊爾別與借借列河之間），波蘭部隊固然焚燒了自己不少的物件，然而

大部份，則發給了地方上的富農。不錯，波軍此後并未得重來該地，但是紅軍却不會獲得這些物件。

當退却時，在居民中工作的重要任務之一，就是在居民中組織游擊支隊，以便在敵人後方活動。組織這些游擊支隊，務須格外謹慎與精細。必須組織這種工作的原因，在於當退却時，這些會給紅軍在政治上改造過的地域，曾經領受過工農自己政權之意味的地域，便落在敵人底鐵蹄下了；這些地域必不甘受資產階級政權之宰割的。所以這些地域，在敵人初佔後的時期內，實是組織游擊支隊，并且也是一般地暴動活動底好機會。

當退却時，地方革命委員會須將一部份共產黨員留做秘密工作，使其在敵人統治下進行在居民中的政治工作，組織將來的暴動，與出征的紅軍部隊設立通信連絡，設置偵察及其他。

退却時期，可廣為利用之於敵人中散播我們底宣傳品。每個退却部隊均有可能在各農家，圍牆上，樹上，十字路上以及到處張貼我們底傳單報紙，專門的宣言，掛圖及其他

宣傳鼓動品。任憑敵人是怎樣設法反對我們底宣傳品到他兵士底手中去，但是他要將這所有一切地域內都賠盡的我們宣傳品一一拿來焚燬了，却是不可能的事。時常或多或少的一部份，終可直接落到敵人隊列中之兵卒底手中。政治機關絕不應忘記這種工作。爲此，須有用敵人文字印出的充分數量的各種宣傳品，以爲準備。

第八章 在陣地戰中的政治工作

在國內戰爭中陣地戰底運用，比較在帝國主義大戰中稀少得很多。然而陣地戰底場合，也常有過。如哈浩虎要塞年一九二〇年的防禦，在斯道浩河岸的駐守，一九一九與一九二〇年間在別來岸的戰鬪，或我們第四與第五八師諸部隊在新城與別即切區域內在一個陣地上連守數月（一九二〇年）等事實，我們就可想見了。一般說來在國內戰爭中，常有久停於陣地上的事實，並不特別藏身於土地內。將來革命戰爭時，陣地戰底場合，勢必很多。所以我們應準備這種鬪爭的形式，並在其中適應我們底政治工作。

我們終須區別陣地戰為兩種時機：第一，當部隊因戰綫某一段暫時的沉寂而藏身於土地內的時機，這時部隊在數星期或數月之久都沒有自己配置的地點，時時處於戰綫底火線上，直接與敵人相接觸。此外，必須單獨分出第二種時機，這就是當戰鬪暫時

沉寂數個鐘頭，而部隊留於戰場散兵線內的時候。先來說第二種時機。我們的散兵線遇到了敵人的反抗，不願向後退却，同時又不能向前移動，於是就伏臥於林緣，豁谷，或丘陵等障地內。同時，戰鬪斷致很久的鐘點。紅軍戰士遂謹得若干閑暇時間。爲使緊張的情況不至影響紅軍戰士底勇氣下沉，共產黨員與政治人員應利用這種情況進行些政治工作。這裏所可運用的工作方式，只限簡短的談話（個人的或半耳語的形式），有趣的滑稽笑話等。最好，假使部隊政委能到這處於緊張狀態之障地內的部隊中去巡察，這可使紅軍戰士看見並未忘掉他們，以及對他們的關懷與注意。在這戰鬪中斷的時候，給前線送飯食與報紙，甚爲有利。新鮮的報紙，最可提高戰鬪情緒。

在這鼓動工作當中，一切黨員同時應特別切記防毒紀律及防空偽裝等紀律的意義。

拿前一種時機來看。在戰線上形成了長久時間的沉寂。各部隊配置在諸村落及其他住民地內，於前方派出了警戒，偵探羣，偵察，及佔領鞏固地帶或戰壕線的值班部隊。在

這種場合，在偵察警戒、偵探、偵探班、偵探隊內的工作，是各不相同。在偵探隊內，當然不可進行任何鼓動工作，不可隨便講話。這裏不可分散偵探員們對其直接責任的注意力。機警，這就是要求偵探員底基本質量，這種質量，無論任何時機均不應渙散，並不應為其他任何工作所間斷。無論是談話言笑、講故事等，在這裏都不應有存在餘地。在偵察及警戒部隊內的工作，見上面第五章所述。當配置於與敵人直接接觸的時候，一般在政治行政工作方面，應特別注意檢查偵察、警戒、通信連絡諸勤務底正確；政治委員應親自檢查這種工作。

在駐止的預備隊或配置於住民地之房舍內的部隊中，政治工作應盡量發展之。政治工作在這裏只受一種實在的限制：不應減低部隊底機警。然而要使部隊底機警不至減低，並不是說要停止或縮小政治工作，而是要有正確的警戒、偵察、通信連絡等工作。

在這種部隊內，政治工作多可依計劃進行之。當然，逐日的計劃，在這裏是不切實際的，因為敵人每次的進攻或我方每個新的作戰命令，均可破壞事前預定的方案。這裏的

工作計劃，應有充分的彈性，然不應因此而防害其先見性與預定性。

政治組織工作與黨的工作，不宜祇限於經常的黨會，有時并可舉行特別的黨會，在這種會議上，不宜祇限於研究直接關於戰鬪底問題（與逃亡鬪爭，鞏固紀律，軍事宣傳等），並應研究黨的組織底一切命令，訓示，黨的代表會，大會等決議案。應利用戰線上的這種平靜時期，盡量地訓示一切政治指導員及所有的一般政治人員。固然在這種情況下，不可使政治人員久離自己部隊，因為如遭敵人突然進攻時，可陷部隊於完全沒有政治人員及黨員的情況內。所以黨會應直接於自己部隊內組織之。即使全團配置於一個村落內，然在這種情況下，組織黨的全團大會，亦不是常常有利的，因為如遇戰鬪警號發生，而黨員則距其位置甚遠。所以在這種情況下，全團底黨的工作方式，最好是舉行代表會，使充分廣衆的代表參加之（三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黨員）。政治人員會議，亦應同樣進行之。無論何時，須於部隊內留下代理人。並須無條件地禁止召集全體政治人員，務須直接於部隊內留出充分數量的政治人員來執行自己底職責。

在續久平靜的時間內自可進行各種小組工作，（首先是黨的研究組，）及在指揮人員間的工作，但必須遵守上述的要求：勿從部隊內抽出百分之五十以上的指揮人員與政治人員。

鼓動宣傳，牠的基本任務，應沿兩個基本方針進行之：第一，喚起紅軍兵士底興味，消除其心中關於危險的念頭，家裏的煩惱，思想妻子及故鄉的愁意；第二，發展其政治底覺悟性，這裏可運用各種最不同工作形式，開始於談話，大會，演劇，口報，政治法庭，以至終於有組織的政治課。司令者往往甚至可施行軍事教育。總之，軍事宣傳這時應佔整個政治工作的重要地位。軍事宣傳應使紅軍戰士認識敵人戰鬪底最新方式，反抗這種方式的方法，及使紅軍戰士切記野戰條令中之最主要的意旨等。大家知道，我們反抗唐克的軍事宣傳——在這種宣傳上，曾參加過極著名的黨的工作人員與鼓動者，直至別特乃同志，在我們底戰鬪上，曾起過何等偉大的作用。當在別來高作戰時，紅色哥薩克師長布立馬高夫聞得白軍部隊內發現唐克後，即向所部之哥薩克解釋了唐克底本質與意義。祇

這種解釋，已足使部隊不但沉着地迎過了唐克底出現，并用自己砲兵火力擊退了牠，（見威爾浩斯基底協同戰術）祇有這種宣傳，方為適宜。

當駐止於這種狀況下時，高級政治部方面，儘有幫助組織這種工作的可能，如供給電影機，派送演劇班（派出一定的時期），及其他等幫助。但當進行各種工作——直至晚會，音樂會——時，祇須切實注意完全保持部隊底戰鬥力，使部隊在每分鐘內都可準備出發。這樣的晚會與俱樂部的會議，均應與總的作戰意圖切實協商之，參謀處與司令者應——這些人員集聚的地點發生密切的關係。戲劇或晚會，應於必要時機，依戰鬥警號隨時都可立刻中斷，戰鬥警號過去後，有時亦可恢復之。因此，全體政治人員應準備採取必要的預防手段，並於任何時機，均應準備適應情況底各種變遷。通常在這些會議及晚會上紅軍兵士應身着全副武裝出席，以便遇警號之際，不至耗費時間去武裝及尋找自己底住所。最重要的，是當組織這種晚會時，時常必須留出一大部份紅軍兵士於其原來的位內，並須使在集聚場所內之紅軍兵士得知戰鬥警號時所下的一切號令。

在居民間的工作，當駐止於一處的時期內，可盡量發展之。全體政治機關及全體紅軍戰士與指揮人員均應積極參加這種工作。這裏應特別注意的，就是要使每個紅軍戰士成爲蘇維埃政權之經常的鼓動者。紅軍戰士常多與地方居民相接觸，與居民談話，可很大地影響居民，同時並往往感受居民底影響。當我們紅軍部隊久駐於富農地域內的時候，我們紅軍戰士爲達其從地方居民方面獲得良好的食物起見，往往附和地方富民底生活，助罵蘇維埃政權及其食糧稅則，附和地方上的宗教習俗（例如，照行宗教底儀式，以圖主人請他去吃席。）這種現象，必須時常加以估計，採用方法根本剷除之，並須同時對地方居民進行極廣大的鼓動文化工作。最重要是預先向紅軍戰士說知地方底習俗，儀式，傳統的僻見，並指出我們對這一切應取的態度：不要嘲笑這些陋俗，而對之進行忍耐的文化工作。反抗這種陋俗的宣傳，應非常謹慎地進行，要用最有經驗的政治工作人員擔負。

對居民鼓動宣傳工作的形式，在紅軍戰士及全體政治工作人員方面是極不相同

的。這裏無論何時，不可祇限於某一固定的呆板形式，而要時常依據由居民底生活，政治狀態，對紅軍兵士的態度，及周圍之環境所推演出的形式。紅軍戰士對地方農民所正確組織的勞動幫助，可獲得很大的意義。很好地組織禮拜六，使其有好的勞動結果，並正確地挑選工作題目（工作題目在居民間應通俗，例如：收穫田禾，修築農民所須要的道路，橋梁，建築學校，組織閱書室等）。各種歡送歡迎等，在這時機，當然不多適用。這種工作，應代替之以與居民設立經常的聯繫，對居民的幫助，以及用各種工作形式吸引地方居民來參加在紅軍兵士中所進行的一般政治工作。逢各種革命紀念，紅軍勝利，地方重要事件，部隊及支部紀念日所組織的莊嚴會及事務會等，都應廣泛地運用之。在有些師內，組織所謂兒童紀念，會起了很大的作用，其內容就是紅軍戰士給兒童們組織晚會或遊行，作樂，講故事，童話，各種遊戲，及各種贈品。這種兒童紀念，實是紅軍兵士與地方居民接近的最好形式，而尤其是與最黑暗而且最無政治覺悟的一部份居民——女人。有時，這種紀念直接舉行於與敵人直接相逼近的地方。例如，第五八師第三旅，參謀處位置於堡立

地方，與敵人相隔三十里，組織了很大的國際兒童紀念，參加了九個鄉村學校，內含烏克蘭的，波蘭的，猶太的，德國的及俄國的學校。這個兒童紀念，尤其是兒童各在其本國語言上所唱之國際歌（在波蘭語言上所唱的所在內，而這時却正與波蘭作戰），不但在居民中並且在紅軍戰士中也引起了不可磨滅的印象。許多鐵石鍛鍊的戰士，在這種莊嚴奮發的景況之下，都爲之落淚，並立地發出誓言，謂如不能保障這些兒童的將來，鬪爭絕不停止。

在這種情況下，對敵人工作，亦可充分發展起來。向敵軍內傳播書冊，可用各種方法；經過我們偵察，經過砲兵（鼓動砲彈），經過地方居民，經過與敵人所佔領之隣近村落的羣衆聯繫，及經過飛機等。當戰線上續久沉寂時，我們部隊并非不能直接與敵人談話，有時甚至可舉行聯歡。聯歡，祇可組織政治工作員最切實的領導之下，及政治部底訓令和允許的條件下，因爲聯歡有時可遇到雙方底鋒刃；如我們部隊在政治上不充分覺悟，而同時敵人部隊卻有良好而且堅固的組織，聯歡不能確實影響敵人，而反可致瓦解我們

部隊。在敵人中間的工作，應具體地適應敵人部隊的社會成份、民族成份及其政治成份。有時爲在敵人中進行工作，最重要是利用敵人國內政治生活中的某件事件——敵軍司令者及敵國印刷機關所極力掩飾的可起革命化之作用的事件。某個大罷工，或甚至某地域底武裝暴動，對於敵人底精神狀態，均可起很大的影響，假使敵人部隊中有該地域的兵士在內。在另一方面，敵人亦會企圖在我們部隊中進行其政治工作，散播其書冊等。當蘇俄與波蘭戰爭時，波蘭人在散播書冊的方法上，其靈巧不減於我們政治部。例如，波蘭人曾對我們部隊每個都拋擲了萬千捲煙紙本，在這種紙本上，寫有口號，短詩，勸告等。因爲我們紅軍戰士非常需要捲煙紙，所以他們便到處找尋這些傳單而且爭相檢取。不錯，鼓動底內容，對於紅軍戰士所起的作用極少，然而並不是沒有任何影響，特別是在有煽動份一及敵人外細活動的我們部隊內。在反抗敵人之鼓動與宣傳的工作上，政治部底任務，其重點不祇在於消滅敵人的印刷品，而在於精巧的反鼓動，在於利用敵人每個錯誤來反對敵人本身。例如，我們往往利用白黨節尼金底報紙——在這種報紙中，常

有證據我們紅軍之最荒謬妄誕的謠言，——以便拿敵人底這種極無聊的墨水色彩來形容敵人底狀況。這時最好是特別舉出紅軍戰士所明知其屬於虛偽的事實。例如，當第四五師駐守於五滿城時（這時內戰已結束），給紅軍讀了許多別特六洛夫底報紙，其中登載許多關於烏克蘭各地底暴動，並非常詳細地描寫五滿本城內的暴動事實，這種暴動，當然是不會有過的。白軍報紙底這種新聞，引起了紅軍戰士不可形容的狂笑與高興。

至關於當紅軍兵士直接處於戰壕內，像在帝國主義戰爭中之持久的陣地戰那樣，則工作形式，一般說來，是與上述的場合完全相類似的。所不同的，就是紅軍戰士不在村落內，而在穩藏所內，所以政治工作亦應集中於此。若是在帝國主義戰爭時，往往甚至會進行軍事教育於敵人砲兵直接射擊的地帶下，則在不遭敵眼的適當隱蔽地內，（樹林原野，丘陵後等）更可進行政治工作。這時，這種可能比較在較為深遠的預備隊內更要大些。在陣地戰中，祇有不的一部份軍隊處於第一線戰壕內，處於直接的戰鬥位置內。至於營預備隊，團預備隊等，則逐次與敵人相距較遠，危險亦愈較少。在一九一七年二月

革命後，在師屬預備隊及砲兵陣地內，政治工作會盡量進行，直至組織很大的羣衆會及組織廣大的文化教育工作。無任何根據來說，紅軍底政治人員不能在紅軍中發展很大的工作，以提高其政治覺悟。這裏更可進行黨的經常工作，黨的研究組的工作，在指揮人員中的政治工作，適當進行政治課，以及其他各種各式的鼓勵宣傳工作與政治組織工作。

第九章 騎兵抄襲時的政治工作

布立馬高夫同志在他的文章騎兵的抄襲與政治工作（見一九二三年出版的軍事思想與革命雜誌第三冊）內，指出騎兵抄襲的主要特點如下：（一）運動迅速；（二）敵人戰鬪短促而且差不多無間斷；（三）與自己軍隊沒有通信連絡，須有廣大的機斷專行；（四）必須就食於敵人或居民；（五）騎兵底神經與肉體非常緊張。

自然，政治工作的進行，亦應適合此種條件。

開始先說作戰底政治準備。布立馬高夫同志說得很對：『抄襲底勝利，多係於衝入的突然，要達到突然，須保守抄襲底秘密。關於出發抄襲底命令，首先僅於最後一分鐘宣佈之。抄襲底目的，通常並不發表。因此無論任何的鼓動運動，要專門施行於抄襲任務底周圍，都是不可能的。』然而布立馬高夫同志僅拿在隊列前宣讀關於政治方面的命令

及抄襲底口號來限制一切政治工作的可能，則是不正確的。『在某集場所內，講說關於抄襲底事項，發起鼓動運動——不適宜而且有害，』這無論何時，都是對的。完全不錯，在抄襲周圍的專門鼓動運動，往往將只限於紅色哥薩克第八師通常所運用的一切方法：『當抄襲發送一時，紅色哥薩克第八師僅於在隊列前宣讀所下之關於抄襲底命令的那一天，始知道一切。在命令內，給烏克蘭的哥薩克人一個口號：還我烏克蘭。』

這種準備工作，首先可充分地秘密進行，由騎兵抄襲首長自己計劃暗中進行供給彈藥，檢查馬匹的狀態，分撥抄襲部隊等方面的準備。政治機關，應仿照此種作戰準備，來從自己方面以黨員加強抄襲部隊，準備行將抄襲之地域的政治經濟材料，準備必要技術器具（例如輕便印刷機），檢查支隊內的全體政治人員，清出不可靠的份子等。很明顯地，這一切工作，自應非常秘密進行之。這並不難做到，祇須將所採取的一切方案，用其他目的隱蔽之，例如，加強共產黨員的原因，解釋做政治工作的缺陷。研究抄襲支隊應經過的地域，須用極秘密的形式進行，發給以很大的——大於抄襲支隊所將動作的地域，

令其研究之，而對於研究行將抄襲之地域的人數，則加以限制。例如，當分撥騎兵師施行抄襲時，除師長外，師政治部主任（或師政治委員，並應明悉當前的作戰，使他能獨立地並單獨地給自己準備一切必要的材料，並對這些材料加以研究。這種研究動作地域，實際說來，在為正確建立對居民工作的目的上，實有很大的意義。

此外，事前的準備（不是突擊式的，而是有系統的準備），隨着這新增的共產黨員，不但可以而且應當加強進行，正如政治部主任所編制之政治工作計劃的本身相同，並須適應這一切條件。當然，根本的要求——抄襲的祕密，——自應嚴格遵守之。

一至派遣部隊出發抄襲時，正是相反，在抄襲周圍的廣大鼓動宣傳工作，却應立刻獲得緊張的性質。政治工作人員不揭破抄襲的任務及其行程，而可以並應當從出發後的第一天，即與一般任務（遵守紀律，與各自供給鬭爭，與居民設立相互關係）及一般口號的周圍，進行大的訓育工作。

抄襲時的一切政治工作，即應以這些根本問題為基礎，政治工作第一個最重要的

任務，就是扶助紀律到應有的高度上。當抄襲之際，「差不多不受懲罰而有掠奪的可能及情況的特殊，常可洗除已為訓育所栽培的覺悟。」（布立馬高夫——同上。）所以「騎兵應預先練出特別嚴明的紀律，並於抄襲的過程中，不應出乎指揮員的鐵的掌握及政治工作員精密的眼睛之外。」維持紀律的方法，應不相同，始於鼓動工作，終於就地槍決。「抄襲時的紀律，應用全力維持之，不惜施用最嚴的處置。抄襲的特殊情況，要求特殊的手段。當一九二〇年紅色哥薩克第八師抄襲斯大勒的時候，有一個團內的連長（從前參謀處內之騎兵上尉）強姦了婦女。當日晚上，便由師長的命令槍決於連的隊列前。這一槍決，提高了全師的紀律。」——布立馬高夫同志並且補充的十分正確，——「然以少用此種手段的事實為佳。最好平時對於騎兵加強其相當的訓育，免於戰時在火力下訓育他。」在這上面，必須補充一點，就是說，平時有訓育不止可預防施用這種處置，並且在戰鬪情況中直接進行的加强的政治工作，不僅是祇限於在紅軍戰士間，而應同樣進於指揮人員間。這後一工作，國內戰爭時，在我們騎兵部隊內，往往有許多缺陷；出

身游擊隊的騎兵指揮員，常多藐視政治機關。所以當抄襲時必在全體政治委員身上放着任務，不倦地觀察與注意紀律問題，並與一切破壞紀律作戰爭，不問這種破壞出自某一方面。整個紅軍如能覺悟到抄襲時有加強監督的必要，如能明白政治機關在這一工作中的作用，則大可減輕工作本身的進行。

與保持紀律有密切關係的，就是關於供給抄襲部隊的問題。布立馬高夫同志說：「除罐頭與些須馬料外，抄襲的騎兵不能攜帶任何東西，食糧底主要重心，須由居民担負之。運動底迅速，休息底短促，幾乎沒有整理供給的可能。有時騎兵在抄襲中就食於敵人，然主要的，仍是就食於農民。徵集糧食與蓆褥，於短促休息時，由兵士自己或諸排長施行之。當較長休息時，徵集得由騎連特務長施行，由團經濟主任施行的機會極少。政治工作人員底任務，在於不使騎兵有胡亂行為，不使其在收取食糧與蓆褥的旗幟下而強取居民底其他任何東西。為適應這一問題，布立馬高夫同志要求在派遣抄襲部隊時須記着隨身攜帶必須的金錢數量，以便償付居民，並須關心組織團底經濟機關，要給

團經濟機關以獨立施行準備供給的權限，且該機關底組織須簡單到最低限制。所在這種問題上必須集中政治機關的注意力與監督。

除各自供給鬥爭，首由經濟機關的適當組織進行之。在這一工作上政治機關俱有何等意義。我們上面已說了，像第五八師一旅被圍困時用農民部組織一切供給事宜，騎兵師政治機關，在抄襲時，亦可與地方居民設立正確的相互關係而遂行相當的供給工作。我們的意見，騎兵部隊中的政治指導員的政治行政權限，應大於通常行軍部隊中的政治指導員。其權限應與不大的獨立海軍兵艦的政治指導員相等，這獨立小兵艦的政治指導員當本艦獨立抄襲時有時可獲得政治委員的權限。提出這點，我們現在計算，在最近數年內，未必能夠真正挑選全體在政治上都受過充分訓練及教育的指揮人員，總之依統計的數字看來，在最後四年內，黨員進入指揮學校的百分數的減低，告訴我們相反的傾向。所以，務須一般特別注意在騎兵部隊內挑選政治指導員，而尤其是在抄襲部隊內。

「同時在政治工作人員肩負，更放着艱難的工作——與佔據敵人糧秣及倉庫機關的工作。最可誘惑及抄襲瓦解騎兵的一種東西，恰是這些糧秣，倉庫，供給機關，輜重——總之，凡是紅軍戰士稱做「爛物」的。許多物件，武裝，服裝等，由敵人手中奪來，常被騎兵亂爭亂拿，往往無論是政治指導員底語言或排長的底手槍都禁不住搶奪。一處被禁止了，另一處又發現了。戰鬪後往往有許多騎兵到處去找尋貴重的「爛物」，完全禁止這種「抄爛物」的行動，非常困難，因為人人都知道，奪來的財物，終須消滅的。」政治工作人員與指揮員底任務，在限制騎兵不得個人去「抄爛物」，組織警衛與分配奪來的東西，如此最好用一人作衛兵，比放縱全排去尋戰利品好得多。」布立馬高夫同志這樣地判定了這種「抄爛物」底意義及因此而推演出的任務。不過他沒有估計到與這種現象鬪爭的一切可能。與搶奪鬪爭的最好保障，就是堅強而富於戰鬪質量的共產黨員集團。「抄爛物」並不祇是騎兵特有的現象，在步兵中，與這種現象的鬪爭，也不祇是一次。凡是有強大的突擊的黨員集團的地方，「抄爛物」統被整個消滅了。反過來說，在步

兵部隊中，如黨員的覺悟程度，並不十分高出於普通紅軍戰士，如黨員不但不能成爲紅軍戰士羣衆的領導者，而且反受羣衆的一般影響，如黨員了解其與紅軍戰士的相互關係不正確，如「弟兄」的習氣與一般游擊的習氣尙未完全剷除，——卽在這種步兵部隊內，與「抄爛物」鬭爭，亦常不是容易的事情。由是可知堅固設置的黨的工作，對黨的工作不倦地注意，無論如何在不拘任何情況中整理這種黨的內部工作等事實，爲何是鞏固紀律及與最可破壞紀律的「抄爛物」鬭爭底主要工具。

然而政治工作的任務，並不祇限於上述的兩種任務而已。政治工作人員應盡量扶助與發展紅軍戰士底政治覺悟，於紅軍之基本任務周圍進行不倦地宣傳與鼓動（例如解釋游擊性的害處等），不倦地宣揚國際政治事件及蘇維埃政權底策略，解釋對地方，居民須有正確態度的必要——這一切都爲着要直接提高紅軍戰士底政治覺悟與擴大其政治眼光，並經過這點來鞏固紅軍戰士底精神與紀律，最後，像在各種戰鬥中一樣，在騎兵抄襲中，亦應不斷地訓育紅軍戰士，使對敵人保持正確的態度。

至關於抄襲時的政工機關，則其與一切步兵部隊底政工機關相同；基本的工作，首先須由隊列黨員政治戰士擔任之。政治戰士首應作為模範騎兵，善騎，善戰，並無條件地應為有堅決與有覺悟的黨的同志。其次，重大的責任，須由騎兵連政治指導員擔負之。所以對政治指導員，應特別精細地加以挑選，並對其權限應加以擴大。其次，在團政治機關身上，放着部隊內一切工作的直接領導。最後，支隊須有一不大而活動的政治部做首領。對於整個政工機關的基本要求，在於使他須有與整個騎兵部隊同樣的靈動。所以政治部不應隨帶任務過重的東西，以致妨害其運動，他應該不要太大而能完全馱於馬背上。圖書館底物件及一切文化教育設備，應極加以限制，並須於必要時，俾可馱於馬背。

過去國內戰爭時，在騎兵部隊內，非常認真要求政治工作人員須善於騎馬與施行刀法，往往不甚注意其純粹的一般的品質。此種錯誤，在將來革命戰爭中，絕對不應重複。達到這一目的，第一條件，要在各部隊內形成對政治指導員之品質的黨的一般正確公論。要使政治部的組織，及紅軍戰士自己底意見來要求政治工作人員不僅須善於騎馬，

善於用刀，並應當俱有相當的政治訓練及黨的堅定。

政治工作形式在騎兵抄襲時較之步兵行軍時，更應多俱彈性。布立馬高夫同志在這種關係上，並未充分估計到其他部隊底經驗，他說：『政治工作，在抄襲本身中，祇可枝葉地進行，主要於隊部列前宣讀命令，或在抄襲中印刷傳單。』但是接着他又反駁自己而補充說道：『唯一可進行工作的人，就是各騎兵連底政治指導員及政治戰士，他們是與騎兵過着同樣的生活，與戰士共同前去放哨，偵察，並且在一個地方休息。高級政治工作人員對他們應加訓示，供給他們以傳單及報紙。在他們肩上放着很大的工作，他們應為一切騎兵底模範。』在這中間，騎兵抄襲時的政治工作，與通常步兵行軍時的政治工作，還沒有什麼分別。在步兵部隊行軍時，主要的機關，當然也是政治戰士與連政治指導員，即在這時，廣衆的鼓動工作的可能，如組織大會等，也是非常有限的。我們在這種情況中並且也介紹這種工作形式。但政治戰士與騎兵連政治指導員進行工作，不但是只限於在隊列前宣讀命令，而主要是在行軍時之各種可能下，不斷進行有系統的談話。團

政治機關工作的重心，也就是不斷地訓示政治戰士與政治指導員以此種工作。無論是在騎兵或步兵中，政治委員都沒有須在全團大會上發言的必要。政委底主要任務，在領導政治指導員與政治戰士，使其直接在紅軍戰士中進行工作，此種工作形式，是通常行軍與戰鬥時所施用的個人談話，集團談話，唱歌，口號，講故事，趣言，而於沉寂及休息時，則用行軍時所通用的各種消遣方法。（遊戲）

訓示一切政治戰士的特別重要方法，自然是黨會，黨會應「經常」舉行之，不問情況是如何困難。當然，黨會按騎兵連舉行，較為適宜。全團底黨會，最好舉行於抄襲前夕及緊接着抄襲完結後：

抄襲完結後，政治工作的任務是消除在抄襲過程中所發現的一切缺點。這裏，工作的性質，與在步兵部隊內經過種種不斷的移動與戰鬥後，配置休息時相同。首先必須重新「挑選」部隊，整頓紀律，從部隊內逐出腐化的騎兵，將違犯各種罪過的提交法庭。在這種工作的周圍，應進行廣大的鼓動工作。布立馬高夫同志舉出這樣的一個例子：「當

紅色哥薩克第八師抄襲立臥埠（在古爾斯克下方）時，第三輕騎團搶劫了該城。抄襲後該團即行整隊於拉克特，經過一番訓話後，二十六名騎兵立刻被解往革命軍事裁判所，並給全團宣佈此種辦法，將於此後每次抄襲完結時施行之。嗣後數日內經過強大的政治工作後，該團遂改過自新，不再有搗蛋行為。」

很明顯地，這種在抄襲完結後的清洗及懲罰罪犯者，並不妨害在抄襲本身進程中之必要的清洗。相反，在抄襲整個進程中，此種政治工作，不倦地督察與清洗，應無間斷地進行之。祇有在特殊場合，像布立馬高夫同志所說的事實，全團投入搶劫，在指揮員及政委底掌握，顯見得不會剩有任何可靠的突擊的集團，只有在這種場合，不得不拒絕當地直接施行清洗及懲罰罪犯。在這種關係上，東方戰綫底許多部隊是作得很對，他們為與這種現象鬭爭，曾組織了專門的共產十人團。

抄襲完結後，尚要進行更大範圍的工作，正應在這時舉行各種師底會議，師內黨的代表大會，政治委員會，各支部書記會議等等。在這些會議上，應解決以下的問題，第一，

與已完結之抄襲有關的問題（估計部隊政治人員底行爲，所發現的缺點，政治底不覺悟等）其次，研究目下的國際事件，蘇維埃底策略，並定出嗣後的工作計劃。在這時期內，並須舉行小組的宣傳工作及在指揮人員間的工作。總之，工作性質改換了，發生了各種廣大的文化工作及各種消遣的可能，一面可發展紅軍戰士底政治發育，一面可給紅軍戰士以有趣的休息。

在居民中工作的正確，對於抄襲的騎兵部隊，實有很大的意義。這裏的任務，在與其他一切部隊內是一樣的，就是使每個騎兵成爲蘇維埃政權底鼓動員，使在居民中進行政治工作，一面嚴守正確的行爲，一面與居民進行談話。爲此，必須利用每次在村落中的駐止機會及其各種可能。布立馬高夫同志指示的很對，他說：『這可於經過村落運動時，以露天大會的方式舉行之。趁着整個縱隊通過村落之際，鼓動員可完結自己底任務。』布立馬高夫同志向下提議說：『在團參謀處內，最好是設置特別鼓動員，使與翼側騎兵偵察組運動，則在騎兵抄襲本隊底左右十餘地內，均可進行工作。此外，他們又提議說：

「在騎兵首長的參謀處內，須有一排騎兵鼓動員。」這裏祇是所說的鼓動員的位置，不對；不是在騎兵參謀處內，而是在騎兵政治部內。應組織所謂農民集團，為在地方居民中工作的集團，其與步兵師內之農民集團所不同的地方，就是他應把一切歇於馬上。這些專門的政治工作人員在居民中所進行的政治工作，是用各種極不相同的方法，像我們前面所說的一樣，開始於個人鼓動及組織大會，終於相當的事務；進行階級政策於該村落內，例如，從經濟中發給貧農以穀物及家畜，在車站上給貧農以運貨的便利。布立馬高夫同志舉了一個例子：「當紅色哥薩克第八師抄襲斯特勒時，於佔據河道陸鎮（哈立側牙國）後，曾發給居民三百餘頭畜牲（波蘭第六集團軍的畜牲所）組織羣衆大會，發給附近經濟機關的存糧，並組織警衛奪來的乘客火車。」

在抄襲時組織革命委員會，不是常能作到的。必須記着，騎兵並不駐止於一處，如於其所經過的地域內組織革命委員會，則經極短的時間，敵人重新轉回後，地方上黨員的公開，徒可揭露其祕密。所以與地方祕密黨部的連繫，應特別謹慎。組織革命委員會，祇有

當抄襲連帶着地方暴動性時，才有可能，因為這時可於較久時間內，使該地域脫離敵人，但革命委員會則應首先從事於純粹的戰鬪任務。

在居民中組織暴動，對於抄襲的騎兵，得為基本任務之一。布立馬高夫同志指示得十分正確：『將來革命戰爭時，關於抄襲敵人後方而達到組織或扶助暴動的問題，將列於議事日程上，這是毫無疑義的。』這種暴動可能的先決條件，是要有強大的革命組織，事前廣大的政治工作，及相當準備的基礎。在這種場合，騎兵的抄襲，實可及暴動本身以極大的影響。在其餘一切場合，組織暴動是非常困難的事情。布立馬高夫同志對於這點說得完全正確：『騎兵將是突擊的羣衆，暴動的核心。但是，派遣騎兵去完成此種抄襲時，必須記着，應派受過特殊訓練的，非常遵守紀律的騎兵。暴動的支隊將以騎兵為標準。』自然，須從騎兵支隊內，分出人來充任暴動支隊的首長，並付之以不大的騎兵幹部來做暴動支隊的中堅，同時並須從騎兵內分出一切政治人員及政治委員，於暴動支隊內，加入充分數量的隊列黨員，尤屬重要。準備暴動，要求須有預先的廣大政治工作，這一工作，

自然，首先並且主要的是要由地方革命組織擔負的。騎兵政治部的任務，在於用一切工具（一面用人力，一面用技術力量）來幫助地方革命組織。

抄襲支隊在敵人中的工作，俱有若干特殊情形：第一，支隊在敵人後方移動迅速，可使我們在敵人後方到處撒播自己底書冊，傳單，宣言，報紙，掛圖等。這裏必須利用一切可能。布立馬高夫同志說：『傳單，報紙，掛圖等不僅應只沿着騎兵進行的道路散播，並應經過各個偵察組散播於其所運動底一切地帶內。在翼側偵察組幫助之下，我們底出版物可散播得非常遠，可達於廣大的居民羣衆。』此外，他介紹：『個別的偵察組，如能在地主房屋底牆上，教堂及廟宇的圍牆上，用石灰或顏料塗寫我們底口號，則甚為有利。這種圍牆上的印刷品，會長久地影響居民。』在這上面祇補充一點，就是說這種工作，其目的將不僅是為的居民，並為影響敵人。

其次，對於俘虜的工作，亦有特別重要的意義：『騎兵不能隨帶俘虜，俘虜可阻礙兵底運動速度。騎兵或應拒絕收取俘虜，或應在其發誓不再與我們作戰的條件下

之所以布立馬高夫同志介紹：『當抄襲時所擒獲的俘虜，在經過相當的大會後，應供給之以宣傳品，並在其不作戰的誓言下釋放之。這可使敵軍受到瓦解的影響，可增加敵軍底逃亡，使每個逃亡者可辯白說：『我被俘虜去，並在我底真實話「不作戰」下被釋放了。』』

『當紅色哥薩克師抄襲斯特勒時，在何道陸及米高拉附近曾拿獲俘虜五百餘名。在大會後，他們被撥至我們小哨後面的大森林內，天將黎明便釋放了。』經過一星期後，但見波蘭底逃兵，羣集於森林附近。

第十章 預備隊駐止時的政治工作

我們這裏所說的預備隊，是分出的整個部隊、團及師。這種預備隊，是全局作戰工作所不變更的一部份。通常派為預備隊的部隊，或為準備新的突擊，或為恢復原力。

駐止於預備隊內，因其任務關係，要求須進行最緊張的工作，而部隊所處的條件——駐止為預備隊，通常可給政治工作以極大的可能。

整個軍隊機關底第一任務，在整頓供給與組織部隊，整頓紀律與秩序。政治機關，在這種工作上幫助指揮人員，注意紅軍政治建設最重要的問題或與紅軍政治建設有直接關係的問題，例如，挑選指揮人員，及軍事組織工作等。

通常須利用預備隊底駐止時期來施行軍事教育。這時應編入補充戰士，對之要有補充的工作。其次，戰爭進程底經驗，常指出在此一或彼一部隊內，在軍事訓練方面所發

現的缺點；最後，戰爭當中，無論是我方或敵方，常可採用新的技術兵器及新的戰鬥方式。所有這些，即將成爲軍事教育底內容。

預備隊駐止時之重要工作的一部份，就是收編與改造，補充戰士。這裏的任務，開始就是通常的歡迎，在久經戰鬥鍛鍊的舊有紅軍戰士與新到的補充兵士間設立正確的同志關係，及逐漸教練補充戰士習慣戰鬥情況。

新來的補充戰士，須正確地分配於戰鬥部隊內，使其在戰鬥部隊內實地學習軍事，並於初到時，使處於有經驗的同志底監察下。其次，對於新到的補充戰士，須有單獨的政治工作計劃。這裏工作的方法與任務，當然是與在舊的，曾經受過砲彈轟擊的紅軍戰士間的政治工作，是不相同的。具體說來，黨機關底特別注意力，須集中於對紅軍戰士進行個人的改造方面。

在政治組織工作方面，預備隊駐止時的基本任務在於整理一切組織，鞏固這些組織，挑選其中工作人員，並訓示與訓練這些工作人員。

在黨內的工作方面，必須利用這個時期來認識黨的一切重要訓令，黨代表大會底一切決議案，（各支部在戰鬪情況中對於這些是不免落後的，）討論部隊中所發生的黨的問題，檢查黨的完全人員，進行複雜的在組織上的運動。這種組織任務例如清黨，檢查非無產階級底人員等，當然，只有駐止於預備隊內或當戰綫上較久平靜時，才可順利進行。

黨內宣傳教育工作，應獲得很大的發展，黨的各種研究組及短期訓練班等，應以其工作足補黨會底工作，填補每個同志在黨教育方面所有的空白。

在鼓動宣傳工作方面，鼓動可稍微縮小之，而宣傳則得增高到與鼓動相等的位置。這裏一面包含的是對紅軍戰士的軍事宣傳問題，一面是對指揮人員的軍事科學工作，其目的在補足指揮人員在戰鬪情況中所發現的一些缺點，及研究新的戰鬪方式。

當駐止於預備隊內時，須恢復經常的政治教育——經常的政治課。其課程計劃是通常所用的：以政治條令（紅軍必讀）為基礎，加以目前的鼓動問題，國際政策，戰綫底

情況，蘇維埃底方案。

當駐止於預備隊內時，掃除文盲工作盡可進行。所以政治部須預備有相當的教員及應用的教科書籍，以之按時供給開往駐止的預備隊。

有紅角或列甯室（當配置於營房內時）周圍的初步工作，及各種各式的俱樂部底羣衆工作，直至極複雜的各種研究組爲止，應於野營或營房，按照通常的工作方法發展起來，直與平時差不多一樣進行。祇須要求一切工作的最大速度及按時發展較爲複雜的設施。例如俱樂部一開知部隊將轉爲預備隊時，應即按時偕同部隊設營人員派遣自己代表前去尋找房屋以組織俱樂部。這樣，當部隊底先頭縱隊開抵自己配置爲預備隊地點時，俱樂部已應準備妥帖，並開始其工作。其餘一切政治教育機關，並應同樣做去。

在另一方面，如於必要時機，須移置這一切政治教育機關，則應作得非常迅速與清楚。像紅軍兵士對其步槍負責一樣，各種政治教育工作人員，應對託付其所管理的一切政治教育器具負責。

當駐止於預備隊內時，並可組織紅軍戰士底各種廣大的代表會，訓話會等。祇有在這時期，方可順利進行。

件。供給各種印刷品，一直到供給宣傳書籍爲止，實是建立良好的政治工作的重要條件。

第十一章 補充部隊內的政治工作

補充部隊內的政治工作，與出征部隊內的工作，大有區別。補充部隊最主要的任務，是對紅軍戰士的軍事、政治教育及訓練，與在最短時期內組織整個的紅軍部隊。工作的環境，與營房內的工作情形相似，然而其間終有很大的區別，第一，教育底時期無定；第二，組織底本身無定；（常以獨立的行軍連代替應派出的團。）第三，這裏一切訓練差不多都進行於戰爭進程底影響之下。

這樣，在補充部隊內政治工作的基本特性如下：（一）在部隊政治教育及訓練計劃內，祇應列入最重要的與最必須的，因為須預計到紅軍戰士每星期都有開往戰線的可能。因此計劃須有非常的彈性。要先研究最重要的任務，留次要的任務於第二計劃內。計劃在這方面，亦應有彈性，就是說，要於不拘何時停止工作後，不至使部隊底政治狀態

受到很大的影響，計劃按可能程度應是集中式；（二）在補充部隊內，對紅軍戰士的工作，應從第一字母着手，因為紅軍戰士通常是從集合點來到補充部隊的。所以，一切政治教育，應適合於像對方才動員來的紅軍戰士的工作。在最短時期內，必須訓練紅軍戰士，使有軍人的基本質量。所以工作的開始，應從最簡單的元素，及最簡單的任務着手，然後循序漸進到較為重大而複雜的問題；（三）必須與戰線上的一切步，相密切連繫。紅軍戰士每分鐘都應知道戰線底位置，關心戰線底情況，留意戰線上所發生的每種事件，總之，過着對戰線發生興趣的生活；（四）工作不但應連繫一般的戰線，並應連繫該補充部隊準備加入戰線。須使政治機關與紅軍戰士經常地參加關於該戰線底一切問題，研究其配置的地域，該地域底居民，蘇維埃政權對該地域的政策，及其他等。

最後應特別提出的，就是在補充部隊內，政治工作的重心，須移至連底政治機關內。連政治機關底作用，在這裏是比尋常部隊大些，因為行軍連得獨立地開赴戰線去。在補充部隊內的期限，是各連各不相同的，正如其補充的時間不同一樣。所以連政治機關，在

這裏應比一般部隊較為獨立與堅固。工作計劃，往往須按連分別採用之。

在補充部隊內，政治工作的基本任務，是由補充部隊特點推演出來的。政治機關第一重要任務，是訓練紅軍戰士對紅軍的正確關係，訓練其對紅軍的親愛，發展其對軍事及武器的興趣。與這一任務併立的，就是以前的任務：發展紅軍戰士在國際政策方面的政治覺悟，解釋戰爭底原因及保護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的必要。

這是兩個基本任務。為發展與補充這兩種任務，除此而外尚須：

- (三) 使認識紅軍底建設，紀律，野戰條令及軍事教育底意義。
- (四) 訓練紅軍兵士使加意保重其武器，服裝，及國家底一般物件。
- (五) 使認識蘇維埃底主要方案。
- (六) 研究敵人。
- (七) 衛生訓育。

補充部隊底政治機關，與戰鬪部隊底政治機關，在根本上相同。不過在補充部隊內，

有些工作部門，其範圍比較大些，所以要求須有較多數量的工作人員（例如掃除文盲）。此外，須使政治機關能夠適應補充部隊內之人員往來不息的條件，及戰線上的意外要求，因此身傍時常須有相當的後備政治工作人員，俾可自由地分配，而不使補充部隊底政治工作受到損害。

補充部隊內工作，可分三個基本時機：（一）被動員者底到來，（二）對其政治、軍事底教育與訓練，（三）被動員者底派遣。

對被動員者到來的歡迎及對被動員者最初即取正確的關係，在補充部隊底整個政治工作上，實有莫大的意義。直接離開犁把前來的紅軍戰士，不免被從其動員以來所接觸的種種新的印象所震駭。所以無疑地，一開始，他會喪失其若干的平衡。對於新到部隊之紅軍戰士所取的方針，同時並應充分地強硬，以便立刻置他於一般的責任心，服從性，紀律底管理下，同時並要注意到戰時的嚴格要求，不至忽然完全震攝紅軍戰士。所以無論軍事管理與政治工作，都須循漸進地加強起來。

首先須使紅軍兵士一到補充部隊內，覺得自己是到了同志的家庭的狀況內，而不是到了生疏的地方。必須最堅決地來與一切「瞧不起」新戰士「過勞」新戰士或嘲笑新戰士的舊紅軍鬪爭。一開始就應使新戰士覺得指揮人員，政治人員，及一切社會政治組織對自己的注意與關心。必須立刻在才來的新戰士與舊紅軍戰士間，設立正確的同志關係。當然，工作的開始，是通常的歡迎，慶祝，各支部底同志會議，晚會等。即使在開始時，「慶祝」的空氣有些過高，這也算不得什麼壞處。他反可使紅軍戰士覺到對於自己的注意，可在他自己底眼中提高自己，在其餘的人民前覺到自己所負的責任，並發展其對於公民義務的認識。耗費許多時間來做慶祝，當然是無須要的。第二天紅軍戰士即須逐漸着手日常繁重的軍事政治學理。這裏須慢慢地來。一下子給紅軍戰士以整日的工作時間。應於開始時給他一種可能，使他能蘇醒過來，熟悉新的環境，認識新的同志，習慣其初時有點束縛的軍紀。然而對紅軍戰士之一切行為最低限度的要求，應從一開始就樹立起來。要使他立刻習慣部隊底一般秩序，習慣整潔，準確，服從，紀律。但初時的工作

重心，則在解釋這種軍隊秩序底每個細則的必要，祇有漸漸隨着鼓動宣傳工作的進展，才可增高這一般的要求，並定出各種懲罰的辦法。例如，營房內保有一定的衛生秩序。紅軍戰士不習慣這個，會時時破壞這種秩序；不是睡到地板上，就是在不可吸煙的地方吸煙，來了，往地板上拋些髒東西等。這種事實，一一應加以指示，說明其行爲的不對，然而立刻定出懲罰來，却是錯誤的。同時不應長久祇限於指示與解釋。當每個紅軍戰士都被警告後，並開始明白軍隊秩序之一切細則的意義後，便須逐漸定出破壞這些秩序的各种懲罰。

所以開始之初，不應只限於狹義的政治工作，並須施以廣大的訓育工作。這裏須利用我們政治工作員所知道的一切方法，從對每個紅軍戰士在政治課內，連會上，紅室內的個人談話，從口號及掛圖，從組織俱有訓育目的的各種羣衆工作（對爛髒戰士舉行政治審判口報等）起，直至施行清潔的競賽，射擊競賽等止，必須充分地利用各種獎勵及比賽的方法——在命令內致謝，在紅牌上題名，在口報內敘述，在牆報上登載，在

全連隊列前勳譽，及各種的獎賞。從最簡單的獎賞：火材，香煙，書本等開始。

這種教育工作逐漸地擴大與深入，便進至訓育紅軍戰士之純粹的戰鬪品質：勇敢，克己耐勞等。當然，要真正鍛鍊這一切品質，祇有直接在戰鬪情況中方可獲得。軍事教育與政治教育的任務，則是造成在戰線上直接鍛鍊之順利的必要先決條件。

在政治行政工作方面，政治機關底任務，是在關於供給，及組織軍事教育的一切問題上，對指揮員加以幫助。政治機關，在組織軍隊及正確按連分配紅軍戰士的問題上，須加以特別注意。被動員者集團來到部隊後，須即刻先來重新檢查其階級地位，如在紅軍兵士中查出無權在紅軍內服務的份子時，則以相當的手續派往後方軍備去。

自被動員者來到補充部隊之初，首先須開始考察紅軍戰士。每個擔任軍事教育的指揮員，每個擔任在政治上訓育紅軍戰士的政治工作員，應熟悉各該紅軍戰士如下：

(一) 其對從軍義務的關係，就是說，他或是被動員來的，或是自願來的，或是從游擊隊裏來的；(二) 其階級狀態：工人，手工業者，雇農，貧農，中農；(三) 其民族；(四) 原籍，其

故鄉底政治經濟狀態；（五）其對家庭的相互關係；（六）其在政治上的已往。他自己或是他父親，曾否參加過某種革命事件，蘇維埃政權建設，及職工運動等？明察紅軍戰士底面目，須進行於其在補充部隊內之整個時期內，要使當教育完結時，一切指揮員及政治工作人員能夠知道每個紅軍戰士底心腑，知道他底能力，可對他要求些什麼，他能作些什麼。

在黨的工作方面，每個新成立的連，必須組織連底支部，加入相當數量的黨員。補充部隊內，連底支部，應特別堅固與有組織。照規則說來，不應當行使黨員由這一連轉入別一連，而應指定其於固定的軍連內，使留置到底，並與行軍連同派赴戰線，因為紅軍戰士對於這個將來與自己在戰線上共患難的黨員，必很細心聽從的。

連支部底堅固組織的必要，自然不是說就不應組織補充部隊全體黨員大會，特別是當討論一般的政治問題，政治機關有可能請得很好的報告人的時候。然這種全體大會絕不應經常舉行，而只可間或組織之。連底集體會則相反，應為基本的黨會。各連支部

委員底任務，在善於實施領導各連支部的彈性形式，與各連支部密切連繫，熟悉各個支部政治情緒。

補充部隊內之黨的工作，其重要任務在訓育每個黨員底戰鬥質量。將來，我們希望一切新動員的黨員，按照規則，必須經過補充部隊。補充部隊可以對他們有訓練與教育的任務。馬克斯組及複習班，在補充部隊內，應組織完善並進行最加緊的工作。將這種工作，應加以很大的注意。各研究組底計劃，應俱有彈性，並可能地適應各個連內的特殊需要。

訓育戰鬥品質，應為支部最重要的任務之一。必須造成這種狀況，就是說，使每個黨員都認為自己應成最好的射手，最好的紅軍戰士，最好的騎馬者。

鼓動宣傳工作，適應上述的政治訓練與教育底任務進行之。計劃底基礎，我們可用紅軍必讀，先分出其中最重要的部份，而以集中式的方法進行，就是說，先來疾速地觀察全部必讀，祇研究其主要的地方，然而再重新進而詳細地研究。

在補充部隊內，政治課是工作的主要方法。但政治課底計劃，則不能祇限於政治條令或紅軍必讀，我們推想政治課底鐘點，應平均分配於宣傳問題與目下鼓動問題之間。要使與目下之具體事實有關係的訓育性質的問題，得在政治課底計劃內佔相當的反應政治課底計劃應有彈性，應給師政治部主任，團政治委員，及連政治指導員留出充分餘地。祇有一般的宣傳部份，應由高級政治部直接規定之。這樣，在補充部隊底政治課內，經常的宣傳工作應與鼓動工作相平均起來。這裏，鼓動與宣傳底對比，約與整個紅軍在動員前的時期內一樣。

在補充部隊內之鼓動宣傳工作最重要的任務，就是掃除文盲。我們應要求凡是由補充部隊派往戰綫去的紅軍戰士，個個都得識字，並使這種要求成爲一般的規則。這種最重要的任務，應以最緊張的工作進行之，俾於最短期間可獲得結果。補充部隊，對於此種工作，應以完善的方法組織之。在補充部隊內，應設立許多紅軍戰士的識字學校，並豐富地供給以各種必要的教育用具。同時，在補充部隊內，尚須有較爲原始與簡單的教育

用具，以爲準備於其他各種情況中，得以之進行工作。如在這一部隊或另一部隊內掃除文盲的工作尙未完結時，則政治工作人員，應在將來利用每個可能來結束此種工作。所以補充部隊不應祇限於在自己內部的工作，而應供給出發之行軍連以各種必要的掃除文盲的教育用具。

在每個補充部隊內，須有裝備完善的射擊室及政治工作人員室。

補充部隊內的圖書館工作，可盡量發展起來，不僅祇供給紅軍戰士底需要，且須供給指揮人員與政治人員底需要。

補充部隊底政治機關，不能祇限於在自己內部的圖書館工作，他並應供給出發之行軍連以連內所必要的圖書，這些圖書，是連在梯隊移動時，及直接在戰綫上沉寂時，都是不可少的。

在補充部隊內，應廣大的組織初步工作與俱樂部底羣衆工作。紅色列甯室，應爲每連初步工作的天然中心，他應隨着行軍連一同到戰綫去。所以組織列甯室，是補充部隊

每次成立新連的必須任務。

俱樂部底羣衆工作則相反，須集中於補充部隊底總俱樂部內，其一切物件與器具須完全不動地留於補充部隊，以便爲新動員來的紅軍戰士而工作。這種工作的分配，——分配永久停留於補充部隊內的工作與不斷地離開補充部隊的工作，應於最初就正確地分配出來。

在政治行政工作方面，政治機關底第一任務，就是行軍連內適當挑選政治指導員與組織堅固而密結的黨員集團。

在補充部隊內最後的一段工作，是從接到開往戰線之命令的時候起。通常從接到此項命令，其距出發日，尚須經過數天之久。在這幾天內的工作，應完全適應當前的出發工作計劃，應告一結束，一切注意力，須集中到與開往戰線有關係的直接任務方面，加強監督不可靠的紅軍戰士，因爲這時常可發現逃亡的事實，工作的中心，往往應轉到鼓勵工作方面，以便於開往戰線前，在應赴戰線之紅軍戰士中，直接造成高漲的戰鬥情緒，在

這時期，應總結過去工作結果，並進行一切關於梯隊移動的準備工作。關於在梯隊中移動時的政治工作，上面說得很詳細，這裏不再重複。

第十二章 戰線上的政治部

先來講基本的組織問題。其中的第一個問題，就是關於分立野戰政治部的問題。分立野戰政治部的問題，首先是與通信連絡問題有關係的。如師屬諸部隊與師參謀處相距甚遠，而且通信連絡諸多不便，則通常須分立野戰參謀處。在這種場合，並須分立野戰政治部。要不然的話，則通信連絡既不能改良，而分散政治機關却可削弱政治部底工作。一般說來，不應濫行分立野戰政治部，祇須於切實必要時機施行之。必須使整個的全體政治部學習彈性的工作。

至於野戰政治部底形態，這裏不可定出嚴格的形式，因為須適應每個具體的情況，第十二軍政治部在俄波戰爭時，介紹野戰政治部須有下列人員：（一）政治部主任或其候補，（二）鼓動宣傳主任或其候補，（三）組織訓示主任或其候補，（四）通報員，

兼野戰政治部書記底職責，（五）鼓勵車主任，他同時又爲書冊分發員，（六）農民工作員，他又是野戰政治部底經濟主任，騎乘的馬匹，一輛馬車，野戰筆記本，及每個政治工作員身傍的武器，——這就是野戰政治部所須要的東西。

西方面軍政治部當一九二三年會操演習時，並介紹較爲狹小的成份，就是：（一）師野戰政治部主任（師政治部主任），（二）組織主任，他又是蘇維埃部主任及師野戰政治部主任底候被，（三）鼓勵宣傳主任，（四）通報主任，他又是書記。

莫斯科軍區政治部規定野戰政治部底定額爲十人。拔吾洛夫同志認爲這種定額還不充分。如若我們注意到在會操演習時，野戰政治部所執行的是基本政治部底職務，則應同意此種意見，不過叫他做野戰政治部，就不對了。我們所說的野戰政治部，是與基本政治部同時併存的，祇是基本政治部稍爲處於後方深處而已。龐大的野戰政治部，其不能充分的靈動，是無疑意，而分立野戰政治部的整個意思，恰在要造成機關靈動與彈性。所以第十二軍政治部所定出的七人數目，應認爲是最大限度，即是西方面軍底數

字，亦很適宜。

關於野戰政治部與基本政治部間的相互關係，及關於其間工作分配的正確的問題，在其工作的順利上，實有很大的意義。

野戰政治部所領導的工作，是在戰鬪情況中要求須立刻運用的一切政治工作。在組織工作方面，有計劃的供給從中央來的一切黨員，得歸於基本政治部處理，如他與野戰政治部有充分的通信連絡。派遣黨員往部隊去的秩序，須依一般情況決定：如情況變化無定，如野戰政治部恰處於筆直的道路傍，能連結每個部隊與基本政治部，則這時派遣一切黨員，以經過野戰政治部為適宜，在其他時機中，最好直接派往各團。

在鼓勵宣傳工作方面，基本的分配如下：鼓勵工作，除出版鼓動外，歸野戰政治部，宣傳工作留於基本政治部內。

在居民中的工作，——建立新革命委員會，——由野戰政治部直接領導之；較為有機體的工作及全部後方的工作，由基本政治部領導之。

至關於相互服從的關係，則政治部主任在何處，何處即是主要的領導機關。

先來講政治部直接在戰鬥情況中的工作。我們對每個政治部與每個政治工作員的主要要求，完全沉着地執行託付給他的工作，無論這種工作有時是如何的微小，這裏不應過於激烈，不應嫌所託付的工作不充分或嫌非戰鬥工作。軍事情況往往可要求普通的技術工作員須有最大的英勇與犧牲精神。當周圍方在進行着熱烈的戰鬥之際，無疑意的，有許多忠實的戰士，不由自主地恨不得處於戰鬥底稠密所在，戰鬥底危險所在。要說明的，就是因此政治機關底經常工作在戰鬥之際常多被破壞，其口實不是說一切其他非戰鬥工作不重要，就是說屬於次要。所以我們應嚴格要求每個政治工作員須能於無論何時執行其工作，所以師政治部在戰線上，甚或於危險時機，都應完全照常繼續其工作；通報員照常收集其彙報，並督促各部隊政委底書記，使按時呈送各種報告，以便迅速於規定的時間內轉呈高級機關；組織訓示部極注意地研究情況，根據各種收得的政治彙報，根據來自戰線的同志底親口報告及自己所派出的訓示員底報告等材料周

密地視察戰線上的一切事件，對戰線薄弱地段加以必要的援助，派遣必須的充補人員，調換無用的政治工作人員，訓示沒有豐富經驗的人員，如有必要，並以身作則，指示在這種情況中應怎樣進行政治工作。所以在戰鬪日期中，師政治部與其各部隊間的通信連絡應特別綿密，因為當戰鬪之際，一切的組織與宣傳工作，多半縮小其範圍而集中於戰鬪動作的周圍。自然，政治部在不損及自己工作的限度上，可分出自己底工作人員，派往前線周圍的部隊內以鞏固之。須使師政治部底訓示員，於戰鬪時，直接偕同其所在的部隊參加於戰鬪中，以便在戰鬪中檢查該部隊之黨員底工作，使團政治機關即在戰鬪情況中亦覺到上級底監督，上級對於工作的激勵與催促。每個政治工作人員如覺到上級領導機關對自己加以相當的注意時，則其工作必更努力，因為他會覺到自己底勞動成績，不至不為勞苦羣衆所知道：「若能親愛即死亦光榮」——這個俗話，對於一切政治工作人員亦是正確的。這種「親愛」一面是部隊底支部與紅軍兵士，另一面則是共和國底一切勞苦羣衆，普通的政治工作人員與這勞苦羣衆的連繫，是經過紅軍底整個政治機關來

實現的。因此最重要的，是師政治部底一切負責政治工作人員（師政治部主任，組織部主任等）亦須按期地偕同自己部隊參加於戰鬪中。

除過改良工作的領導外，這種連絡並可很好地幫助政治部本身來觀察工作，提高政治工作到應有的高度上，並可密切地接近與連絡師內的一切黨員羣衆，形成共產的親密的戰鬪的團結，這是在紅軍中黨的工作的基本條件，這可造成並增高政治部底威信到莫大的程度。

然而諸負責的政治工作人員底參加於戰鬪中的必要，絕不應使政治部底工作停頓或減弱；政治部應照常進行其工作。所以分配師政治部底工作人員使同某團直接參加戰鬪的問題，應由師政治部主任和政治委員有計劃地有組織地進行之，顧及一切情況，並不要過於分散政治部底本身。祇有在特別場合，戰線上的艱難情況完全破壞經常的工作，這時或可使整個的政治部全體參加戰鬪，以便戰綫嚴重情況減輕若干後，重新集合於政治部內。

一般必須要求政治部底每個工作人員，即是他偶然地來到戰鬪中也吧，務必使他留到戰鬪中渡過危急時機後，再行回轉師政治部去報告他底工作，即使因此種遲留而稍為害及其所負擔的其他工作，然因此却可加高政治部底威信，滿足自己底領導，並取得政治部與各部隊間的戰鬪的同志的連絡。當然，這裏亦可發生特別的時機，他是每次要拿情況來決定的。

這樣，政治部在戰鬪時訓示的基本方法，就是政治部底一部分工作人員直接參加戰鬪，及在戰鬪中檢查團政治機關底一切工作，然這並不是說就不應發送可影響戰鬪結局的領導指示。

訓示的第二個重要方法，就是加入共產黨員，關於這點應須詳細講一下。關於建立後備的黨員預備在戰時的自由調動的問題，實是最重要而且最複雜的問題。國內戰爭底實際，看見建立後備黨員的方法如下：（一）動員後方部隊內的黨員，（二）動員地方黨部內的黨員，（三）調動現有的黨員與提拔下級做負責工作人員，（四）轉調補

充部隊內的黨員，（五）利用政治訓練科，指揮訓練科，（六）從上級政治部內獲得黨員。

動員後方部隊內的黨員，國內戰爭時，常多這樣做過。這裏的原因在於後方部隊內的黨員損失很少，而戰鬪部隊內則損失很大。經過幾次戰鬪後，常形成了在後方部隊內的黨員百分數不相稱於戰鬪部隊內的黨員百分數。此外，所謂必須平均分徵「血稅」與戰鬪地教育每個黨員，亦須要求這樣作去，以達精神的鞏固支部，造成後方與前線更親密的銜結。從後方支部所動員來的補充黨員，其戰鬪力通常不甚充足，然而此種手段却有很大的鼓動精神的意義。所以此種補充，最好是不要派往戰綫底最嚴重地段，要使新到的黨員得於戰鬪中逐漸地鍛鍊自己，磨勵自己。在另一方面，必須注意到遽然大大減低後方黨員底百分數，勢必反應到後方底供給工作，救助傷兵工作等方面，這些工作，對於戰鬪底勝利，亦有很大的意義。所以動員後方支部的黨員，須有計劃地，逐漸，非大批地進行之；以來自預備隊或俘虜的黨員代替被動員去的黨員，使他們在精神上得休息。

於直接的危險外。

動員地方黨部底黨員來參加部隊，其優點在於這並不是剝肉補瘡的辦法，而是直接的增多隊部內黨員底數量。然因紅軍機關同樣負責着在戰地居民中工作的責任，且往往與地方黨部無甚區別，所以可說當順利運動於敵人領土內時，這種動員地方黨部底黨員未必能夠廣大地實行，恐祇有從秘密中走出的黨部非常有力，有力可給多量的自願黨員與動員黨員的時候，才有可能。退却時則相反，撤退地域底一切黨員都應完全直接併入戰鬥部隊。這種規則，應最嚴格地遵守起來，因為祇有這樣才可保障戰地黨部底相當經常工作。要不然的話，則地方黨部將不安心其奮鬥的工作而恐懼自身底危險。這種地方黨員的補充，其戰鬥力及戰鬥鍛鍊的程度，在初時多半並不較強於師後方部隊底黨員。由於這種原因，所以不應派遣他們到戰線最危險的地段，而先來鍛鍊他們於不甚殘酷的戰鬥中。此外，這些新動員來的黨員或不充分的知道軍事及紅軍中的政治建設與黨員建設。所以，如情況許可時，無妨使新動員來的黨員經一番短期的（甚至數

日的也吧）訓練班。當然，祇有當黨員直接從後方來到政治部時，才有這種開設訓練班的可能。如黨員是當退却時直接併入作戰部隊的，那就休作此想。

在實際上常多不得不調動現有的共產黨員。這樣，如在師內須撥出某一團來，使擔負特別負責的任務（突破敵人戰線，掩護退却等），則在加強其技術兵器底數量外，尚須願及加強其戰鬪的政治鞏固力，因之就得加強黨員底數量，而黨員的取得，往往須從其他的團內分撥。這種方法，其缺點在加強此一部隊而削弱他一部隊；此外，在新情況新環境內，工作不是一下就能安置好的，因為每個黨員須有若干時間來預先熟識部隊，與紅軍戰士發生同志的連絡，樹立自己底威信等。然此種轉調的優點，則是他能用戰鬪的弟兄們鞏固部隊。此種加強突擊部隊的辦法，只應於不得已時施行之；在其他一切場合，須力圖指定在政治上十分堅強的部隊任突擊。反之，這種方法在下列場合，須多為運用之，這就是：當必須長期恢復部隊戰鬪力的時候，當某團因戰鬪結果，政治人員損失特別重大的時候，或當部隊受創甚巨而要求確切醫治的時候，最後，當新到的部隊尚未經受

過戰鬪，因之需要戰鬪的政治人員加以督促的時候。

有計劃的從此一部隊轉調黨員與負責的政治工作員往他一部隊，一般說來，在長久的戰鬪情況時期內，實是調動政治工作人員之最主要的方法之一。特別須注意提拔下級政治工作人員於負責的地位。必須逐漸地提拔普通黨員為政治指導員，提拔政治指導員為副政委，副政委為政委，以此類推。這樣從下級提拔出的戰鬪的政治工作人員，其對戰鬪情況底艱苦條件是有鍛鍊的，他能給自己取得必要的威信，並能與黨員羣衆及紅軍戰士羣衆建立應有的連絡；反之，從後方來的工作人員，如沒有戰鬪鍛鍊，則必須使其經過這種進階，以達其最好認識戰鬪情況及戰鬪鍛鍊的目的。戰時黨員底戰鬪品質，一般在估計每個政治工作人員上可起嚴格的作用。所以在估計與檢查這種品質上，政治部應加以相當的注意。

轉調補充部隊底黨員，應認為是在戰略上用政治人員補充戰線的經常方法。將來戰爭時，應定出規則，使新動員來的黨員和一切紅軍戰士一樣，先行投入補充部隊，以便

於其中受以必要的軍事政治教育，補充部隊可以並應當成爲政治人員之有力的後備軍，俾總政治部，方面軍政治部甚或軍政治部得依照總的戰略計劃而運用之。黨員從地方部隊內可同時與行軍連派往戰綫，亦可直接分批單獨派往。從補充部隊來的黨員，在這種時機，其軍事政治方面的訓練，將較優於直接從後方動員來的黨員。

利用一切政治講習所做後備政治人員的供給地，實是最便利的方法之一，一方面，因爲設置完善的政治講習所可造出在戰鬥和政治方面充分有鍛鍊而且有準備的黨員，另一方面，動員政治講習所底學生，已不至直接損毀出征部隊底政治機關。

政治講習所，以從醫院出來的黨員，從俘虜轉回的黨員等充實之爲最適宜，因爲政治講習所在物質方面常較出征部隊爲優良，並且工作的情況亦極安靜，殊可使恢復健康與學業配合起來。當然，不可因此拒絕直接派遣出征戰鬥部隊底紅軍戰士到政治講習所去學習，以補足其知識及刷新其政治思想。

政治講習所底教育計劃，應是俱有充分彈性的，並應是集中式的，要使學生遇到意

外的事情而中止課程後，不至消失所受的學業。我們推想，戰時政治講習所底網，與過去國內戰爭時一樣，應開始於師內設立之。在戰鬪情況條件下，這種政治講習所差不多可說是宣傳工作的唯一形式，因為黨的研究組及馬克斯組等直接工作的可能，在戰線出征的戰鬪部隊內，非常有限制，而使部隊不留任何宣傳工作，却是要不得的事。

這樣，無論師政治部，軍政治部，總政治部都應有自己戰術的及戰略的後備政治人員，使他們得依照總的戰略計劃而適當用之。

將來戰爭時，必須避免過去國內戰爭時的錯誤，如往往不正確的使用黨員底力量及空費其力量。所以關於何時與如何吸收黨員的問題，實是政治部工作中的嚴重問題。第一個基本條件就是吸收的適時，因此必須與作戰方面的工作保持綿密的連繫。我們知道，現代大的作戰計劃，常須準備數個星期，甚或數個月之久。必須使政治準備亦同樣的趁早。務須使黨員至少於決戰開始一星期前得趕到部隊內。這一星期可使黨員熟悉部隊，認識一切黨員及紅軍戰士，可使政治機關考察其品質以為適當的使用等。因此，軍

政治部往部隊派遣黨員，至少應在作戰開始二星期以前，而總政治部則至少在一月以前。如戰役提前爆發時，則有時甚至應暫止這種不適時的吸收黨員，等待情況較為順利時再吸收之，因為戰線如已開始了慌亂的退却，新的未經砲火轟擊的（即無作戰經驗的譯者）共產補充甚至完全無濟於事。必須等待戰線上若干的變遷，如補充是戰鬪的，經受過砲火的，可於不拘任何情況中吸收之。這種補充不適時的例子，可拿一九二〇年九月間第十二軍吸收八百餘黨員的事實來看。當在瓦薩附近失敗時，西南戰綫各軍猶在西堡格河及立臥堡地域保守着自己底陣地。很明顯地，西方戰線敗後，第二個突擊勢將加在西南戰線上，而首先便是施諸第十二軍。第十二軍於是成爲中央所注意的焦點，不特增入大批的補充部隊，而且於九月初間該軍領得了職工會動員來的五百黨員。此外軍政治部自己向各方面盡量摘取而收得了約三百黨員。偉大的共產鐵拳於九月五日，至十日之間開往各師。然比及黨員到達各師政治部及直接達到各團的時候，波蘭軍底突擊已爆發了。在汽車上奮身的馳襲下，波人佔據了出征各師後方底高威地方。第十

二軍開始迅速地退向後方。許多黨員尙未到自己團內，使他們無奈尋找自己部隊於退却中。不習慣這樣艱難的戰鬥情況，許多黨員集團完全四處失遺，並有許多黨員徘徊於各部隊間，不是「尋找自己部隊」就是無所措手足。吸收到退却部隊，他們並不是堅固的份子，並未帶來勇敢與活潑的精神，而恰是相反，連自己亦染受了一般的情緒。雄厚的考慮過的共產補充底整個運動，這樣地完全被破壞了。如黨員之吸收在一二星期前，則必可獲得另一種結果。無論如何，軍政治部當時應給自己留下二三百黨員，使自己得於退却開始後及中途暫時停止時直接吸收之。那時黨員底職責已可加以確定，且使黨員得在軍政治部底直接領導之下自己準備克服惡劣的情況。

調動黨員的第二條件就是必須吸收大批的黨員。政治部最好集中其注意力於一、二非常重要的部隊，投入其中以充分數量的黨員，使其得其一一般高漲情緒及和藹的工作立地大大影響到部隊底戰鬥力與士氣上去，以自己底勇敢、信心、剛毅傳給疲憊的黨員。政治部可這樣地逐漸由此一部轉至他一部隊。

最後第三條件就是對於補充必須加以精神的及政治的相當訓練，必須使其產補充在各種報告及訓話內得認識你們部隊底狀態，認識其中政治工作的任務，使他們切記一般的政治狀態，訓示他們以進行政治工作的最好方法，供給他們以必要的材料及訓令等。然不僅祇應想到事務的準備，並應想到精神的準備，造成英勇的戰鬪精神。必須使新到的補充從一開始就遇到一切出征部隊底政治機關對自己非常注意的待遇，當然，不是常能給他們以必要的物質上的便利，然須對他們常加以相當的注意，並給以精神的援助。地方居民及紅軍部隊參加的大會，歡迎，歡送，政治部負責工作員的親自談話，兵士的刊物，對於補充的些微注意——這就是你們可用以達到自己目的的方法。不過祇須依照你們的具體環境把他們分別運用起來。這裏要定出一般的規則是不容易的。例如即在該第十二軍內，把動員後方黨員與開軍人的黨的大會放在一天舉行，用全體黨大會檢閱了開往戰線的黨員，接着便舉行聯合大會，這不特提高了黨大會的情緒，並且非常加強了黨員開赴戰線的精神。

政治部掌握中第三個訓示方法，就是各種訓話會與代表會。在戰鬪情況中，組織他們的特點，在於這種可能是很有限的。這種會議，通常多不得不委諸戰線上久於沉寂的時期或等待被派為預備隊時舉行。在其餘的場合，即使政治情況要求舉行會議，亦須縮小其範圍，限制參加的人數及會議的時間。如會議不大時，則以貼近出征部隊的配置為有利。當一九二〇年夏季進攻瓦薩時，各軍的後方遠落於出征部隊之後，在第十二軍內，例如有時軍政治部設於基輔，而同時師參謀處與政治部則設於沙耳那地域，前線部隊且將進行至斯道浩一帶。這樣，從軍參謀處到師參謀處，中間相隔直達六百里之遙，而從師參謀處到前線部隊則恆至二百里。且戰線每日向前移動約六十至八十里。軍政治部不願與其所屬各師脫離，所以往各師參謀處配置地域內派遣自己代表組織關於各種政治工作問題的會議（各師政治委員會議或政治部主任會議，組織訓示部，鼓勵宣傳部，分發部，通報部會議等）因為戰綫正面並不寬大，所以佔十小時至十二小時的短期會議，使每個師政治部工作員至多不過離職一晝夜。企圖盡可能減少為開會議而

在途中所費的時間及希望對於會議有相當準備，有時使軍政治部指定開會地點於向敵佔據的地域內，然後按軍政治部的預算，將至開會日期，該地必為我軍各師參謀處所配置的地域。例如當在斯道浩河作戰時，軍政治部指定於高威偉城各師政委常會（這種常會規定兩月一次）。當然，這種向前跑是不小心的，然在本場合中，却證明了自己的正確。總之，祇預先規定會議的日期及議事日程是可以的，至關於會議的地點則應直接於開會前一二日補充通知之。

上述一切關於紅軍政治部訓示出征部隊之工作的方法，無論是在黨的工作方面，政治組織工作方面，及鼓動宣傳工作方面，都可同樣採用的。

關於戰時黨的領導任務，我們不在這裏細講，因為基本任務在上述各章中，均有相當指示。政治部底任務，在於利用上述的一切訓示方法與通信聯絡方法，應乎每個部隊具體環境及條件，來領導這種工作。

關於鼓動宣傳工作也是一樣。無論在黨的工作或鼓動宣傳工作方面，應一般約指

出，師政治部底基本任務，為給予一切部隊關於四圍情況的政治的通知。在部隊內則須根據一般材料而進行政治訓育的直接領導。局部說來，關於鼓動宣傳工作，必須指出以下的任務，這些任務只有師及師以上的政治部底力量才能辦到的。

(一) 研究各種敵對黨派在紅軍中及居民工作，及與之鬪爭的方法的問題。這種工作須由政治部，革命軍事裁判機關及特務科共同努力進行之。

(二) 研究敵人政治工作的方法，其在紅軍及地方居民中的鼓動，其政治方案，並定出這種鼓動鬪爭的方法，揭破其虛偽誣蔑及對於勞苦羣衆的利益的害處。

(三) 以政治經濟的狀態的觀點來研究本師動作的地域。

至關於出版一事，則必須在各政治部間加以嚴格的分配。師政治部應有一小的較便印刷機，使可印刷必要的傳單，宣言，而於無奈時，並出版師的報紙。印刷師的報紙，照規則說來，當然無須要的。國內戰爭時，這種企圖非常之多，然其結果都不順利。即使有些師內，其報紙保存得長久些，但其質量常非常之壞。只有當師與軍久相隔離而失却通信連

絡的時候或師與軍之通信連絡非常困難，不是經常的，而是偶然的。這時候才可讓師出自己的報紙。在其他一切場合，要出師報，未免多此一舉。當通信連絡暫時斷絕時，師可出一種通訊的定期刊物，仿照牆報「羅氏特」的形式。一般說來，像牆報「羅氏特」樣的簡短刊物，如其排印得省目瞭亮，自可採用。軍政治部內的出版事業，應充分發展起來。第一，每軍應出版軍底報紙。暫時報紙可起極大的作用。無疑，活潑的迫切的通報消息，可引起紅軍戰士的特別興趣。從中央寄去的各種報章，在這種關係上，不免多耽誤，雖然他的通報自然是完滿得多，且其內容也較為豐富。此外，軍報應與廣大的紅軍戰士羣衆發生極密切的關係。這祇有軍報能做到這點，他一面可於自己周圍集中充分數量的有力的工作員，而另一面則與紅軍戰士羣衆建立強固的密切的關係，國內戰爭的經驗指示說，最好是紅軍戰士的報紙是軍報，例如「紅色射手」——第五軍的報，「紅軍」——第十二軍的報，騎兵的報紙「紅色騎兵」。

除過用多數紅軍戰士底文字所出的兵士經常的日報外，軍政治部尚須注意供給

其他民衆之紅軍戰士的需要，所以軍政治部有時尙須另出版一種或二種——雖然不是每日的也罷——報紙。然對於此事須加以謹慎，因為要組織其他語言的報紙，在軍中常不易找得充分數量的工作人員。出版這種報紙，祇有當其他某一民族的紅軍兵士很多時，才有可能。例如，當十二軍與波蘭戰爭時，除俄文紅軍報外，尙得經常的出版烏克蘭之貧民。如在本軍內有某一師是由其他民族組成的，則應該儘可能在該師內組織民族報紙，軍政治部應供給該師以充分數量的工作人員，以進行是項工作。軍政治部在這裏好像將其一部份工作移至師政治部那樣，亦可在形式上將這種報紙的出版事宜，直隸於軍政治部下，在實施方面，則使其歸師政治部主任領導。

此外，軍政治部應該印刷數種語言的傳單，並須用敵人的語言印刷。國內戰爭時，有些軍團企圖用敵人語言出版經常的報紙。即在十二軍內曾出版過波蘭文字的報，每星期兩三次。這一工作費去很大的力量，並耗去貴重的價值，使克做到。最正確的，還是把用敵人語言和在紅軍中之各種民族少數語言出版報紙的事情，委諸方面軍政治部或甚

至直接委諸全國紅軍總政治部。

至關於各種小冊子，則必須絕對禁止師政治部的出版。軍政治部可以且應該用一二種基本文字來出版關於目下各種迫切問題的小冊子。用其他文字出版較為普遍的冊子，應直接委諸方面軍政治部以上。最後，在戰時出版大的宣傳書籍，應為全國總政治部底任務。

至關於雜誌，我們認為連長和政治指導員所需要的基本的鼓動的領導雜誌，應由軍政治部出版。國內戰爭時，這種雜誌曾在許許多多的軍團內發生過並存在過的。即從道中間產生出政治指導員，紅色連，紅色營房等一類的雜誌。必須在軍內，而不在軍以上，出版這種雜誌，首先因為這種雜誌底基本內容應為迫切的鼓動材料，其意義是隨着時間底轉移及情況底變遷而易迅速消失的。

政治部工作中有偉大意義的，應是正確的供給宣傳品（分發宣傳品。）國內戰爭知道供給宣傳品的三個基本方法：（一）經過尋常的供給機關，（二）經過野戰郵政，

(三) 經過政治部專門的分發機關

國內戰爭底經驗，指出第一方法是用不得的。供給機關常認為供給宣傳品是自己最末的一件事情，因之宣傳品常多遲誤或完全不能到部隊中。供給底技術工作人員，簡直一點也不能明白宣傳品在戰線上的意義，所以對他非常而又非常的冷淡。這一供給方法，雖屬便宜，將來革命戰爭時，切勿再用。

經過野戰郵政供給宣傳品的企圖，會見之於各種軍師內。野戰郵政工作平常的缺點——無彈性。大家知道，各種信件到達得非常緩慢，並且遺失了許多。野戰郵政底工作，在紅軍中不見得比沙皇軍隊中好些。祇在有些軍隊內，若是我說得不錯的話。例如在騎兵部隊中，因為野戰郵政底加強注意及大批黨員底增入，直使他底工作順利到可以付託他郵運宣傳品。他對這一工作，好像是做得多少還算圓滿。

我們是第三種方法——在地方政治部內組織發行底獨立機關——的熱烈擁護者。供給宣傳品，對於政治工作如斯重要，故不可吝惜款項而組織獨立機關。在許多軍團

內不止一次地用專門的命令指出了供給宣傳品底意義。例如第十二軍革命軍事委員會底命令（二一五號，一九二〇年七月三十一日）內寫道：

『每個紅軍戰士，每個蘇維埃共和國底國民都知道，在戰線上報紙底需要和子彈底需要一樣。

』然而各兵站主任，各梯隊主任，各支隊隊長，各糧秣運輸及彈藥運輸隊長，各鐵路管理人員及蘇維埃民警長官並不是時常拿着應有的注意力來對待宣傳品輸送人員底一切要求。

第十二軍革命軍事委員會命令一切上述在職人員及各種組織，對於往戰線運送的宣傳品，加以確切的幫助；無論是任何運輸隊，無論運輸的是些什麼東西，必須附帶運輸可能數量的宣傳品。

『第十二軍革命軍事委員會警告，舉凡一切對於輸送宣傳品的阻礙及不協助等現象，將視為違犯本令而送交革命軍事裁判法庭懲辦。』

「本令張貼於本軍所駐扎的地域內各車站上，各碼頭上，各鄉鎮城縣及梯隊內。」

第十二軍革命軍事委員會 阿拉洛甫

發行機關的獨立存在，可保障對此工作的充分注意及對實現其任務的充分的堅強力。

往往在政治部認為發行機關完全是次要的，以之隸屬於鼓動宣傳部底任何一個分股下或列為鼓動宣傳部底一股。從政治機關一般的組織系統上說，從與鼓動宣傳工作的連繫上說，這種辦法也許是對的，然從工作的迅速與敏捷方面說來，這却是錯誤的。發行所根本的價值，應是其工作的彈性，輸送宣傳品的應時。戰時供給的主要宣傳品，乃是鼓動性質的報紙，傳單，宣言等。此種宣傳品，通常應平均地分配於各部隊之間。所以，從鼓動宣傳任務的本質上說，對於這種工作經常的調劑與領導，往往沒有需要，因之分發工作的中心應轉為技術工作。無論何時，總應把一切宣傳品預先分為二部份：一為按照預先所定的計劃運送宣傳品，一為按照個別部隊特別的要求，或鼓動宣傳部的指示。

適應個別部隊的專門任務及情緒而運送的宣傳品。第一種宣傳品應由發行機關完全獨立地分配之，並無須鼓動宣傳部的參雜。關於第二種宣傳品應給以吩咐，至於技術的執行，則完全應由發行機關擔負之。最後，供給關於宣傳性質的印刷品，則要求鼓動宣傳部須參加領導之，因為他的輸送將完全由目下的宣傳任務與各部隊中的圖書現狀來決定的。這種宣傳品，其輸送每次都要經鼓動宣傳部特別指示的。至關於技術的執行，則這裏必須給發行機關留出廣大的獨立性，因此，發行的首領應為在各方面均極負責的同志，使其能與參謀處直接發生連繫，並明瞭其一般作戰計劃。我們認為發行主任在這種關係上應直接隸屬政治部主任。供給計劃應極有彈性，應隨着一般情況的變化及部隊的轉動，逐日檢查計劃的適用程度，在這裏發行主任亦應時常知曉各部隊目下的移動，適應每個部隊的移動而規定其供給的秩序。

當國內戰爭時，我們對於宣傳品底供給，常是非常地無彈性，總是企圖嚴格經過一切隸屬機關。這樣，認為全國總政治部只可直接供給方面軍政治部，而由方面軍政治部

必須經過集團軍政治部。後者則輸送宣傳品到自己後方部隊，到所屬各師等，結果常得到這樣的矛盾。第十二軍有些後方部隊駐扎於堡連斯克，運給他們的報紙從莫斯科先到哈爾可埠——西南方西軍政治部，然後再到基輔——第十二軍參謀處，再從這裏到堡連斯克。這樣一來，八百里長到三千里。同樣的，從第十二軍政治部內報紙先經過哈查金運到萬尼查——師參謀處，再由萬尼查返來經過哈查金運到駐扎於別郎克的各個團內。

必須避免這樣的笑話。我們認為比較正確的，是從全國總政治部內直接由各集團軍領取宣傳品，而不經過方面軍參謀處，再從集團軍內直接運往各師政治部，而不經過軍政治部。且在這當中，凡是一切駐扎於集團軍政治部與全國總政治部之間的部隊，即使其屬於集團軍底某種部隊也罷，（這些主要是各集團軍底後方部隊，補充師等）亦應直接由總政治部供給之。同樣的，各師的後方部隊，如其處於集團軍政治部與師政治部之間，則應直接由集團軍政治部供給之。為使發行機關常能適應軍隊配置的變遷，在

師與軍政治部間如路程遙遠時，可於道路交會點組織發行傳遞所，使得於軍隊配置變更時，變更其所運送的宣傳品，例如，軍參謀處位於基輔，H師參謀處位於任道米，M師參謀處位於奧魯。傳遞所必須設於高洛。當H師從任道米例如往新城移動時，則高洛傳遞所或從任道米或從基輔接到是項通知後，即可將從基輔運往任道米去的宣傳品，中途至高洛而改運往新城。

爲使變更運送方向不僅對於全師，並且對師內各個部隊并有彈性起見，必須對每個部隊將宣傳品單獨包裹起來，而不要給全師包成一個總的郵件。那時接到通知（如上述的例子），謂H師移動至新城，其一團將配置於奧列斯克。傳遞所即可在高洛自由將送往新城給H師的宣傳品抽出一部，直接運往奧列斯克，因爲由奧列斯克到高洛是通着另一條鐵路。爲使這一切傳遞所底工作能夠圓滿起見，必須使一切政治部甚或個別的團知道一切傳遞所底工作計劃及分發機關底工作計劃，以便接時通知這些傳遞所使其得變更運送方向。

在有些軍及師內，關於供給宣傳品的通信連絡是由下向上發生的，就是說，認為軍給師的宣傳品，應由師政治部領取之，師給團的宣傳品，由團領取之。我們認為這樣的供給秩序是錯誤的。第一，這種秩序完全不能實現以上所述彈性方法，不得不恪守經過一切階段的舊法。第二，這同樣不能保障運送宣傳品的確實可靠，因為當本師駐紮地變更時，由師派出的發行人員這時由師內出發在途，同樣可與本師遺失連繫，或是落得多走些路程。即拿上邊的例子來說，且師分發員歸至任道米，而該師已開往他處，他便只得沿着馬路隨同該師某一輜重隊去追趕自己政治部，或是沿着鐵路仍然轉回高洛，再由彼處運往新城。這時駐紮於奧列斯克的團的代表，或應返至任道米或應趕至新城，然後再重新經過高洛而運宣傳品歸到奧列斯克本團。

再則，在這種秩序之下，供給各種緊急的宣傳品，常不能迅速地到達其應到的部隊，因為不得不等待上級分發員到來領取，而後者或許不知道有這種緊急宣傳品待領。最後，發行機關，在這種秩序之下，亦不免要擴大起來。

由下向上的通信連絡，只可存在於團底範圍內。團底發行機關，不能很大，在這裏已經可以從某一連內分發出紅軍兵士來充發行員，直接到團內領取宣傳品（鼓動車）。當然，就是在道裏團底發行員亦不應靜待各連底發行員，而應自己利用一切可能設法使宣傳品隨時送達各連。這個或那個紅軍兵士多跑上兩次沒有偌大的害處，而應時取得宣傳品，却是非常有價值的。

這樣的供給秩序，實是供給報紙，傳單，小冊子，及其他鼓動性質的印刷品底最好方法。關於宣傳性質的印刷品，則為其計算的準確起見，亟可使之挨次經過一切階段。在第二種印刷品與第一種印刷品間的基本區別，在於第一種印刷品的運送，應可能的迅速。如因此而致分配有些不公平（一部隊領得多些，他一部隊些微少點，）或是某一部份印刷品受了損失，這都沒有大的關係。反之，遺失有價值的宣傳性質的印刷品（書籍）却是不允許的事。

為使發行機關得很順利地進行他底工作起見，尚須注意到發行員的挑選及整頓，

發行機關的紀律。我們常往發行機關送些怯夫及下流。這當然是不對的。另一方面，必須造成所謂發行員的戰鬥名譽；他應於最短期間運到，不顧任何阻礙，雖是與性命有關也罷。如某個發行員不會執行自己的職責，尤其是有惡劣行為時，應嚴格懲辦之，直至槍決爲止。反是，如發現發行員有某種英勇行為或果敢動作時，黨應當在報紙中加以宣揚，並給以相當的獎賞。

蘇聯軍隊中的政治工作

每冊實價國幣六角

著者 捷克加了夫

譯者 伍雙文

總經售 生活書店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一月

活生



\$0.60